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上　册）

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编

一九七五年七月

说　明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应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毛主席的著作为基本教材。这份讲义，是作为本校党史课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辅助资料而编写的，供同志们学习时参考。如有不当，请提出意见，以便继续修改。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九二一——一九二七）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及其经验教训……（1）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0）

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特点……（10）
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13）
毛泽东同志革命活动的开始……（16）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

第三节　党的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24）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2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和初期的农民运动……（28）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统一战线策略的确定……（33）

第四节　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36）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36）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广东革命政权的逐步加强……（39）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43）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46）

第五节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49）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49）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53）
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56）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58）

第六节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叛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62）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62）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66）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67）
本章小结……（72）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第一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政治状况……（79）

第二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的发表……（84）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84）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88）
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93）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96）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的发表……（98）
反对陈独秀取消主义的斗争……（100）

第三节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著作的发表。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工农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02）

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102)
古田会议的召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105)
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110)
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114)
工农红军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15)

第四节　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118)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118)
“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左”倾关门主义使有利形势的丧失…(121)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农村根据地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著作的发表……(124)
王明“左”倾路线对红军的危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28)
工农红军开始长征。遵义会议的召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131)

第五节　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的斗争。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134)

反对张国焘逃跑主义的斗争。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34)
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的破产…(141)

第六节　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的发表……(144)

瓦窑堡会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发表……(144)
红军的东征与回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49)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154)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发表……(158)
《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哲学著作的发表……(162)

第七节　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深入。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168)

本章小结……(175)

第三章　抗日战争（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第一节　全国抗战的开始。国共两党的两条对立的抗战路线……(182)

从“七七”到“八一三”。全国抗战的爆

发……(182)
党的洛川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86)
八路军开赴华北作战。两个战场的出现…(190)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
务》的发表……(194)

第二节　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198)

新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198)
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与两条路线斗争……(201)
《论持久战》的发表……(206)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
义路线的斗争……(209)

第三节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
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
著作的发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
高潮的斗争……(213)

相持阶段的有条件的到来……(213)
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217)
《〈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发表……(220)
《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225)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228)

第四节　人民抗日力量的迅猛发展。《论政策》
等著作的发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的斗争……(232)

解放区战场的反“扫荡”战争。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加强……(232)
华中和华南敌后抗战的发展……(236)
坚持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240)
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245)

第五节　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249)

整风运动的准备……(249)
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253)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258)
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立……(263)

第六节　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268)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268)
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271)
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274)
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278)

第七节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281)

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和白劳德修正主义的出现……(281)
国民党战场的大溃退。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285)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289)

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斗争……(293)

第八节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296)

整风运动的胜利完成……(296)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300)
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和军事进攻的斗争……(303)
解放区军民举行全面反攻。抗日战争胜利结束……(305)

本章小结……(308)

第四章　人民解放战争(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第一节　党为反对美蒋反动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而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311)

美蒋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11)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314)
反对美蒋抢夺抗日胜利果实的斗争……(317)

第二节　党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斗争的巨大胜利。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319)

重庆谈判的胜利。《关于重庆谈判》的发表……(319)
围绕着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324)
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329)
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332)
减租、生产和练兵运动的开展……(334)

第三节　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被粉碎。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开展。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337)

全面内战的爆发。《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发表……(337)
粉碎蒋军全面进攻的斗争。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出现……(340)
粉碎蒋军重点进攻的斗争。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条战线的出现……(345)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开展……(349)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351)

第四节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353)

党中央十二月会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353)
粉碎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的斗争……(356)

人民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对国民党军
全线大规模进攻的开始……(361)
辽沈战役和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364)
伟大战略决战的全胜……(367)

第五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伟大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371)

粉碎美蒋新的“和平攻势”的斗争……(37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发表。人民解放
军向全国进军……(37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论人民
民主专政》的发表……(377)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380)

本章小结……(384)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二一——一九二七）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及其经验教训

一八四〇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从十八世纪末期起的几十年中，英国向中国日益加多地输出鸦片。鸦片的输入，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民，并大量地掠夺了中国的白银。鸦片贸易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一八四〇年英国政府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林则徐领导之下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平英团”，使英国侵略军受到很大的打击。一八四二年，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南京条约》，除规定赔款及割让香港外，并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输入中国的英国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

从此以后，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也接踵而来，对中国进行掠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

民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除原有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之外，又增加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又接连向中国举行了多次的侵略战争。一八五七年发动了英法联军战争，一八八四年发动了中法战争。它们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以后，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索去了巨大的赔款和取得了在中国驻扎军队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①，还占领了中国一部分领土。

资本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一批城市为通商口岸。到甲午战争时，开放的通商口岸已有三十四处。它们还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分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辖的租界②。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还办了许多轮船公司，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权。它们在中国大量地推销商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它们的需要。资本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许多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从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喉咙。

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代发展到垄断的帝国主义时代。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形式，也由以商品输出为主发展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和争夺也更为激烈了。

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新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一八九五年，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清王朝承认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也援引“最惠国条款”，取得开设工厂等权利，从而打开了帝国主义向中国

进行资本输出的闸门。从此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工厂，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工业。为了保证开办重工业企业，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出让矿权，在中国开矿山。至一九一三年，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全国煤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三，控制了中国几乎全部的铁矿，控制了中国全国纱绽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二。帝国主义进一步攫取了在中国的铁路建筑权，控制了中国的铁路交通事业。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四年，美、英、俄、日、德、法等国在中国工矿、交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达到十亿七千万美元。这个时期在中国修筑的九千七百公里铁路，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有三千九百公里，其余的则通过借款关系进行控制。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工厂、开矿山、筑铁路，残酷地剥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直接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中，展开了瓜分中国的运动。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一个向中国割地的狂潮。帝国主义列强还按照其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势力而划定中国的某一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东北被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失败后，又将东北南部划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两广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山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因为迟了一步，没有取得势力范围，就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帝国主义为了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还进行了文化侵略，它们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吸引留学生。这个侵略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培植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为了便于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在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

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化。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地主和富农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占有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贫农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每年交的地租要占全部收成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封建军阀官僚的苛捐杂税，有的地方高达八十多种。地主阶级的剥削还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中国的民族资本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一步一步地使封建主义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

狗的过程。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进行了七十多年，有时曾发展到很大的规模。

太平天国革命，就是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农民革命，比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一个跃进。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洪秀全，把西方基督教义的某些成分和农民的平均主义幻想结合起来，创立“拜上帝会”，在农民中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宣布成立“太平天国”。一八五二年出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于一八五三年攻克南京，并在那里定都，同清王朝南北对峙。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农民渴望取得土地的强烈要求。这个革命政权曾坚持斗争了十几年，它的力量达到过十多个省区，部分军队一直打到天津附近，震撼了清封建王朝的统治，并直接打击了外国侵略军。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统治者，极端仇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帝国主义者一面打着“中立”的幌子，麻痹太平天国的革命警惕性；一面通过英法联军的进攻，迫使清政府甘愿充当它们的走狗，然后联合起来镇压革命。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则对外国侵略者缺乏警惕，加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了不少错误，一八六四年，在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反革命军队联合镇压下，这次空前的农民大革命归于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逐步形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的联合统治。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

资于新式工业。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了。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中，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一八九八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依靠某些帝国主义的帮助来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当然只能是君子们的幻想。这次变法运动，只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被镇压了。戊戌变法的血的教训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一八九九年，中国爆发了农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运动。革命烈火燃遍中国北方，震撼了全国。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英勇地抗击了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的侵略，在保卫天津和北京的战斗中，给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因为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义和团运动也最后失败了。

到了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逐渐形成了一个革命派。一九〇五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组织了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以后并进行了几次英勇的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同盟会发动了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成功。接着，湖南、江西、安徽等许多省区也纷纷举行起义或宣布独立。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一次具有全国规模的、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经

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完全决裂，因此不可能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他们以为只要保障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实行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就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在这种幻想的支配下，他们急于和反动势力谈判，向北洋军阀袁世凯妥协，追求廉价的胜利。他们向袁世凯保证，只要清帝退位，废除帝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就情愿让他来当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二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参议院按照议和条件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三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就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到手未温的政权让给了袁世凯，只剩下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一九一三年，孙中山企图发动“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然而没有成功，连原来掌握的几省地方政权也被夺去，只得出亡日本。辛亥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也在实际上瓦解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妄图独霸中国。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对德宣战，并借此出兵山东，把德国从中国霸占去的租借地青岛、胶州铁路及其沿线权益据为己有。美帝国主义也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旗号，力求扩大它在中国的势力。从此，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并与美国相争夺的局面。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给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造成了某些有利的因素。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却超过中国的民族资本。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依然在继续着。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⑨。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为了换

取日本的支持，承认了“二十一条”。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登上了皇位，称“中华帝国皇帝”，决定次年改元“洪宪”。这种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各地相继出现讨袁起义。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只好下令取消帝制。这场“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树倒猢狲散，袁的一些爪牙也赶紧自谋出路，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六月六日，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病毙。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实权则掌握在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手中，统治中国的依然是北洋军阀集团。由于日、美等帝国主义的操纵，北洋军阀分裂成了若干派系。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头子的直系是最大的两个实力派。稍后，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军阀也发展成为一大派。他们之间互相争夺中央政权。广东、广西、云南等省的地方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割据地位，联合起来，和北方军阀相对峙。此外，在各地还有一些小的地方军阀。各派军阀在各自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下，彼此交争不已。

一九一七年夏，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企图赶走黎元洪。六月，黎下令解除段的总理职务，并调封建余孽“辫帅”张勋带兵入京。张勋乘机与保皇党头目康有为合谋，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于七月一日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张勋复辟，引起了全国的反对，不过十三天就垮台了。十四日，段祺瑞乘机取得了在北京的统治地位。他向日本借债扩军，妄想用武力统一全国。南方军阀则打起“护法”的旗帜，成立军政府，推孙中山为大元帅，和段祺瑞相对抗。孙中山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

上，抱着恢复约法和国会的目的进行“护法”斗争，但是挣扎了一年，徒为军阀政客所挟持，孑然无助，失败而去。中国陷入了实际上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一九一五年九月，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一九一七年初，资产阶级自由派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长。以北大文科和《新青年》为中心，在北京开始发起了一个文化运动。陈独秀等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进行一次思想革命，所以“国民愚弱”。他们要求进行国民性改造的工作，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文学，实现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这年七月，由美帝培养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由美国回国，也到北大任教，并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这个文化运动，虽然开始了对孔教的某些批评，并且提倡革新文学，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他们的理论武器是从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学说到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思想的混合物，因此，如果停在这种水平上，也决不可能给中国革命指出新的出路。

中国人民在七十多年中不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战斗精神。但是，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

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要求得解放，必须有新的革命阶级来领导。

“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派人物，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历史唯心观的破产》）它说明，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由新的思想理论来指导。

七十多年革命还证明，革命之所以没有胜利，是因为全国人民，主要是工农劳动群众没有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青年运动方向》）尤其是要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广大农民动员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特点】　中国无产阶级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过程中逐

渐发展起来的。

自从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就开始在香港以及上海等几个通商口岸设立船舶修理、印刷、市政服务等类性质的企业；从此，也便逐渐出现了受雇于这种帝国主义企业的最早的中国工人。接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逐渐加深，受雇的中国工人也逐渐增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几十年中，一部分中国商人、地主和官僚逐渐投资于新式工业，使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逐渐增加起来。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资本输出，工厂矿山迅速开办；这时中国民族资本也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所有这些发展，都同时促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经营的企业而产生的，它比起中国资产阶级来，年龄和资格更老些，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中国无产阶级诞生以后，就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早在一八五八年，为了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香港工人就曾经举行过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罢工。以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工人还进行过许多斗争。据不完全统计，自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三年，工人罢工事件即达七十一次。辛亥革命时，一部分工人参加了反对清王朝的革命。一九〇六年江西湖南间的萍(乡)、浏(阳)起义，有安源矿工六千余人参加。一九一一革命以后在上海和唐山曾一度出现工会运动。但是，这时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微小，据一八九四年的估计，近代工业雇佣工人人数还不满十万人；斗争也完全是自发的。无产阶级

还只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不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不久，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洲的战争，结果，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强，日商厂矿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放松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了。到这次世界大战后，工矿企业和海员铁路等企业中的中国工人，合计已经接近二百万人。产业工人在全国人口中虽然只占一个很小的数量，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加上它的集中程度高和生产上的重要性，它在政治上能够发挥的作用却远远超过它在数量上所占的比重。而且，除现代产业工人外，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有一千多万人，如果包括农村中的雇农、贫农和其他出卖劳动力的人在内，那么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数量即占全人口半数以上。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有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等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它有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传统，却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除极少数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同时，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联系，便于同农民结成亲密的

联盟。经过辛亥革命失败以来的深刻教训和本身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只要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就完全能够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了。

【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

一九一七年，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从此，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这就使中国的面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消息刚传到中国时，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正在缓慢地发展着。十月革命给了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鼓舞。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创作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五四反封建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它不仅第一次用创作的实践推动了真正的文学革命运动，而且揭开了“反对吃人的礼教”的斗争，引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对孔子思想的迷信。这个口号变成群众的革命口号，是中国思想界在历史上的新飞跃。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从此才真正高举起来了。

接着，中国人民从实践中懂得了十月革命和自己的斗争利益的一致，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

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了。一九一八年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两篇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时，许多人以为中国成为欧战中的“战胜国”会给国家带来好处，也跟着协约帝国主义国家一道，高叫“公理战胜强权”。在这种极端错误的舆论声中，这两篇文章首先宣传了十月革命，并且勇敢地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曾经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这些文章在世界观上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终究并不是一回事。历史立刻用严峻的事实纠正了这种误解，迅速提高了人民对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一九一九年一月，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会议”。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战胜国的分赃会议。在会上，日本帝国主义坚持要由它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狼狈为奸，支持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等要求，却被和会无理拒绝。而且人们从和会的消息中得知，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夺取山东特权的要求，竟是早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山东问题秘密换文》中，便已由段祺瑞政府秘密表示“欣然同意”了的。这时，军阀政府又准备在宰割中国的“和约”上签字。这个事实彻底地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军阀政府的为虎作伥，严峻地表明了这次战争“胜利”的实质。

四月底，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全国人民群情激愤。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这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这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这时的驻日公使）。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被阻之后，又到赵家楼，冲进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放火焚烧曹宅。五四运动就这样开始了。从这一天起，运动迅速由北京向全国发展，天津、上海、长沙、济南、武汉、广州等地的学生也纷纷举行示威，表示声援。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时，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的。军阀政府妄图用暴力扑灭群众运动。到六月三日，北京实行大逮捕，被捕的有近千名学生。其他城市也随着进行逮捕和镇压。在这严重时刻，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站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六月五日，上海工人发动了大罢工，参加的有纺织、机械、电力、市政、海运、印刷等各业工人六、七万人，加上搬运工人、码头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等达十多万人。六月十日，罢工达到高潮。沪宁、沪杭、淞沪等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上海水陆交通全部断绝。罢工工人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不管饥饿，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斗争。同时，唐山、长辛店、天津、长沙、济南、南京、武汉、杭州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在工人、学生的推动下，上海等地的商人也举行了罢市。六三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

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成为五四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坚决斗争下，段祺瑞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六月二十八日，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此以后，资产阶级退出了运动，革命的工人和学生则坚持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引向深入。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它带着辛亥革命所不曾有过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表明中国的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促使大批赞成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认识到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开始在广大群众中传播马列主义，走上和工农结合的道路。

从这时起，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逐渐加强，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五四运动标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开始。**“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同志革命活动的开始】　代表着五四运动的这个正确方向的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同志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少年时代就积极参加劳动，建立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的阶级感情。青年时期起，积极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他刚到长沙读书，还是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便参加了新军④，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不久，因革命失败而退伍复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

时，他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又参加了反对帝制的斗争。从那时起，毛泽东同志就着手进行团结进步青年，准备革命力量的工作。一九一六年，他利用暑假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一九一七年冬，他在长沙创办工人夜校，亲自讲课，在产业工人中做文化宣传工作。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筹备，一九一八年四月，成立了革命的青年团体“新民学会”，把研究新思想，寻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当作主要任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个名句充分表达了他青年时代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和革命的凌云壮志。同年九月，为了组织和促进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他带领一批湖南青年第一次到北京，并在那里工作到第二年二月。这时，正是十月革命在中国开始造成广泛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播的时候。他利用北京的有利条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深入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就是最早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一九一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立即在湖南组织响应。五月七日，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的爱国学生，在长沙举行示威游行大会，声援北京学生。六月三日，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长沙各校实行总罢课。学生走向社会，斗争的浪潮迅速向全省扩展。六月中旬以后，北京、上海的资产阶级借口罢免曹、陆、章和拒签和约的目的已达，极力使运动就此止步。而湖南的斗争，却是向前发展的。七月九日，在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又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长沙的工人、学生、教员纷纷组织起来，广泛开展查禁日货等反帝爱国斗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了斗争的行列。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创办了著名的《湘江评论》，宣传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猛烈抨击旧文化。它不仅给湖南的群众运动以有力的思想领导，而且引起了全国进步思想界的重视。《湘江评论》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写的，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正确方向。它深刻地阐明了十月革命之后的世界形势，把五四运动看成是整个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宣传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尖锐地揭露了孔孟之道是两千多年来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奴役人民的专制思想，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反动工具，人民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彻底打破孔老二礼教的桎梏。他指出只有打破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才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唤起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毛泽东同志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推动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代表了批孔斗争的正确方向和路线。

一九一九年七、八月间，当群众斗争正在胜利发展时，湖南督军张敬尧[5]加强了对革命的镇压，下令解散学生联合会，查禁《湘江评论》。压迫愈大，反抗愈烈。九月起，毛泽东同志发动群众，开展驱逐张敬尧的斗争。十二月，张敬尧野蛮地镇压长沙各界人民焚毁日货示威大会，更激起驱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九二〇年初，毛泽东同志亲自带领驱张代表团第二次到北京，四月又由北京到上海。在这期间，《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中译本开始出版，他抓紧时机刻苦学习了这些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五四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斗争中成长，是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表明了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已经成为日益迫切的历史任务。一九二〇年，当毛泽东同志还在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正在开始。

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一九二〇年春，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失败，封锁被打破，苏俄与我国的交通恢复。根据列宁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到了中国。到了这时，中国人民才突破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封锁，看到了苏俄政府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表的对华宣言，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形成鲜明的对照，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人民**“走俄国人的路”**的决心。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下，一九二〇年五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九月，《新青年》改组为小组的机关刊物；十一月七日，又创办了秘密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翻译和介绍一些马列著作和国际共运经验，曾起过宣传社会主义的作用。七月，毛泽东同志在驱张运动胜利后，从上海回到湖南，也立即积极进行建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革命书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关。八月，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并提出留俄勤工俭学的问题。九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时，北京、济南、广州也在九月间先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十月，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主义小组的

领导下，各地还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〇年八月，首先在上海发起和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长沙、北京、武昌、广州等地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各地创办了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或新的工会，出版了通俗的工人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在湖南，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工人运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他指出工人要达到解放，只有提高自己的觉悟，组织强固的团体。他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积极分子，并经过他们去联系广大工人。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长沙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已逐步组织起来。一九二一年“五一”劳动节，长沙工人举行了游行示威大会，提出了“加强团结”的战斗口号。

党的筹建过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过程。自从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我国传播，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极力宣扬反动思想，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首先，向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一九一九年五月，胡适约请美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杜威来华“讲学”。七月，他自己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倡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这种宣传标志着旧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但是胡适却把他的黑货冒充“新文化”，用来欺骗群众。接着，另一种以研究系⑧政客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乘机宣扬起来。从一九二〇年间，他们请来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到处“讲学”，大肆宣扬基尔特社会

主义⑦，口头上主张“温和的共产主义”，实际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同时，无政府主义者鼓吹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宣扬绝对自由，提倡以互助主义代替阶级斗争。他们还组织了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和马克思主义争夺工人群众，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所有这些反动思潮，当时一起自称“新文化”，使一些人一时难分真伪。一些地方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甚至有个别产共主义小组都严重地受到这类思想影响，或有异己分子混入。究竟是信仰和遵行马克思主义呢？还是跟着这类反动思想跑呢？这是中国将走向何处去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进行了反对三大反动思潮的群众斗争，把革命群众团结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来，清除异己分子，为建立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奠定了基础。

在批判这些反动思潮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和蔡和森同志的通信等文章中，反复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指出政治改良绝无希望，主张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还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指出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只有马克思式的革命，俄国式的暴力革命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学会和湖南广大进步青年中深入进行教育工作，划清了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界限，帮助了革命者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使湖南无政府主义者黄爱、庞人铨转变过来，清除了无政府主义在工人中的影响。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战胜反动思潮的群众斗争，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大论战的典范。

在这一场大论战中，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和广州通过

《新青年》等刊物也进行了一些理论批判，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陈独秀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他所写的批判文章，不仅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且继续宣扬了错误的观点。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方向的出现，预示着未来的党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性。

关于建立一个怎样的党，按照什么原则来建党的问题，也是在斗争中明确起来的。就在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批判中，毛泽东同志阐明了建党原则。一九二〇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和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的通信中，深入地讨论了建党问题，提出了正确的建党原则。毛泽东同志等认为，要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首先就要成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的无产阶级政党，就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同志在同蔡和森等同志讨论建党的方针时，深刻地指出：这个党必须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的根据。就是说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指出这个党必须密切地联系群众，党员应当分布于工厂、农村、机关和其他一切有群众的地方，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领导者和先锋队。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主张必须是高度集中的又有民主的组织，必须有铁的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有组织有觉悟的革命战士，以便担负起伟大的革命事业。他们还明确提出，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坚决反对各种改良主义，发动人民群众，推翻反动统治，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上来，总之，毛泽东同志等坚决主张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

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他们认为，只有建立一个这样的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成熟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汉俊等十二位代表，代表七十名党员。共产国际也有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进行到第四天，遭到帝国主义密探的干扰，最后一天迁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举行。

大会讨论了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机构等问题。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合法主义的思想，认为无需建立有纪律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只要建立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组织。一种是关门主义的思想，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应一概拒绝他们入党。大会否定了这两种错误思想。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规定了实行武装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最后消灭阶级的基本政治纲领。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关。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但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声名和党初创时期的幼稚，被选为总书记。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光荣产物。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为了找寻解放自己的道路，前仆后继，牺牲奋斗了八十年，直到这

时，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才有了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的革命政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国革命有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这是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虽然只有几十个成员，几个共产主义小组，但是，这是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这是新生力量，而新生力量本质上从来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论人民民主专政》）“一大”闭幕后，党在一些省、市迅速建立了地区性的组织，推动当地革命斗争的发展，中国革命就以雄伟的步伐很快向前迈进了。

第三节　党的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英与日本之间争夺中国的斗争加剧了。美帝国主义为了同日本争夺中国的霸权，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参加的有美、英、日、法、意、中、荷、葡、比等九国。会议达成了瓜分中国的协议，签订了“九国公约”。它接受了美帝国主义提出的在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打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幌子，肯定了各帝国主义强盗共同宰割中国的局面。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又回复到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地位。

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造成了连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皖系军阀段祺瑞操纵了中央政权后，美、英帝国主义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支持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发动了直皖战争。直系打败了皖系的主力，取得了北洋政府的中央政权，控制着华北和长江流域一带的地盘。皖系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竭力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发动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五月，奉军失败，撤回关外。此后，日本继续扶植奉系及皖系在浙江上海的残余卢永祥，同直系对抗。直系在美、英帝国主义策动下，力图“武力统一”全国，各地方军阀则标榜“联省自治”来对抗。

帝国主义同时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外国商品控制了中国的市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增设了许多银行，借款给军阀政府，进一步控制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帝国主义国家又在中国加速开办企业，进行铁路、矿山的投资，还通过“中外合办”的形式，兼并中国民族资本。这样，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上控制了军阀政府，而且完全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帝国主义的加紧掠夺，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地主豪绅的剥削有加无已，使中国民族工业陷于停滞，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遭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日益加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军阀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了。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一步高涨起来，迫切要求党制定自己的革命纲领。这个任务，由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担负起来了。

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党制

定民主革命的纲领，有着伟大的指导意义。一九二〇年七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作了有关的报告。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区区少数的压迫民族，即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一部分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在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列宁明确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第一步，应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和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联盟；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同它建立联盟，但绝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列宁预见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经过一定的步骤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指示，规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方向。一九二二年一月，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了王烬美、邓恩铭、柯庆施等同志出席大会。大会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当前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主要敌人。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勉励中国工人团结其他革命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前进。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中国“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要实现中国的民主、和平与统一，“只有加入民主战争打倒军阀”。

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二名，代表党员一百二十三人。大会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当前的革命任务，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等决议案和党的章程。

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宣言首先分析了中国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中国革命是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就是党的最高纲领。宣言又提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奋斗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⑧这就是党的最低纲领。

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集中反映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八十多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是，没有任何别的政党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彻底的革

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证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来。

但是，由于党还刚刚成立，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在“二大”的决议中曾经提出了无产阶级“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但是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这是“二大”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和初期农民动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集中力量组织工人队伍。一九二一年七月，党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机关，并发行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在党的领导下，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这次工人运动高潮是从香港海员罢工开始的。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要求，未得到答复，一千五百名工人开始罢工。第二天，罢工海员搭火车回到广州。至一月底，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罢工人数增至三万人以上。英帝国主义大为恐慌，进行武力威胁，封闭工会，更激起了香港全市工人的同情罢工。十余万工人步行回广州，行经沙田时，英国军警开枪扫射，打死工人六人，伤数百人。惨案发生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工人纷纷声援，各地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斗争坚持了八个星期，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被迫承认增加工资，恢复原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工人。

接着，又发生了长江船员罢工，上海邮政工人罢工和上海日华纱厂罢工。

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邀请各地工会代表，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一百六十二人，代表十二个城市一百多个工会、二十万会员。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会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铲除工界虎伥案》等决议案，确定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八月十六日，书记部由上海迁至北京，改为总部，由邓中夏同志任总主任，并且在上海、武汉、湖南、广东、济南设立了分部。《劳动周刊》改名为《工人周刊》。

党的“二大”后，工人运动走向新的高涨。一九二二年八月，爆发了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汉阳兵工厂罢工，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十月，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在湖南，一九二二年十月到十二月间，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铅印工人大罢工和长沙手工业工人大罢工，并派人组织了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同年十一月，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同志任总干事。到一九二三年二月，全国大小罢工共一百多次，参加人数达三十万以上。

在这些罢工斗争中，安源路矿的大罢工具有重大的意义。

安源路矿属于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汉冶萍公司，是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官僚资本企业。路矿工人遭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生活十分痛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南，担任了湖南党和工会的领导工作，集中力量从

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秋，毛泽东同志跋山涉水，从湖南到安源，他一到安源就串茅棚，下矿井，向工人进行调查访问，考察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宣传革命的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他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战斗，争取解放。毛泽东同志在安源亲自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安源工人怀着对毛泽东同志无限热爱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唱出了一首动人的歌谣：

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毛润芝，打从湖南来安源，
他和工友把话谈，解除苦难不为难，
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团体，
工人听了是真情，个个难舍又难分。

毛泽东同志回到长沙后，马上派人到安源，同工人一起开展革命斗争，并制定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安源的工人群众，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迅速地觉醒起来。

一九二二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组织和领导下，办起了安源第一所工人夜校，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安源支部。五月一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光荣地诞生了。毛泽东同志严厉批判了“联络感情，涵养德性”的机会主义口号，提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的革命口号，作为俱乐部的宗旨。参加这个俱乐部的工人由原来的三百人，迅速发展到七千多人，团结了大多数工人群众，为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安源的一场革命的大风暴即将来

临。在这紧要时刻，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亲自来到安源。他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党支部会议，倾听工人的意见，并在会上分析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明确指出安源工人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在罢工前夕和罢工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又多次指示安源工人，罢工的胜利，全靠工人自己的坚固团结和坚强斗志，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要坚持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部署下，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多工人，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大罢工。工人们向路矿当局提出了十七条要求，高呼战斗口号，紧握岩尖、斧头，冲出矿井，同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资本家勾结北洋军阀政府，调来了大批军警，企图镇压工人。这时，工贼刘少奇也跳出来帮腔，替资本家出谋划策，搞什么“文明罢工”，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觉悟了的安源工人，根本不理他那一套。他们把资本家的反动军警包围起来，占领了矿井和锅炉房，搬来了炸药，齐声对资本家喊道：如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打它个片瓦不存。斗争坚持了五天，终于粉碎了资本家和反动政府的破坏，迫使路矿当局同意工人提出的条件，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安源路矿大罢工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的工人运动。此后，毛泽东同志还几次到安源去指导工人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罢工高潮极端仇恨。一九二三年二月，他们挥舞屠刀，对京汉铁路的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

京汉铁路各站工人，自一九二一年以来，陆续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到一九二二年底，全路十六个单位，都已有了自己的组织。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各站工人代表在郑

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军阀吴佩孚闻讯后，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会场，硬是不让工人开会。工人代表列队冲开军警的阻拦，进入会场，在反动派的武装包围下坚持开会，宣布总工会成立。吴佩孚接着又下令捣毁并封闭总工会。总工会即从郑州移至汉口江岸继续办公，号召工人向黑暗的军阀统治进行坚决的斗争。二月四日，总工会一声号令，在三个小时之内，全线工人都罢了工，所有客货车一律停驶，江岸一万多工人，上大街游行，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打倒军阀！”等口号，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斗志。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团立即怂恿军阀政府用武力解决，汉口英领事还直接和军阀策划屠杀工人。二月七日，两营反动军队包围总工会，开枪打死工人三十二人，伤二百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数十名工人被捕。反动派把林祥谦绑在电线杆上，向他连砍数刀，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鲜血溅地，巍然不动，坚决回答说：“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⑨最后宁死不屈，从容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英雄气概。先烈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人们前进！同日，反动派在长辛店也进行了屠杀。二月二十五日，又在武昌杀害了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

惨案发生以后，党立即号召全国工人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抗议吴佩孚残杀工人的暴行。道清、正太、津浦、粤汉等铁路工人和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扬子江机器厂等厂矿工人，纷纷举行了同情罢工。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举行了两万多人的大示威游行，并捐款救济“二七”遇难工人。京奉、京绥铁路工

人，香港海员，以及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革命群众，也都纷纷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各地都对工人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工人组织遭到了很大的摧残。“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只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有坚实的基础，力量强大，工人组织才保存了下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发动农民运动。在湖南，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进行了农民运动。一九二二年在湖南自修大学补习班的讲课中，他就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起来斗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一九二三年初，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湖南党组织在衡山岳北白果开辟农民工作。九月，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农民联合起来，为了解除自己的困苦而斗争。农会成立后，会员迅速增至十万人以上。在农会的组织下，农民展开了平粜和阻禁地主外运谷米、棉花的斗争，同时酝酿减租减息。这些斗争，虽然受到反动武装的多次镇压，但是革命的烈火已经点燃起来了。

在广东，一九二二年彭湃同志组织海丰农民，成立了农会。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会员发展到十万人。这一年，天灾严重。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但受到了反动派的镇压。海丰县农会的斗争，很快地影响了广东各地，陆丰、惠阳、紫金、惠来、普宁等县，也相继成立了农会，会员共有二十余万人。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统一战线策略的确定】　第一次罢工高潮，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

力量。但是，斗争的实践说明，无产阶级不能孤军作战，如果不联合广大的同盟军，就无法战胜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就初步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党的“二大”正式发出了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号召。接着，我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十七人，代表党员四百三十二人。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和确定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后，找不到出路，屡遭失败，一筹莫展。孙中山想整顿已经涣散了的国民党，也丝毫没有成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他在广东依靠军阀陈炯明重建军政府。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勾结北洋军阀叛变，炮轰总统府。八月，孙中山不得不再次退避到上海。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了孙中山以希望；中国共产党成立，更给予孙中山以深刻的影响。**“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党的“三大”正确地分析了孙中山国民党，估计到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可能性，作出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了和孙中山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方

针。

在讨论建立统一战线问题时，曾经出现了两种机会主义观点：

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陈独秀不懂得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否认当代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坚持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仍然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革命。他主张统一战线中“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把共产党完全合并到国民党中去，取消党的独立性。陈独秀在“三大”前后抛出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以及在“三大”的发言，宣称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污蔑中国无产阶级“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污蔑中国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鼓吹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他提出了由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投降主义的纲领。宣扬“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无产阶级只是从胜利中“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陈独秀妄图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认为无产阶级只能等待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之后，再来“领导”第二次革命。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其政策在党内的反映。

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资产阶级是不

能参加民主革命的。他们不赞成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这是从“左”的方面否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大会决定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为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三大”正确制定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使党能够团结各革命阶级，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从而大大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但是，大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对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也没有加以应有的重视。

第四节　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党的“三大”以后，全党加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早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孙中山表示接受我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研究了国民党改组计划，并成立了起草宣言、党章及党纲的机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我党帮助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了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共产党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孙中山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草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宣言。宣言接受了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有了反帝反封建的新内容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当时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林伯渠同志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参加了领导工作，并被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国民党中央有好几个部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有的部则由共产党员担任秘书。许多国民党的省党部也由共产党员主持。群众组织大多也是共产党员领导的。通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改组成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实现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我们党以广州作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当时，广东全省处在大小军阀各据一方的局面之下。军阀陈炯明占据了东江流域一带，陈炯明的党羽邓本殷占据了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等地，他们都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一些打着拥护孙中山旗号的滇桂军阀，也都在省内拥兵自重。广东全省军政、财政不能统一，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只有空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党联合孙中山，积极地将广东改造成为革命的基地。

一九二四年五月，在我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建立了军事学校，即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肖楚女等同志，先后在这个学校里担任各种负责工作，很多学生也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黄

埔军校的创设，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础。

广州的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也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二四年七月，爆发了广州沙面罢工。沙面是当时英帝国主义的租借地。英帝国主义者颁布了一条新警律，规定中国人出入租界，必须带有执照，而外国人却可自由出入。十五日，沙面工人举行了反对英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的大罢工。罢工坚持了一月余，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打击了帝国主义，震动了广州与香港。接着，广州工人成立了工团军。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也从东江一带向全省发展，并成立了农民自卫军。

英帝国主义把广东的革命势力看作它的死敌，指使反动武装广州商团[10]，于一九二四年十月间，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党发动群众，制止了孙中山的动摇，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十月十四日夜到十五日晨，以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广州工团军、广州市郊农民自卫军等为主体的革命武装，消灭了这个反革命武装组织。经过这次斗争，广东革命政权初步稳定下来了。

这时，北方正在进行直奉战争。一九二四年十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直系统治迅速瓦解。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控制北京政府，指使奉军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进关，排挤了冯玉祥，支持段祺瑞当了“临时总执政”。

在北方军阀内部发生了分裂和北洋军阀政府更迭的时机，我们党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反动面目，扩大民主革命的宣传，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在全国发起了一个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上海、广东、湖南、浙江等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孙中山赞成并参加了这个运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应

冯玉祥电邀北上，次年一月到达北京，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11]相对抗。三月十二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广东革命政权的逐步加强】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二十人，代表九百五十名党员。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建立党的组织。这次大会为加强党的领导，迎接革命高潮作了准备。党的“四大”，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大会没有注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武装斗争也缺乏应有的讨论，这说明，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加速了革命的步伐。继沙面罢工以后，上海、汉口等城市也发生了上万人的罢工斗争。到了一九二五年的上半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青岛、杭州、唐山等大城市和重要矿山的罢工斗争，便呈现出风起云涌的形势。

在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势下，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了五十四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通过了政治斗争、工农联合、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决议案。这样，中国工人就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大会闭幕不久，便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二十二个日资纱厂四万多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在共产党员刘华同志等的带领下举行大罢工。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工人的部分要求，但事后却拒绝履行。接着，青岛日资纱厂一万多工人也举行大罢工。五月中旬，上海日资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的压迫，又举行了罢工。五月十五日，日本厂主开枪屠杀罢工工人，打死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十多个工人。这一事件，引起了上海群众的极大愤怒。上海学生在党的号召下，纷纷起来支援工人。五月二十八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这天，党中央举行会议，决定在上海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示威运动。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二千多人，分头在租界内演讲，散发传单，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号召全体人民奋起反抗。他们的讲演，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响应，许多群众自己参加反帝示威的行列。在南京路上，群众和演讲队一起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长期蕴藏在人民心底的反帝怒火，炽烈地燃烧起来了。帝国主义派出大批武装巡捕，在南京路一带逮捕了一百多名工人和学生，关进捕房。愤怒万分的群众，一齐涌向英租界老闸捕房门口，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帝国主义巡捕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公愤，形成了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当日深夜，党中央作出决定，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实现全市人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并成立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

这次斗争。三十一日晚，产生了上海总工会，统一了上海的工人运动。六月一日，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二十多万工人举行了罢工，五万多学生罢课，大部分商人罢了市。六月七日，成立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工商学联合会”。十一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二十万人集会，通过了向帝国主义交涉的十七项条件，包括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惩凶、赔偿，道歉等内容。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情绪十分激昂。革命大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南京、重庆等许多地方，广大群众纷纷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五卅”运动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在全国反帝斗争的高潮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和香港工人的大罢工（简称省港大罢工）。六月十九日，在共产党人苏兆征等的组织下，香港十余万工人举行罢工，返回广州。二十三日，在广州的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经过沙基时，英帝国主义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五十余人，重伤百余人，造成了“沙基惨案”。这一事件，又一次激怒了中国人民。香港罢工人数，一下子发展到了二十五万人。为了进一步开展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实行了严密的封锁。香港的轮船、火车、电车、汽车和工厂的机器，绝大部分都停止开动，商店歇业，银行挤兑，物价大涨，满街都是垃圾，香港一时变成了“臭港”，“死港”。这次罢工坚持了十六个月，严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

在这个时期，我党还进一步发动了农民运动。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同志在韶山一带，亲自组织了二十多个农

民协会，在斗争中培育了中共韶山支部。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五月，广东农民协会发展到六十一个县，入会农民有六十二万人。海陆丰地区各县农民，热烈地开展了减租和反抗地主武装——民团的斗争，县农民协会实际上代替了当时的县政府，起了政权机构的作用。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全国农民协会会员达九十八万多人，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队伍。

农民运动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干部。一九二四年七月，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五年从湖南到达广州以后，亲自主持第六届讲习所的工作。学员来自全国二十一个省区（包括内蒙古），人数增至三百余人，超出历届讲习所的人数。毛泽东同志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周恩来同志、肖楚女同志、恽代英同志、彭湃同志等，也在讲习所任课。讲习所特别注重阶级教育和调查研究，组织全体学员到广东海丰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且实行了军事训练，为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培育了大批骨干。

党依靠工农群众和革命军队，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进行了多次革命战争。一九二五年初，广东的革命军队，从广州出发东征，得到东江农民的援助，打败了军阀陈炯明的军队。随后，又回师广州，消灭了盘踞广州的滇桂军阀。七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广东政府正式改组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接着，便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将所有参加革命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六个军。在这些军队中，普遍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政治工作由共产党员负责。从军部到连部的国民党党代表，实际上是共产党人。十月，国民革命军举行了第二次东征，消灭了军阀陈炯明

的军队。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这些战役中站在战斗的最前面。通过这些战役，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奠定了北伐战争的基础。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惧怕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

从国民党开始改组起，国民党里的一些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就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逝世后，他们进一步进行了反革命活动。十一月二十三日，以谢持、邹鲁为首的一些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会，公开反对三大政策。这个反革命小集团，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接着，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蒋介石，也伺机活动起来。辛亥革命时，蒋介石曾投靠上海政治流氓集团头子陈其美的门下。此后，在上海交易所充当经纪人，和买办资产阶级进一步勾结。一九二二年，跑到广东去投机革命，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一九二四年，蒋介石以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先后窃取了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职位。他以黄埔军校中的一些反动军人和国民党反共分子为中心，在广州组成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⑫，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他们鼓吹“戴季陶主义”⑬，叫嚷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退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许多重要

的政治论文，针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东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坚决主张通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开除一批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争取在改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时，使我党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一九二六年一月，经过我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共同斗争，在国民党“二大”中，左派的力量占据了优势。大会重申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开除了谢持、邹鲁等人的国民党党籍。

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熟视无睹，幻想用退让的办法来维持革命统一战线。陈独秀拒绝执行一九二五年九月党中央扩大会议提出的要坚决和戴季陶主义进行斗争的决定，而认为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非把他们挽留在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陈独秀在上海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妥协谈判，把戴季陶、孙科等一些右派送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并坚持把蒋介石、张静江等人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这就为资产阶级篡夺革命领导权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加紧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他指使爪牙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广东革命政府代理海军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派中山舰到黄埔给蒋介石使用。当中山舰抵达黄埔时，蒋介石又指使他的党羽散布谣言，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派兵占领了中山舰和其他军舰，扣捕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包围了

省港罢工委员会。随后，蒋介石即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完全篡夺了第一军的领导权。

“三·二〇”事变发生前，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要警惕蒋介石发动突然事变。事变发生以后，毛泽东同志主张给以坚决的揭露和有力的反击，并抓紧时机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武装。但是，陈独秀从来就是轻视军事工作的。他早就宣称：“现在已不是揭竿斩木时代”，广州军队“没有一连一排是可靠的革命军队”，“说可以用他们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这是欺三岁孩子的话。”因此，他主张“停止军事行动”。⑭这次事变发生后，他生怕得罪蒋介石，破裂统一战线，而顽固地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继续主张退让，任凭蒋介石夺取军权。他不仅不敢揭露事实的真相，反而荒谬地认为中山舰事变的发生，是因为共产党员“包办”了国民党的工作和蒋介石误信了“谣言”，竟然一再向蒋介石进行解释和道歉。六月九日，陈独秀还在《响导》上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胡说什么：“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行动”，“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一步抛出了“整理党务案，”提出限制共产党的四条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各级委员会中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给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给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指示要先经两党联席会议的讨论。对此，毛泽东等同志曾进行了针锋

相对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要共产党交出名单的阴谋。但是，陈独秀竟以共产党中央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这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们完全接受了这个反动提案，迫使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就这样，蒋介石顺利地窃踞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职务，并安插他的党羽替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部门的重要职务。蒋介石还在各省发展右派势力，排挤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在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的关键时刻，我们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自愿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不要农民，竭力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应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成了当时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不要农民，这是从“左”的方面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批判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光辉文献。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阶级斗争的现状和历史作了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和同盟军问题。

无产阶级要不要坚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

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高涨时期，列宁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的这一论断，批判了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解决了当时俄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去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一光辉文献中，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指出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正确领导，才能使革命有成功的把握。**“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怎样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呢？这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而国民党右派就是它们的政治代表。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需要革命和怀疑革命的两面性，指出资产阶级决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在国际上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

下，民族资产阶级必定要很快地分化，没有“独立”的余地，在中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明确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同时，必须保持阶级警惕，同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的反动倾向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毛泽东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中国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群众，就是农民，而其中**“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正是这些贫苦农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迫切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因此，**“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资产阶级既然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那末，应由那个阶级来领导呢？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揭示了我党成立四年多来工人运动所表现的伟大力量和重要作用，明确地宣告：**“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光辉著作，及时总结了我党成立以来的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科学分析，

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领导力量和同盟军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第五节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工农群众运动的兴起，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任务，已提到我们党的面前。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指出广东革命根据地已获得了巩固，革命政府应致力于加强革命军队的训练和扩充，扩大工农及其他人民的革命运动，改革民政财政司法与教育，以便在最短的时间中发兵北进，举行北伐革命战争。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明确提出了“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不犹豫的、不妥协的对付吴佩孚并肃清吴系在长江的势力”的政治主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直接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动。一九二六年四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都提出了发动北伐战争的要求和主张。同年五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号召全国工人同农民一致奋斗，拥护和参加北伐战争。同月，党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第

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战争的先锋部队，首先由广东向湖南挺进。七月一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九日，国民革命军约十万人，正式誓师北伐。

北伐战争的主要对象，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原直系军阀而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吴佩孚有军队约二十万人，盘踞在湖南的一部，湖北、河南两省和陕西的东部、河北的一部，控制着京汉铁路。孙传芳也有军队约二十万人，盘踞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张作霖的军队约有三十五万人，控制着东北各省和北京、天津以及津浦铁路北段。一九二六年三月，在英、美、日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为了共同反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吴佩孚与张作霖互相勾结，并纠合山西军阀阎锡山，在河北、京津一带，进攻同情革命的国民军冯玉祥部[15]。与此同时，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三一八”惨案[16]，疯狂镇压北方的革命群众运动。六月间，吴佩孚、张作霖在北京密谋划分势力范围，策划反革命战争。他们议定：在南方，由吴佩孚出兵湖南，作为进攻广东的准备；在北方，由吴、张合力加紧攻击冯军。孙传芳一面准备伺机进攻广东革命政府，一面又挂起“保境安民”的招牌，对抗吴、张势力的扩展。

北伐军根据敌强我弱和军阀内部充满矛盾的情况，决定把主力指向湖南、湖北战场，以两支钳制部队，分别警戒江西、福建的敌军，准备首先消灭吴佩孚军队，然后集中力量，进军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的部队。最后，进入长江以北地区作战，消灭张作霖的部队。

在湖南、湖北战场上，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以第四军为主力，加上第七军第八军，共约五万人。其中有相当

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战斗力较强。叶挺独立团在人民群众的直接参战下，迅速占领攸县，连克泗汾、醴陵。七月十二日，北伐军进入长沙。十九日，四、七两军在农民协会帮助下，由小路包抄敌军，一举攻克平江。二十二日，占领岳阳。接着，北伐军进入湖北作战。八月二十五日，吴佩孚急忙率部分主力，星夜赶到武汉，决定死守汀泗桥，等待援兵，并策动孙传芳夹攻北伐军。汀泗桥一役，成了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关键。二十六日，北伐军第四军猛攻汀泗桥，激战一天，进展不大。二十七日拂晓，叶挺独立团投入战斗。在农民的引导下，由右翼迂回，出敌不意，从高山上猛冲下去，突破阵地，敌人仓皇溃退。独立团在攻占汀泗桥后，不避艰险，乘胜追击，午前又攻占了咸宁县城。二十九日，独立团会同四军一部，穷追猛打，直趋贺胜桥，击溃敌主力数万人，夺取了吴佩孚的指挥阵地。吴佩孚狼狈退守武汉。九月一日，北伐军总攻武汉三镇。六日，克汉阳。七日，占汉口。吴佩孚逃往孝感，留下二万多人盘踞在武昌孤城，进行顽抗。北伐军围攻一月，未克。十月十日第二次发起总攻，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内。在这些决定性的战役中，叶挺独立团表现了勇猛机智，果断顽强的战斗精神，屡建战功，光荣地被人民称颂为“铁军”。至此，北伐军取得了湖南、湖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

在江西、福建战场上，以北伐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为主力。九月间，两湖战局胜利在望，北伐军乘势占领了江西南部和西部，直逼南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教导师，为了抢占南昌，也急忙赶来。但由于蒋介石在该军排挤了共产党人，部队丧失了战斗力，与孙传芳部一交锋，几乎

全军覆没。后来，其他各军协力猛攻，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于十一月初占领了南昌和九江。在福建方面，由于孙传芳主力在江西战场，敌军内部又发生分化，东路军何应钦等部未经战斗，在十二月十八日占领了福州。

吴佩孙、孙传芳的主力部队相继被歼以后，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分三路继续进军：西路由两湖北上攻河南，东路由福建攻取浙江，中路由江西向安徽、江苏进军，主要目标是夺取南京、上海。二月十七日，占领杭州。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解放了上海。北伐军这才进入上海。二十四日，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攻克南京。

从一九二六年七月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北伐军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部队，从广州打到武汉和上海、南京，把革命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北伐战争能迅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在北伐战争中，我党提出了正确的战略计划，在北伐军中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并组织了北伐军后方和北洋军阀统治区的群众运动，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北伐出师时，广东工农群众立即掀起了一个支援前线的运动。单是省港罢工工人，就组织了三千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冒暑随军出征。特别是我党领导下的湖南农民运动，给了北伐战争以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各县纷纷成立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开展了大规模的支前参战活动。农民组织了交通队、暗探队、向导队、运输队、宣

传队、慰劳队、疑兵队、破坏队、武装队等等，与北伐军并肩战斗。他们满山遍野布置松树炮和鸟枪爆竹，树起革命军旗帜，鸣号擂鼓，使敌军丧魂落魄，晕头转向。他们深入虎穴，侦察敌情，引导北伐军飞兵奇袭，使敌人措手不及，束手受擒。他们拿起各种梭镖鸟枪以至锄头扁担，直接参战，勇猛杀敌。正是有了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积极支援，北伐军方能有巨大的力量，迅速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北伐战争在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英勇奋战之下取得迅速的胜利，这是违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的主张的。在北伐开始时，陈独秀发表文章，反对北伐。他否认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意义，不懂得争取军队和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自愿放弃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在北伐战争中，陈独秀完全放弃对于军队的争取，不去扩大党直接掌握的军队。北伐军的指挥权大部落在同地主资产阶级有密切联合的旧军官手里，特别危险的是操在反革命阴谋家蒋介石手里。这种机会主义政策使北伐战争胜利的果实不能充分掌握在人民手中，以后终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同志从广州到了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随后又到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集中全力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持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有十七个省的八百余名学员，又为全国农民运动培育了大批骨干。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一个以湖

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高潮，象急风暴雨一样，猛烈地开展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站在全国农村大革命的最前列。北伐出师前夕，湖南全省已有农民协会会员三、四十万人。北伐军打垮了吴佩孚，进一步推动了农村革命的深入发展。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参加大会的有五十二个县、两个特别区的农民协会代表一百七十人。开幕的那一天，工农群众二十多万人参加了典礼。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的讲话，强调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斥责了那种诬蔑农民运动为“惰农运动”的谬论。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决议。一九二七年初，湖南全省已有五十多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带领的群众达一千万人。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展了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在农民协会主持下，实行了许多打倒封建势力、扫除农村封建秩序的革命措施。农民推翻了封建政权，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乱说乱动。农民瓦解了地主武装，建立了自己的梭镖队，一切土豪劣绅，看到梭镖队就要打颤。在经济上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取缔了高利贷。农民协会还打击了封建宗法制度，并开始进行整顿乡村道路和兴修农田水利。这场农村大革命，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湖北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地向前发展。一九二六年七月底，湖北农民协会会员仅七万二千人，到一九二七年五月，猛增到二百五十万人。江西农民运动的发展也很快。一九二六年十月，农民协会会员不过六千人，到一九二七年六月，达到了三十八万二千人。广东的农民运动，在北伐战争期间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此外，福建、浙江、陕西、四川、安徽、河南、广西等地的农民运动，也都迅速地发展起来。到一九二七年六月，全国农会会员约达九百十五万多人。全国农村大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工人运动也猛烈地发展起来。北伐前夕，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有七十六个工会，十余万会员。北伐军进占长沙后，改名为湖南全省总工会。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湖南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代表二十二万六千多会员。大会期同，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报告。湖北全省总工会和江西南昌市总工会，也分别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和次年一月宣告成立。此外，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工人组织也很快地发展起来。工会组织的统一和扩大，使工人群众更有组织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去。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工人，积极参加和支援了北伐战争。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工人，也以英勇的战斗来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都因为准备不足或起义过程中客观形势发生变化而失败了。在准备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党委派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同志负责领导和指挥，组织了五千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对上海市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三月二十一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了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的决定。中午，有八十万工人参加的总同盟罢工实现了。接着，就转入了武装起义。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经过三十六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三月二十二日解放了上海，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还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二十万群众举行庆祝北伐战争胜利大会。我宣传员在英租界附近讲演，英帝国主义的大批武装水兵，横加干涉，当场刺死我海员一人，刺伤群众数十人。五日，汉口的工人和市民群众几十万人，举行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示威大会。会后，革命群众英勇地冲入租界，驱逐了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收回了英租界。一月六日，在九江发生了英国军队枪杀工人的挑衅事件，工人及其他劳动群众英勇地占领了九江英租界。二月十九日，英国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被迫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

【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　当北伐军向长江中、下游进军，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统治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增调了大批军队到上海和长江流域一带，直接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和施加

军事压力。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到达武汉时，英帝国主义军舰公然援助军阀吴佩孚炮击北伐军。一九二七年一月，美帝调集驻檀香山和苏伊士的舰队以及驻菲律宾的陆军，赶赴上海。英国从本国和印度调集远征队一万二千名来上海，并把原驻我威海卫的第二舰队兵舰和鱼雷艇二十七艘移驻上海。日本帝国主义也在一月间派遣驱逐舰四艘和巡洋舰一艘来华，与英、美、法合力“保护上海”。三月二十四日，在北伐军占领南京的当天晚上，美、英、日、法、意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对南京的北伐军和居民进行猛烈的轰击，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二千多人，制造了“南京惨案”。

帝国主义还通过分化革命阵线，引诱中国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阵营，从内部来破坏革命。一九二六年底，英帝国主义宣布所谓对华新政策，虚伪地声明毫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承认中国应有“关税自主之权”，企图以此麻痹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一九二六年初，美帝国主义派间谍分子到广州试探蒋介石的态度。次年一月二十六日，美国国务卿开洛发表了一项对华政策声明，宣布美国准备“以最宽大的精神”，与中国谈判关税和领事裁判权问题。二月，美国又派代表去南昌与蒋介石会谈。日本帝国主义则希望蒋介石和张作霖勾结；以便于它独霸中国。一九二七年一月，张作霖的代表与日本顾问曾到南昌和蒋介石密谈，蒋介石也派代表到北方同张作霖秘密协商。

在帝国主义的分化下，蒋介石开始了一系列叛变革命的活动。北伐战争开始时，他窃取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并擅自规定国民政府所属的陆、海、空军都归总司令统率，国民政府所属各省的民政、财政都归总司令管

辖，各省各军的长官都归总司令任免。在北伐战争中，他沿途招降纳叛，收编了大批原北洋军阀“倒戈”的部队和土匪，大大地扩展了他的军事实力。一九二六年底，当革命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时，蒋介石就在南昌安下了反革命的总司令部。他提出要把广东国民政府迁到南昌，以便加强控制。这一企图，在我党和广大群众的反击下，遭到了失败。一九二六年冬，蒋介石派戴季陶秘密去日本，谋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并公开要求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一批买办政客，纷纷麇集南昌，进行所谓“政治南伐”。原依附于北洋军阀的政学系反动政客黄郛、张群之流，出入于蒋介石的幕府，秘密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江浙财阀虞洽卿也窜到南昌，以反共灭共为条件，资助蒋介石六千万元反革命经费。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大搏斗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党能否正确领导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极端仇视农民运动。他们制造种种谣言和借口，恶毒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很”。他们组织地主武装，同混在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勾结一起，拘捕、残杀农民领袖和革命群众。资产阶级也害怕群众的充分发动，叫嚷“工农运动过火”，污蔑农民运动“过分”，以此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分裂统一战线。

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步发展起来了。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党的四届三中全会上，陈独秀抛出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

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大肆鼓吹阶级投降主义，不许农民革命。在农民运动问题上，他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宣扬所谓“乡村联合战线”的口号，胡说农民协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规定“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主张农村土地问题应由农会和“正绅”来“仲裁”解决。在武装斗争问题上，他规定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在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他自愿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认为“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份，且有领导此运动之趋向”，鼓吹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只能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到一九二七年初，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形成投降主义路线，并且在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

为了粉碎地主资产阶级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对于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紧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对农民运动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总结了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三月，发表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光辉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同志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热情歌颂和高度评价伟大的农民运动，痛斥了阶级敌人和陈独秀之流诽谤农民运动的种种谰言，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如果连

这一点子变动都没有，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几个月内做到了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所谓“糟得很”的谬论，完全是站在地主方面打击农民的反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针对陈独秀维护地主权力的反动主张，坚决地提出：**“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为了打碎地主政权，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指出必须把地主手里的旧武装拿过来，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放在农民政权机关的管理之下。同时，还必须发展农会的梭镖队，建立**“挨户团非常备队”，“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

无产阶级要真正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必须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这是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大众，是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

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面对着伟大的农民运动，**“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这是检验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试金石。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批判了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武器孔孟之道。陈独秀搬出孔老二的主张倒退复辟的思想来反对革命，正当工农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发展的紧要关头，他却叫嚷什么“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竭力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痛斥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尖锐地批驳了中庸之道一类反革命谬论。深刻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所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公开揭露了蒋介石镇压农民运动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思想基础孔孟之道，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伟大思想，从而指明了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前进的航向。

这篇伟大文献在湖南发表后，对农民运动起了很大的鼓午和推动的作用，农村大革命不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

干扰，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当时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不仅拒绝实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路线，甚至还极力阻挠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这篇文章⑰，这就使得这次大革命的失败变成不可避免的了。

第六节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叛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挽救他们的反动统治，指使蒋介石明目张胆地向革命发动了进攻。三月十一日，蒋介石唆使爪牙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十六日，以武力解散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十七日，在九江组织流氓匪徒，袭击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二十三日，在安庆收买流氓打手，捣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蒋介石从南昌、九江、安庆一路杀奔上海、南京，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政变。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立即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⑱，以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帝国主义答应通过租界提供一切便利，并以驻扎在上海的三万多名侵略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上海的大资产阶级表示愿意资助军饷，给蒋介石以经济上的支持。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则组织流氓打手，供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用。民族资

产阶级也附和大资产阶级，倒向蒋介石一边。

为了孤立上海的革命力量，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南京，把倾向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三个团缴械，解散了南京共产党支部。又在杭州组织流氓匪徒，袭击总工会。蒋介石为了取得国民党内各派反动势力，特别是与他同时进入上海的桂系军阀的支持，从四月一日起，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秘密反共会议，制定了反革命政变计划。在蒋介石指使下，一小撮国民党政客，盗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开会，由吴稚晖提出所谓检举共产党的呈文，为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蒋介石还利用流氓、地痞、恶棍、工贼，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进行造谣破坏活动。他又将同情工农的一部分北伐军调离上海，另调新收编的旧军阀周凤岐部进驻市区，充当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并成立戒严司令部，发布戒严令，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限制人民的革命活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施展政治欺骗来麻痹群众。当工人代表要蒋介石澄清关于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枝的消息时，他满口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⑲四月六日，蒋介石假惺惺地派军乐队，给工人纠察队“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

在蒋介石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的形势下，陈独秀表现了可耻的机会主义的叛卖。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缴获了步枪四千支、机枪二十多挺。但陈独秀不仅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加强工人武装，而且对已经组织起来的二千

七百人的工人纠察队，也采取消极态度，不予支持。蒋介石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外报纸早有披露，工人群众也多次反映反动派将对工人进行袭击，陈独秀却毫不在意，不作任何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直到四月五日，陈独秀还竟然伙同汪精卫炮制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个宣言，不仅没有一字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反而竭力为蒋介石涂脂抹粉，硬说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鼓吹同这个独夫民贼“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要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这就帮助蒋介石解除了群众的思想武装，使党和人民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

四月十一日，蒋介石在完成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之后，密令各省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镇压。当日下午，大批反革命军队就布防上海街市。深夜，帝国主义侵略军首先越过租界，在南市、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区，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一千多人，送到蒋介石军队在龙华的司令部，进行毒刑拷打和屠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配合下，反革命的大屠杀开始了。

四月十二日凌晨，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上发出了信号。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动，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工人纠察队奋起进行自卫反击。大批反动军队就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和青红帮流氓一起，疯狂屠杀工人。工人纠察队因事前没有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终于措手不及，一千七百支枪全部被缴，队员死伤三百多人，上海总工会也被反动军队占领。

上海人民看到打着“革命”旗号的军队，突然掉转枪口屠杀工人，无不愤怒异常。当天，各区举行了几万以至

几十万人的抗议集会，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枝，惩办流氓，肃清反动分子。南市区五十万群众在集会后，向龙华司令部进发。闸北五万多工人、学生和居民举行示威游行，从反动军队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宣布继续办公，并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全市总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十三日，上海丝厂、烟厂、电车、海员和店员工人等二十多万人，不顾白色恐怖，实行罢工。同日上午十时，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群众大会，虽然反动派沿途堵截，使沪东、沪西、南市的工人不能前来，但到会者仍有六万余人。大会一致决议要收回工人武装。下午一时，群众冒雨列队游行，高呼“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当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蒋介石反动军队，从四面八方向游行群众射击，同时用机枪扫射。顿时，宝山路上烈士的鲜血流成了河。在这次绝灭人性的大屠杀中，牺牲的有一百多人，受伤的不可数计。

接着，蒋介石公然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据不完全统计，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三百多人，被捕的五百多人，流亡失踪的五千多人。从这时起，上海到处是戒严、搜查、殴打、逮捕、公开的和秘密的屠杀。全上海陷入了血海之中。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同志都在这一时期先后牺牲。这是刽子手蒋介石对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东南各省也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四月十五日，广东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

封闭革命组织，屠杀革命者。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达二千一百多人，被驱逐的铁路工人有二千多人。肖楚女等同志也在这时牺牲了。国民党反动派还在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相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在蒋介石的屠刀下牺牲了。烈士鲜血，染红了祖国大地。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血的日子，永远不会忘记这笔血债！

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树起“驱逐共产分子”，实行“反共”的黑旗，勾结广西军阀，笼络一部分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权。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使大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纷纷要求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挽救革命的危机。陈独秀企图拖延大会的召开，但受到普遍的反对，未能成功。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党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大会的中心问题是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讨论革命发展的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

会上，陈独秀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他对自己的投降主义，不仅没有作认真的检查，而且还多方辩解，坚持错误。他坚持认为，“中山舰事件”中的无原则让步是“正确的”策略，无产阶级只能进行经济斗争而不应该进行政治斗争。他还认为目前不是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农民土地问题等待以后再说，不然就会影响北伐战争的进行。他被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吓昏了头脑，认为在广州、上海、武汉、天津及其他工业区，帝国

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不能发展革命力量，应当退出东南各省，到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西北部去。这种逃跑主义的谬论，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大会，提出了挽救革命的重要提案，主张大力开展农民土地斗争，大力武装工农。但大会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拒绝讨论这些正确意见。由毛泽东同志提出并由各省农民协会联席会议通过的普遍实行土地改革的建议，在提交“五大”批准时，也遭到否决。陈独秀一伙还竟然把毛泽东同志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大会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陈独秀的家长制领导，阻碍了批评的深入开展。同时，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陈独秀错误路线的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武装斗争等许多迫切问题也没有解决。陈独秀表面上承认了错误，仍然被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会后，陈独秀继续把持党中央，推行并发展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既然未能纠正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没有解决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正确的论断。他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加强军队中的工作。但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拒绝接受斯大林的正确意见。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各种革命力量随着集中武汉，武汉成了当时革命的中

心。“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处于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蒋介石、广东军阀、四川军阀、奉系军阀从东南西北四面包围武汉，切断长江和京汉铁路的交通运输，对武汉实行封锁。帝国主义出动大批军舰停泊在汉口，并关闭在武汉的工厂、银行、企业。武汉地区的地主豪绅、反动军官和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攻击工农运动。民族资产阶级也以关厂罢业、抽逃资金，来对抗革命。武汉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但是，武汉政府管辖的还有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广大地区，拥有七千万人口，有相当大的工农革命力量可以依靠。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传来，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无比愤怒，，到处贴满了“打倒蒋介石”的标语。武汉举行了三十万人的群众集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群众运动。在人民革命力量的推动下，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进行国民革命，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其一切职务，下令讨伐。工人运动在继续发展。武汉工人接管了反动资本家非法关闭的工厂，并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人、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运动已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农民自卫军普遍地建立了起来，不仅有了梭镖，而且不少地方还夺取了地主团防的枪枝，在自卫军中成立了常备队。两湖地区的农民协会，惩办了不法地主豪绅，控制着粮食和食盐的运销，筹集了大批军粮供应前线。因此，只要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大力组织人民武装，仍然可以有力地反击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使革命继续前进。

然而，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

造成了在革命紧急关头党内的极端混乱，使党无法领导革命前进。混在革命阵营的大资产阶级代表汪精卫，利用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迅速地走向公开叛变革命的道路。

汪精卫在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一连串反共会议后，来到了武汉。在武汉地区革命高潮的形势下，汪精卫暂时隐藏起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继续打扮成国民党左派，大骂蒋介石是革命叛徒，表示要与共产党合作，因而仍然把持着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窃踞了武汉政府的党政军大权。随着武汉地区阶级斗争的激化，汪精卫也就暴露出其反革命的真面目。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的要求下，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为的特别委员会。五月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了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宣言，声称要“充分保护工商业者之利益”，限制工人的“过火要求”，禁止工人纠察队的活动。次日，又放出保护“善绅”的命令、攻击农民运动“破坏公共秩序”。五月底、武汉政府下令解散湖北黄岗和黄陂两县农民协会。

与此同时，反动军官的军事叛变也接踵而来。一九二七年四月底，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武汉纠集一小撮反动将领、官僚政客、国民党右派分子，策划在湖南、湖北发动军事叛变。五月十七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北伐军大部分开往河南前线，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在宜昌发动反共叛变，率部进攻武汉，一直打到武汉郊区。叶挺部队从河南前线赶回武汉，进行英勇反击，将夏斗寅部击退。五月二十一日，在武汉国民党军事首领唐生智的支持下，何键部许克祥团在长沙叛变，发动了”马日事变”。

许克祥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特别法庭等革命机关，并夺去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枝，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群众领袖。六月六日，反动军官、江西省长朱培德在江西叛变，宣布“共产党人限期出境”、“停止全省的工农运动”。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活动已日趋明显，武汉已为反共逆流所淹没。但是，陈独秀还是极力拉扰汪精卫国民党，继续顽固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六月三十日，陈独秀主持中央扩大会议，起草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作出十一条规定，宣称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总之，一切听从汪精卫国民党的摆布，汪精卫国民党反对工农革命运动，陈独秀不但不敢进行斗争，而且也跟着攻击工农革命运动是“无组织的自由行动”、“过火行为”，命令记者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并由党中央宣传部发宣传提纲“纠正”、扬言违者“严罚”。汪精卫国民党要共产党员退出武汉国民政府，陈独秀就借口“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⑳指示在武汉国民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可以“请假”，命令共产党员退出湖北省政府，要求各处地方政权必须尊重武汉政府之最高领导权。

特别是在武装斗争问题上，陈独秀更是采取了取消主义的可耻立场。夏斗寅叛变时，武汉地区的工人、农民、纠察队和童子团，都起来保卫武汉。武汉政府也被迫答应拨二千支枪给工人纠察队。但是陈独秀竟拒绝接受武器，以表示自己没有“阴谋”和对武汉政府的“忠诚”。许克祥在长沙叛变时，湖南十万农军拿起武器，高喊着“梭镖亮

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口号，从四面八方围攻长沙。许克祥只有一千人枪，龟缩在长沙城内，农民武装是完全可能把这些叛军消灭的。可是陈独秀却害怕会遭到唐生智的反对，竟然下命令停止进攻。结果，农民武装的大部分被迫撤退，小部分孤军奋战，被敌人击败。许克祥的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杀出城来，在各县屠杀工农一万多人，湖南农民武装几乎被摧残殆尽。六月底，陈独秀又借口“为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㉑下令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武装。这时，叛徒刘少奇，利用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权，也积极加以配合。他们把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全部三千余支枪枝和弹药，连同童子团的木棍，一起捆扎整齐，拱手交给汪精卫武汉卫戍司令部。

在革命最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志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继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许克祥叛变、湖南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时，毛泽东同志主动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去湖南工作，组织革命群众反击反革命势力。可是只有十天，陈独秀就把毛泽东同志调回武汉，并且指责对反革命的反击妨碍了国共合作。蔡和森同志也写信给中央常委，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建议党中央及军委立即作一军事计划，坚决反击敌人，不作鱼游釜底，静待反革命处置。但同样遭到陈独秀的拒绝。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作出两次紧急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惩办反革命等。陈独秀一伙擅自扣留了文件，不让党内干部知道，却先送给汪精卫看。六月二十三日，在党中央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当时担任团中央书记的任弼时同志，要求陈独秀向党员公开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竟以“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为借口，拒绝了任弼时

同志的要求，并当场撕毁了青年团作出的关于拥护共产国际指示的决议。由于陈独秀凭借其总书记的权力，实行家长制统治，压制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主张，顽固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汪精卫等在郑州和冯玉祥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公开反共。会后，唐生智率领武汉政府北伐军由河南返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冯玉祥派出代表去南京，和蒋介石密商武汉与南京的合作问题。十九日，蒋介石、李宗仁和冯玉祥在徐州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清党反共”，“宁汉合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接着，汪精卫反动派在武汉地区举行反革命大屠杀，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大批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本 章 小 结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从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包括洪秀全、孙中山领导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感谢伟大的列宁，他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

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

但是，在这个阶段的末期，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毛主席在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党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第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运动中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在中国人民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没有这次革命的大演习，就不会有以后革命的胜利。我们党经过第一次大革命的锻炼，经过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锻炼，在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了。

【注　释】

① 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旧中国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之一，始于一八四三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和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这个特权，即是：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如成为民刑诉讼的被告时，中国法庭无权裁判，只能由该国的领事裁判。

② 帝国主义国家在强制清朝政府承认沿江沿海的某些地方为通商口岸后，并在他们所认为合宜的地方强占一定的地区做为他们的“租界”。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一套统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帝国主义并经过这种“租界”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

③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该要求全文共五号：前四号包括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的移让，并要求增加日本在山东的新权利，日本在南满洲和东蒙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第三国等条款；第五号所列款项要求攫取统治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并欲攫取湖北、江西和广东之间的重要铁路建筑权。袁世凯除对五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但因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的要求未能实现。

④ 新军是清朝末年编练的新式陆军。由于革命党人的秘密工作，不少地方的新军是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力量。武昌和长沙等地起义，都是由新军发难的。

⑤ 张敬尧属皖系军阀。一九一八年，直皖联军战胜湘桂联军后，张敬尧进入湖南，任督军，驻长沙。在湖南无恶不作，为当地人民深恶痛绝。一九二〇年，直皖矛盾转剧，湘军乘机进逼。六月，张敬尧不战而溃，退出湖南。

⑥ 研究系是以地主买办阶级代表梁启超为首的一个反动政治团体。一九一六年，梁启超任北洋军阀政府财政总长。他和汤化龙等封建官僚、反动政客组织了宪法研究会，简称研究系，依附于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统治的工具。

⑦ 基尔特是行会一词的英语译音。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初流行于英国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它主张通过“和平”的途径，用所谓基尔特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⑧ 《中国问题指南》第二册。

⑨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⑩ 广州商团，是广东地区豪绅买办阶级的一支反动武装，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的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头子，以英帝国主义为后台。商团叛乱被镇压后，首恶分子逃往香港，大部分则缴械投降。

⑪ 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正进行时，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统治迅速瓦介。张作霖和冯玉祥共推段祺瑞为北京政府“临时总执政”，政权落入段祺瑞、张作霖手中。段为巩固其反动统治，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名为讨论直奉战争后的“善后”问题，实质上是以此欺骗舆论，反对人民的反军阀斗争。

⑫ 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共组织。它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在广州建立。主要人物有王柏龄、贺衷寒、缪斌等。他们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破坏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一九二六年三月

的“中山舰事件”，就是这个组织在蒋介石策划下进行的。

⑬ 戴季陶主义，是由蒋介石的忠实走狗戴季陶创立的。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以后，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妄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

⑭ 陈独秀：《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响导》第八十五期。

⑮ 冯玉祥所部原属直系北洋军阀。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军阀内部发生重大分化。冯玉祥率领所部起兵反直，从前线返回北京，占领了北京各要地，囚禁了直系头子曹锟，改组了内阁，使直系军阀在北京的统治迅速瓦解。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把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驻扎在北京、天津、河北一带。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冯玉祥率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拥护国共合作，参加北伐战争，随即带领部队进入甘肃和陕西地区，并进军河南郑州一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随着反革命逆流的高涨，冯玉祥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参与了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但和蒋介石始终存在着利害冲突。“九·一八”事变后，他赞成抗日，一九三三年五月间，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在晚年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⑯ “三一八”惨案，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互相勾结屠杀中国人民的一次反革命罪行。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出动军舰，炮击国民军，掩护奉系进攻。事后又联合美、英、法等八国，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国民军在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各界人民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赴段祺瑞政府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竟令卫队开枪，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

⑰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成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把持《响导》编辑大权的陈独秀、彭述之拒不发表。到三月五日，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陆续发表，十二日，《响导》才勉强发表了全文的前半部，而削去了“十四件大事”部分。

⑱ 见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北华捷报》

⑲ 见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申报》

⑳ 均转引自《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㉑ 转引自《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第一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政治状况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建立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当时的中国，除南京蒋介石集团和武汉汪精卫集团互相对立外，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和河北、山东，阎锡山控制着山西，冯玉祥驻军洛阳；在南方，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和蒋介石合作，桂系的另一部分李济深、黄绍竑则盘踞在广州，粤系军阀也保持着相当的势力。日本希望促成蒋介石、阎锡山、张作霖的合作以进攻汪精卫、冯玉祥；英美则企图实行宁汉合作以进攻张作霖。一九二七年八月，汪精卫等人到南京和蒋介石进行政治分赃。因为分赃不均，十月就爆发了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间的战争。十一月到十二月，又发生了争夺广东的粤桂战争。一九二八年二月，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独霸了党政军大权。接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白崇禧四派新军阀，取得了暂时的妥协。四

月，它们联合发动了所谓“北伐”，进攻北方的旧军阀张作霖。六月，张作霖放弃北京逃往关外，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被他的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炸死。国民党宣告“北伐胜利”。十二月，在美帝国主义的居间调停下，以张学良为头子的东北军阀宣布放弃“独立”，归从“国民政府”。至此，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实际上蒋介石政权从来也没有真正统一过。两广、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地军阀都保持半独立的状态，并不断地和南京政府发生公开对立以至战争。蒋介石南京政府能直接控制的只有长江中下游几个省。

蒋介石反动派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迅速地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他们通过发行公债，贩卖军火，征收苛捐杂税，举借外债，投机买卖兼并民族资本以及其他各种办法，横征暴敛，残酷地掠夺中国人民，集中了大量的财富。他们还通过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大银行，滥发纸币，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一九三六年，四大银行的资产总额和各项存款，均占全国银行的百分之五十九，发行的兑换券占百分之七十八。加上他们所控制的其他银行，全国金融业绝大部分都为四大家族所霸占。同时，四大家族又逐步在商业、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确立了垄断地位。抗日战争前夕，四大家族已经独占了进出口贸易，控制了国家资本的全部工矿，统制了大部分私营工商业，掌握了大量的房地产，把持了全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这样，四大家族就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形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垄断资本。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又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

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蒋介石反动政权同北洋军阀政府一样，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的工具。它彻底地投靠外国帝国主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政府。蒋介石在实现“统一”以前，就积极寻求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支持。一九二七年九月，蒋介石带了亲日派政客张群访问日本，同日本帝国主义头子田中义一秘密商谈，达成默契。蒋介石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为条件，换取了日本对他的支持。十一月，蒋介石又与美国签订了美蒋关系密约，并通过美帝走狗、大买办宋子文，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更紧密地勾结起来。一九二八年三月，蒋介石竟向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美英等帝国主义表示道歉和赔款。同年五月，蒋介石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进攻奉系军阀，日本为了阻止美英势力向北发展，派兵侵占济南，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多人。全中国人民对此无不愤怒异常，而蒋介石却无耻地下令不准抵抗。说什么“日本要求枪枝。即以枪枝与之；要求捕作俘虏时，即听其捕作俘虏”；甚至提出“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① 拿着中国人的头颅向日本侵略者乞降，彻底地暴露了这个卖国政权的反动本质。

由于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迅速扩大了。帝国主义的对华投资，一九一四年为十六亿一千零三十万美元，一九三一年便增加至三十二亿四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美帝国主义加速对华商品输出，使中国入超猛增，一九二七年为九千四百三十万海关两，一九三一年增加到五亿二千四百零一万海关两。帝国主义还派遣了大批顾问，直接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

和文化大权，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太上皇。

蒋介石政权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则实行法西斯专政。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介石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其中，军事镇压是主要的一手。蒋介石视军队如生命，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逐步建立了一支以黄埔系反动军官为骨干的反革命军队。这支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也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仅陆军，就有近二百个师。军费的支出，约占全部军政费用支出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蒋介石还建立了庞大的特务机构，渗透在国民党的党、政、军、文化教育机关直至经济部门里。其中最大的两个：一个属于“C.C”系，一个属于蓝衣社。② 这些特务组织既采用了德、意、日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手段，又承袭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统治方法。蒋介石靠着这些反革命军队和组织，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向全国人民开展了进攻。中国人民处在旷古未有的暴政之下。

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在蒋介石上台后的五年中，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达一百万人以上。广大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革命工会被封闭解散，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厂，罢工成了“犯罪”的行为。工人大批失业。工资日益下降，仅武汉一地即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降低了工资。而工时却普遍增加了，一般由十小时延长至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地主阶级疯狂地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广大农民在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革命权力被豪绅地主所摧毁，农民协会被解散，农民领袖遭迫害。农民负担的赋税，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代。例如，江苏许多地方的田赋附加税，到一九三三年已超过

正税的十倍至二十六倍，湖南则超过十倍至三十倍。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大批失学失业。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遭到各种苛捐杂税的压榨，濒临破产。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上海民族资本家的工厂被迫倒闭、改组的约有五百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

在国内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了低潮。我们党被迫转入地下，同群众的联系受到很大的限制。党员大批被捕被害。一些在革命高潮时混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这时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有的叛变，有的脱党。党员人数从五万七千多人下降到一万人左右。工人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工会会员从二百九十万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农民运动受到了残酷镇压。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时期，有组织的农民曾经发展到九百四十多万，这时则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民族资产阶级站到了蒋介石反动派一边来反对工农，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则由动摇而离开了革命。革命的力量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头一个高潮过去了，新的高潮还未到来，革命的形势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

但是，革命发展的基础是雄厚的。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这是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矛盾，不但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一天一天在激化。毛泽东同志当时深刻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

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仍然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革命的内容，**“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正确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将革命逐步引向胜利。

第二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的发表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论联合政府》）蒋介石、汪精卫以及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党认识到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

一九二七年七月，党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并组成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八月一日清晨一

时，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领导的南昌武装起义爆发了。参加这次起义的有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原北伐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南昌军官教导团和第二十军，共三万多人。经过三、四小时的战斗，敌军全部被歼，南昌城飘起了革命的红旗。起义胜利后，立即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召开了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颁布了革命政纲。南昌起义的消息传遍四方，江西、湖南和湖北的农民纷起响应。可是起义部队没有和附近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而是企图重新占领广州，打开海口取得外援，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举行北伐。八月五日，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向南进发，经江西的临川、广昌、瑞金、会昌转入福建的长汀、上杭，再经广东的大埔进而占领潮州、汕头，沿途打败了大批堵截的敌军，但部队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九月底和十月初，这支冒署远征的孤军，在汤坑、三河坝、流沙等地，先后受到优势敌军的围攻，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起义留下的部队，一部分退到广东的海丰、陆丰，与当地的起义的农民武装会合，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同志的率领下，退出广东，经过江西，转入湖南南部，进行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的正确方面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错误的方面是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城市中心，依赖外援。

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清算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在领导权、武装斗争、土地问题上的错误，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方针，

指出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③会议还决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党必须自下而上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战争和战略问题》）“八七”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会议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没有注意掩盖着的另一个倾向，以致在着重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出现了“左”的倾向的抬头。

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提出了实行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正确主张，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代表党中央领导改组湖南省委，并积极准备发动秋收起义。八月十八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秋收起义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是要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应当以主要力量来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枪杆子推动土地革命。湖南省委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来领导这次起义。

为了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安源矿工和平江、浏阳、醴陵一带的农民自卫军中，组织革命的武装。九月八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在湖南、江西边界各县首先爆发了。参加这次起义的，有未赶上南昌起义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④，安源工人武装和平江、浏阳、醴陵、萍乡等地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

共约八千人。原计划分三路进攻：右路自修水进攻平江，中路自铜鼓进攻浏阳，左路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向浏阳挺进；三路取得胜利后，在长沙工人的配合下，会攻长沙。而起义部队在浏阳等地战斗中，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被迫退到浏阳文家市。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要占领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于是说服了其他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界南下，向井冈山地区进发。部队在进军途中，打退了敌人多次的截击，于二十九日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村。

在三湾，毛泽东同志以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精神，鼓舞指战员的革命斗志，扭转了部队由于战斗失利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接着，领导部队进行了改编，将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改编中，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班排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置党代表。全军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书记。“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

十月上旬，毛泽东同志率领这支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的大龙、茅坪，开始了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革命实践，把革命的红旗插到了巍巍的井冈山上。

紧接着秋收起义之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又爆发了广州起义。党的广东省委利用广东军阀张发奎、黄琪翔与广西军阀黄绍竑为争夺广东地盘而混战的时机，以广州工人赤卫队和叶剑英同志率领的第四军教导团为主力，发动了武装起义，并成立了工农兵政权——广州公社。但广州起义也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必要性，

队伍没有及时转移到附近海陆丰农村，同农民起义力量相结合。当国民党反革命军队五万多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围攻广州时，虽经三天三夜的血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告失败。起义的领导者张太雷同志也在战斗中牺牲。

此外，还有方志敏、邵式平同志领导的江西横峰、弋阳等县起义，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湘南起义，彭湃同志领导的广东海丰、陆丰起义，谢子长、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张鼎丞、邓子恢同志领导的闽西起义，滕代远、黄公略同志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以及湖北、河南、江苏、河北、山东、四川等地的起义。特别是方志敏同志领导的横峰、弋阳起义，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将起义队伍迅速转入山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不断扩大革命武装，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以上这些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的回击。它推动了武装斗争的发展，为创造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准备了必要的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战争和战略问题》）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适时地把革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井冈山在罗霄山脉的中段，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边区，周围有遂川、宁冈、永新、酃县以及茶陵、莲花

等县，方圆五百多里。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而革命的发展却可以影响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井冈山人民深受豪绅地主的压迫剥削，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曾开展对土豪劣绅的斗争，经受过革命的洗礼。井冈山峭壁耸立，地形险要，作战时进可攻，退可守，周围又盛产稻谷南瓜，可供军队食用。因此，毛泽东同志选定在这里首先建立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红军初到井冈山时，附近各县的党组织已被敌人破坏了，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农民自卫军原有九百七十枝枪，仅保存下来一百二十七枝，其余一概被土豪缴去。经过革命失败的打击，群众的革命情绪受到严重的挫伤。一九二七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到达宁冈的大龙、茅坪后，决定分兵到宁冈、遂川、永新、茶陵、莲花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下旬，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建立了中心根据地。十一月中，毛泽东同志乘蒋介石、唐生智之间爆发内战的有利时机，派兵向茶陵游击，建立了茶陵工农兵政府。次年一月初，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打败地主武装肖家壁部，攻占遂川城，成立了遂川工农兵政府。二月中，毛泽东同志又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攻打宁冈新城，缴枪四百多支，活捉伪县长张开阳，并建立了宁冈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打到那里，就在那里向群众作革命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各县的党组织也先后恢复起来。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都已经有了党的县委，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工农红军还帮助地方建立群众武装，并把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改编

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了。一九二八年三月，成立了井冈山红色政权——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南昌起义余下的一部分部队，在朱德、陈毅同志的带领下，从湘南来到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队伍会师。五月四日，两支革命军队在宁冈县砻市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共约一万多人，二千多支枪。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朱德同志任军长。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道路，这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农村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党领导下依靠枪杆子发展起来的。一九二八年四至七月，正是南方反动统治暂时稳定的时期，江西、湖南两省敌人，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多次“会剿”，妄图扑灭这个革命的火焰。敌军少者八、九个团，多者达十八个团，超过红军数倍。然而，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地方赤卫队的配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粉碎了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十六字诀的作战原则。在这个正确原则的指导下，红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五月初，敌人进攻遂川的五斗江，红军避实就虚，从侧面打击敌人，在黄坳、五斗江等地，消灭了来犯之敌，还攻占了永新县城。不久，敌人又来进犯，红军先在茶陵的高陇打退了湖南敌军，接着又在永新的澧田打退了江西敌军，

乘胜第二次攻克永新。六月中，号称江西劲旅的杨如轩、杨池生两个师敌军，由永新进犯宁冈。红军在龙源口、七溪岭一带，从腹背两面猛击敌军，打得敌人降的降，逃的逃，丢枪乱窜。我军乘胜追击，第三次攻克永新城。当时红军中流行着这样两句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杨）。"生动地反映了这次战斗的胜利。红军反"会剿"战争的胜利，使井冈山根据地的固定区域，扩大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的广大地区。

红军战争的胜利，推动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但在根据地初创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开展打土豪的斗争，分配土地只在少数地区试行。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这次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特委，作为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关，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大会以后，各县在特委的领导下，加强了对土地革命的领导，县、区、乡都普遍设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于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分田以乡为单位，一律按人口平均分配。极少数山多地少的地方，也有三、四个乡为一个分配单位的。同时，还开展了废债运动。通过分配土地的实际斗争，取得了初步经验，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土地革命的法令——井冈山土地法。

由于土地革命的开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深耙细作，修塘、筑陂，使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如宁冈粮食总产量，一九

二八年比一九二七年增产了百分之二十。油、茶的丰收，更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红军游击战争，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根据地的建设，对于支持红军的革命战争，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一种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红军每到一地，就帮助群众建立各级工农兵民主政权——工农兵代表会议和工农兵政府。随着根据地的发展，革命政权日益扩大，不仅各县有工农兵代表会议和工农兵政府，区、乡的基层政权也建立起来了。在红军的积极帮助下，还普遍成立了地方群众武装。村、乡有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有赤卫队。这些地方革命武装，在镇压反革命，保卫红色政权，粉碎豪绅地主的进攻，配合红军作战等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革命政府又采取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领导农民搞好农副业生产，开办为战争服务和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小工业和手工业，保护私营工商业，实行自由贸易，使井冈山区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此外，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较之过去有所发展。根据地建设的成就，使红军战争有了可靠的后方，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

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井冈山的斗争》）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的大好形势。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总结了一年来井冈山斗争的经验，选举了新特委，确定了新的任务，进一步发展了大好形势。

毛泽东同志亲自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象黑夜中燃烧着的一把火炬，照亮了亿万人民的心，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　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反对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之后，瞿秋白却借口“排除”右倾机会主义的“遗毒”，推行他的盲动主义错误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瞿秋白主持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和革命道路问题上。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瞿秋白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潮流暂时低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所谓中国革命“不断高涨”的主观主义估计。他看不到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而是幻想速胜，武断地认为全国已经具备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各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有汇合起来

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鼓吹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他认为“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梦想在完成民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盲目地鼓吹“‘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⑤。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瞿秋白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鼓吹违背中国革命实践的“城市中心论”。他宣扬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胡说党的责任是“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竭力贬低农村根据地和农民武装斗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从上述“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瞿秋白提出了一系列极“左”的政策。他反对组织有秩序的退却，主张冒险进攻。他醉心于中心城市的工人暴动，制定了在上海、武汉、天津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大暴动的计划，幻想革命在一个早上取得胜利。他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左翼，主张“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他反对区别对待地主与富农，主张一律没收他们的土地，要求在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中多杀多烧。他还提出损害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种种政策，强令各地党组织贯彻执行。

为了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瞿秋白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政策，滥用组织纪律，错误地处罚了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和地方党委。他十分恼火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诬蔑组织革命武装是所谓"单纯的军事投机"，甚至利用职权打击毛泽东同志，在组织上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处分决定。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一九二八年三月，执行瞿秋白"左"倾路线的湘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冈山，指责井冈山根据地"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就撤消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权。同时，又强令工农革命军冒进湘南，使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同志坚决抵制和批判了瞿秋白的错误路线与"左"的政策，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道路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左"倾分子否认革命处于低潮是犯了**"革命急性病"，"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同志驳斥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的谬论，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实践中，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井冈山根据地推行的错误政策，在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对待中间阶级和中小工商业者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使井冈山根据地重新得到巩固和发展。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实践中给革命造

成了严重危害，受到毛泽东同志等许多同志的反对与抵制，到一九二八年初，许多地方已停止执行，至同年四月，就在全党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三三年底，瞿秋白从上海到江西瑞金，参加革命根据地工作。红军长征开始后，曾留在中央根据地。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向敌人出卖了我党我军的机密，写了臭名昭著的自白书《多余的话》，成了可耻的叛徒。同年六月，被国民党枪杀于长汀。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正确估计革命的形势，确定新形势下的任务和方针，一九二八年七月，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等文件。

“六大”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并没有被推翻，国民党政权仍然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大会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大会并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⑧

“六大”指出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

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但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形势下，党的策略任务不是实行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认为：“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底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底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

“六大”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进一步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底先锋队——共产党指导机关底机会主义政策”，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批判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出盲动主义者在敌人力量占着绝对优势的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是一种强迫命令的军事冒险，是“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其结果是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丧失了革命的力量。这种“左”倾盲动是与党在大城市中应以争取群众为主要任务的原则相违背的，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

党的“六大”提出的上述问题，都是当时中国革命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过讨论，使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上有了明确的方针，进一步克服了由于大革命失败所引起的党内思想混乱。因此，在“六大”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主席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在我党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的。”**（《学习和时局》）但是大会也有缺点和错误，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

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没有正确估计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等。

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毛泽同志贯彻执行和发展了大会的正确方面，又在实践中解决了大会所没有解决的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的发表】　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起来的。为了坚持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驳斥“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种种责难，正确回答工农武装割据能否发展和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

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的社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的农业经济，农村可以不完全依赖城市而相对独立。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有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中国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分裂和不断的战争，削弱了反动政权的统治力量，而农村则是这个反动统治锁链中最

薄弱的环节。**“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如湖南、江西、广东、湖北等省，曾经有过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潮，有过工会和农会的组织，群众经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这些，都为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矛盾，这是革命基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但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社会矛盾，而且必然加深矛盾的发展。**“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革命武装，就没有革命根据地。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是保证红色政权得以坚持和发展的最要紧的条件。建立红军，土地革命，建设根据地，都必须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就能使革命根据地获得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开创的这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设根据地这三位一体的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没有革命武装，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也不能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发动农民群众，红军战争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不建设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而将陷于失败，土地革命的成果就无法保持。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分析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毛泽东同志创造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反对陈独秀取消主义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撮右倾投降主义者，对革命完全丧失信心，变成了可耻的取消主义者。陈独秀反对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诬蔑党所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为“流寇运动”，主张开展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一九二九年七月开始，陈独秀连续给党中央写了三封信，鼓吹托洛茨基主义，提出了一整套取消主义的政治主张。陈独秀认为蒋介石反革命政权的建立，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封建势力“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

余”⑦。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结，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并将得到和平的发展。无产阶级要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搞“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央还没有决定答复之前，陈独秀擅自将自己给中央的信发给地方党组织，同时还在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机关报上发表。陈独秀并在党内组织秘密小集团，进行宗派活动，煽动党员起来反党，妄图分裂我们的党。

我们党对陈独秀的反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严肃地批判了陈独秀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和反党分裂活动，指出陈独秀必须服从中央的决议，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停止一切反党活动。但是，陈独秀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不接受党的警告，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继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党中央决定将陈独秀及其同伙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就公开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他们和托派分子刘仁静等勾结在一起，组成了托陈取消派，即所谓“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奉托洛茨基为首领，在上海设立中央机关，由陈独秀充当“总书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即托陈取消派的纲领。这个反革命纲领打着托洛茨基主义的黑旗，提出了六项“奋斗目标”，公然为托洛茨基翻案，叫嚷要“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实质上就是反对我们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特别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

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我们党坚决地批判了陈独秀一伙的取消主义，彻底地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叛徒嘴脸。以后，托陈取消派分子公开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等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进一步堕落为汉奸、卖国贼。

第三节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著作的发表。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工农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由湘东北平江起义部队组成的红五军到达井冈山，在宁冈与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革命的声势。这时，蒋介石又调动湘、粤、赣三省十八个团的兵力，以湖南军阀何键为总指挥，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新的“会剿”。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攻和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井冈山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在宁冈白露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向赣南敌后出击，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不久当敌人向井冈山进攻时，彭德怀即置井冈山根据地于不顾，擅自率领红五军去赣南。

一月中旬，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红四军进军宣言和布告，通俗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当前任务与政策，号召工人、农民、士兵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斗争。二月，红四军经会昌、瑞金县境，在大柏地打垮了跟踪之敌，乘胜进占宁都。接着，三次进军闽西，**“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第一次，在长汀附近，消灭了地方军阀郭凤鸣旅。三月底，回师赣南，占领兴国、瑞金、雩都、广昌等县，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五月，再次入闽，二十三日攻入龙岩城。七月，又消灭了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十月，第三次入闽，在上杭消灭了地方军阀卢新铭旅。至此，完全铲除了闽西的敌军，并先后攻克了长汀、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宁洋、漳平等地。一九三〇年初，红四军经过宁化、清流、归化，回师赣南。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红军新开辟的赣南、闽西各县根据地，都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一九三〇年二月，赣南工农民主政府在东固成立。当地发展起来的武装编为红三军。三月，闽西工农民主政府在龙岩成立。当地发展起来的武装编为红十二军。六月，以红四军为骨干，同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党还在其它地区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六月，红五军奉命转回井冈山，使得湘赣边区逐步恢复起来。次年，湘赣区与湘鄂赣区联成一片。原湘鄂赣区发展起来的红八军、红十六军与红五军合编为红三

军团。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赣东北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第二年夏，赣东北红军与闽北独立团合编为红军第十军。根据地扩大到闽北、浙西、皖南，形成了闽浙赣根据地。一九三〇年，洪湖根据地的游击队编为红六军，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编为红二军。六月，红六军与红二军组成红二军团。一九三〇年春，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个区联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据地，并建立了鄂豫皖特区工农民主政府。三个区的革命武装合编为红一军，以后又和鄂中的红十五军组成红四军团。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广西右江成立了红七军，并建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一九三〇年二月，左江成立了红八军，并建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广东的东江和海南岛也发动了游击战争。一九三〇年，成立了海南岛工农兵政府，建立了红军琼崖独立师。一九三一年，陕甘边境开展了游击战争，第二年创立了陕甘根据地，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

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后，土地革命就在这里蓬勃地开展起来了。红四军所到之处，传遍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一九二九年三月，红四军到兴国时，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政纲中已提出“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山林，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借约”等主张。八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红四军要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亲自在农村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对闽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作了具体的指示。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闽西根据地的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长汀等县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近八十万人动员起来，投入了土地革命斗争。

先是发动烧田契、分谷子、派款、抗租，接着又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出现了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一九三〇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条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保护中小工商业的土地革命路线。与此同时，党在湘赣、闽浙赣、洪湖、湘鄂西和鄂豫皖等根据地，也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革命斗争。

【古田会议的召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　随着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战争的迅速发展，工农红军的队伍也日益扩大。这时，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战斗中，进一步强调了要在党和红军内进行路线教育，并建立了军队中的民主制度，确定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一九二八年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第一次为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同年夏，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一九二九年以后，将三大纪律中的第二条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条改为“筹款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并补充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同志同时还规定了红军要执行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等三大任务。

但是，在红四军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建党建军思想的激烈斗争。红四军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在：否认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出什么“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否认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认为红军的任务只是单纯地打仗；轻视军队的政治工作，对士兵或打骂，或放任自流；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片面主张军官的权威高于一切，不要军队的民主制度，不注意群众纪律，轻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提倡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一九二九年七月和十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和上杭，先后召开了第七、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控制下，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权，迫使毛泽东同志离开了前委的领导岗位。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指导下，战事不断失利，部队遭到很大的损失。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才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十一月底，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了前委书记的领导岗位。毛泽东同志在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后，十二月底在福建上杭古田村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党建军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批判了红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为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的人民军队，规定了基本路线。

古田会议提出，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中的根本原则。**“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否定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主张军事领导政治，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思想如**

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红军必须担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任务，这是人民军队建设中的又一根本原则。**“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认为红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农村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这是一种流寇主义的思想，它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因此，**“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红军内部必须实行官兵一致、全军一致的原则。在提倡民主的同时，要坚持严格的纪律，并从组织制度上加以保证。决议提出，**“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古田会议规定了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路线。决议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加以肃清。指出党的思想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为此，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

的方法”，“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在强调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建党的同时，决议还十分重视党在组织上的建设。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着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小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强调**“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制定了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路线。

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实践证明，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它永远照耀着我们胜利前进的航向。

在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过程中，当时的红四军一纵队领导人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以“流动游击”的错误路线，同毛泽东同志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从闽、浙、赣三省敌人较弱，群众基础较好的情况出发，提出了利用国民党蒋、桂两派的矛盾，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但林彪却反对这一正确的决策。他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形势，而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一遇到暂时的局部挫折，就认为革命形势未可乐观，革命前途渺茫得很，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林彪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没有由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他胡说距离革命高潮

尚远，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主张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待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可以形成所谓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了。林彪甚至公开对抗前委的决策，主张到福建、广东、江西边界进行流寇式的流动游击活动。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红四军瑞金会议上，他的这种观点表现得最为明显。

针对林彪的上述错误，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和深刻的批判。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指出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日益加深，各被压迫阶级迫切要求起来斗争的事实，断定中国革命高潮是会很快到来的。从这一科学分析出发，毛泽东同志得出了**“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这个著名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认清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统治阶级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全国规模的发展，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口号的正确，就会明白红军和游击队以及红色区域能够存在和发展。**“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只要认清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单纯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还驳斥了用“流动游击”代替建立农村革

命根据地的谬论，指出只有集中兵力，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建立了红色政权，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效力。因此，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光辉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提出了党必须集中主要力量去领导土地革命，开展红军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促进革命高潮的思想，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的理论。

【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　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到一九三〇年春，全国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先后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闽浙赣、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右江、海南岛等大块革命根据地。红军扩大到十四个军近十万人，战斗在十余个省二百多个县，并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有利时机，打了一些胜仗。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党内有一些犯革命急性病的人，过高地估计了有利条件和革命力量的增长，“左”倾情绪有了新的滋长。当时在中央负实际领导责任的李立三就神气起来了。一九三〇年六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把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的决议案，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

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道路和军事问题上。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李立三作出了完全主观主义的估量。他片面地夸大政治形势有利于革命的方面，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他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胡说“群众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只要大干，不要小干”⑧，全国已经具备了“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他根本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武断地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在任何地方都一样，“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他主张必须马上起义，而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他进而否认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幻想中国革命引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并同时取得胜利。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李立三继瞿秋白之后，又鼓吹“一次革命论”，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宣扬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时候，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民主革命不只是要没收土地，“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的武器”。胡说若不坚决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就是革命的自杀政策。”

在革命道路与军事问题上，李立三继续鼓吹违背中国革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污蔑它是“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是“农民意识的反映”。李立三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动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

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他命令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中心城市的党组织，立即组织总同盟罢工和举行武装起义。他主张幼小的红军“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企图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他污蔑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是所谓“旧的军事观念”，“是严重的右倾错误”，荒谬地要求根据地党组织放弃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把所有武器甚至连“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

为了贯彻这个冒险计划，李立三决定将党、共青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这些组织的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变相地取消了党作为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的领导作用。李立三提出了“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的极“左”的口号，命令各地红军主力攻打南昌、九江、长沙、桂林、宜昌等城市，以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幻想造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胜利局面。李立三为了推行其错误路线，还大搞一言堂，不但拒绝党内的正确批评与建议，反而利用反“右倾”的口号，对不同意他的路线的同志任意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错误地打击了不少党员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宗派主义。

由于立三路线的贯彻，使得经过艰苦斗争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又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一九三〇年七月，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乘蒋介石调湖南军阀何键部参加军阀混战，长沙空虚的时机，一度打进了长沙。李立三被这偶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立即下令全面进攻大城市。结果，红七军远离广西右江根据地北上攻打柳

州、桂林，全军由六千人缩减到二千多人，丢了右江根据地，不得不转移到江西根据地。红二军团离开洪湖和湘鄂西根据地去攻打武汉，全军二万多人缩减到一万多人。红十军离开闽浙赣根据地去攻打九江，全军二万人缩减到三千人，不得不退回老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党组织，因执行李立三路线，也受到重大损失，有的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

毛泽东同志始终不赞成立三路线，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一九三〇年七月攻入长沙的红三军团，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不过十来天，就退出长沙。之后，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浏阳会师，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同志任总政治委员，朱德同志任总司令。这时，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客观形势，抵制了立三路线，耐心地说服中央代表和红军中的一些干部，放弃再次攻打长沙的计划，而率领红一方面军挥戈东进，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十余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这样，不仅避免了损失，而且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发展了革命力量，使红一方面军增加到四万人。

立三路线统治全党的时间很短，但是损失很大。一九三〇年九月，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组织及其经常工作。以后，李立三即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一个时期的中央，对停止立三路线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斗争的方法有缺点，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也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

【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以后，罗章龙右派以为有机可乘，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当时，罗章龙是党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负责人。他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追随陈独秀，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的“六大”批判机会主义时，罗章龙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对“六大”路线，一直抱消极抵制的态度。当立三路线被纠正后，罗章龙却对中国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认为党和中国革命已经被立三路线破坏完了，革命高潮已经完结，革命已经彻底失败，中国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也不能胜利。他公开拥护托陈取消派的反革命主张，甚至狂妄地叫嚣要把陈独秀、彭述之等托匪分子“请回”到党和党的领导机关中来。他恶毒咒骂工农红军，反对**“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胡说当时党的头等任务，不是领导武装斗争，不是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作细小的经济斗争。罗章龙鼓吹的完全是一条取消主义路线，其实质就是要葬送中国革命，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得到巩固。

这条路线刚在党内出现的时候，就遭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罗章龙右派就进一步采取分裂党的阴谋手段，企图以组织上的分裂主义来实现它在政治上的取消主义。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罗章龙背着党中央，煽动党的某些地方组织，策划召集所谓“紧急会议”，妄想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他们非法把持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路工会党团和江苏等地的一些地方党组织，进行反对党中央的分裂活动。他们作出右倾分裂的决议，散布反党反革命的言论，为另立中央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一九三一年一月，罗章龙右派抛出了反党纲领，

并成立了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公开揭出了分裂党的黑旗。

我们党对于罗章龙右派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严肃地指出，他们的反党纲领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另立“第二党”的行为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能允许的。罗章龙右派的反党行动遭到党的揭发和批判以后，他们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和改悔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活动，甚至用散布传单的方式，将党的干部名单向蒋介石匪帮告密，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我党组织。

罗章龙的一系列反党分裂活动，进一步暴露了他的真面目。在非法的所谓“第二党”出现后，广大党员和干部，包括曾经受过罗章龙的欺骗和蒙蔽的一些同志，都纷纷起来为保卫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统一，向罗章龙进行坚决的斗争。罗章龙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完全陷于孤立。一九三一年一月底，中央政治局决定将罗章龙永远开除出党。此后，罗章龙一伙与托陈取消派合流，堕落为反革命。

【工农红军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农村土地革命的深入，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一九三〇年十月，蒋介石结束了对冯玉祥、阎锡山的混战之后，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十一月，蒋介石调动了十万军队，以国民党反动政府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敌军兵分八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

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一线，形成半圆的包围圈，妄图把红军消灭在东固地区。红军约四万人，集中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出在强敌进攻面前，兵力不是要分散，而是要集中，不是先向敌进攻，而是先退却，把敌人引诱到对我有利的作战地区，然后集中红军主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次“围剿”的敌军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是主力，张又是前线总指挥。红军如能消灭这两个师，“围剿”就基本上被打破了。这两个师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当地群众条件好，龙冈又有优良阵地。于是红军决定一次打一个师，第一仗先打张辉瓒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红军在龙冈布下了天罗地网，主动引诱敌张辉瓒进入我军伏击阵地。三十日下午四点，红军集中全部主力，以优势兵力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冒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太阳还未下山，战斗就胜利结束，全歼敌军九千人。一战胜利，吓得谭道源师向东韶逃跑，许克祥师向头陂逃跑。我军又乘胜追击谭师，于一九三一年元旦消灭了它一半。红军在五天内打了两仗，共歼敌一万多人，缴枪一万三千枝。这次胜利，威震四方，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遵照毛泽东同志**“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红军迅速分散在广昌、宁都一带发动群众。仅仅三个月，红军就在这一带广大地区发动了数十万群众，组织了地方武装，建立了红色

政权。

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经过四个月的准备，又调动二十万军队，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敌军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针，从赣江一直延伸到建宁，构成一条八百里长的弧形阵线，分四路向红军合围而来。这时，红军只有三万多人。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决定先打敌军较弱的两个师。五月间，红军在富田地区向敌王金钰、公秉藩两师发起猛烈的进攻，将其大部歼灭。接着，乘胜从富田向东出击。**“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从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的半个月中，红军从富田一直打到七百里外的建宁，横扫敌军的弧形战线，打了五个胜仗，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一个月以后，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又调集三十万军队，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次，蒋贼自任总司令，带了德、英、日等国军事顾问，跑到南昌，亲自押阵。敌军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三路气势汹汹地闯入根据地，妄图一举把红军消灭在赣江东岸。当时，三万红军还远在建宁发动群众。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率领红军主力从建宁绕道千里，急行军转到敌人的后侧兴国集中。然后，突然从兴国向东出击，一连攻克良村、黄陂等地。五天之内，三战三捷，将敌军中较弱的三个师一一击破。敌军发现红军主力在其背后，急忙掉头东进，猛扑黄陂。红军以一部分兵力把敌军引向东北方向，主力则从敌之空隙插回兴国休整。当敌人发觉后调头西进

时，红军主力已经从容地休整了半个月。敌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跑，被动挨打，饥疲沮丧，到处扑空，无能为力，不得不在九月退却。红军乘敌人退却的时机，再歼敌一个师又一个旅。前后三个月，红军共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枝，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成为拥有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的红色区域。其他各根据地也有发展。全国红军扩大到十万人，赤卫队也发展到十几万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第四节　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　在中国革命逐渐走向高潮的形势下，党内的“左”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三一年初，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王明，原名陈绍禹，于一九二五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学习时，他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集团。一九三〇年前后，王明及其同伙相继回国。当罗章龙从右的方面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时候，王明却从极“左”方面来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

央。他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却又说什么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⑨。他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自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全部真理”，到处招摇撞骗，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他俘虏了一部分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作助手，从各方面对党施加压力，迫使党中央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战争和战略问题》）从此，开始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

同年二月，王明在党内发表了他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陆续写就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大毒草，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在这个小册子里及其以后所炮制的许多决议案中，王明对于中国革命提出了一系列的错误主张，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更有“理论”、气焰更嚣张、形态更完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王明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荒谬地提出“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他对中国的阶级关系根本不调查，不研究，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提，要在民主革命中打击“一切剥削者”、打倒“一切资本家”，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不承

认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因而，推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

在革命形势和策略问题上，王明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分”⑩，盲目地鼓吹所谓“进攻路线”，推行冒险主义。在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王明认为“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的尖锐，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要求“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⑪，冒冒失失地去进行战略决战。

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王明轻视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作用，宣扬城市工人暴动是“中心”，顽固地推行“城市中心”论。王明根本不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闭着眼睛瞎说我国“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和“真正的”红军，竭力反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他要求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战争配合城市工作，攻占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⑫，梦想以此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

在组织路线上，王明实行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和党内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王明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他首先对党的中央机关进行“改造”，并把这种所谓“改造”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地方党组织。他以太上皇自居，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向全国各地派出他的代理人，打着“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的旗号，篡

夺党政军各级领导权，以贯彻其错误的政治路线。对于反对他的错误路线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等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怕是极微小的和刚萌芽的倾向，都要给以残酷的无情的斗争”⑱。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瑞金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中央的宁都会议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污蔑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两次会议还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权，改变了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左”倾关门主义使有利形势的丧失】　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美、英、法、德、日、意等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独占中国的野心，加紧了对我国的武装侵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驻沈阳附近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占领了沈阳，同时进攻东北其它重要城镇。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蒋介石政府实行投降卖国政策，下令东北军队不得抵抗：“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⑲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自动撤至山海关以内，使日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进攻上海的战争。上海工人和各阶层人民奋起抵抗。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抗战。上海抗

战坚持了一个多月。但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从中进行破坏，和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⑬，出卖了上海抗战。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我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在东北，广大群众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协助之下，组织了抗日武装，走上了抗日前线。抗日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遍布于白山黑水之间。据估计，到一九三二年春，东北抗日武装总人数在三十万人以上。一九三四年，我党将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统一组成“抗日联军”，共编为六个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广州、福州、武汉、南昌、青岛等各大中城市，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的群众运动，工人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是要求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外抗日，对内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连国民党营垒也发生了分裂。一九三一年十月，国民党东北军马占山部违反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日寇由辽宁向黑龙江进犯时，进行了武装抗击。十二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响应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了红军。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在察哈尔与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同盟军，宣布对日作战。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冲击下，国民

党反动派总头目蒋介石，也被迫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度宣告“下野”。

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组织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使形势朝着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对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实行了许多错误的政策。

他们不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而错误地认为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因而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⑯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⑰的错误口号，使党脱离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他们看不到“九·一八”事变后国内中间阶层的抗日要求和反革命营垒的分化，强调国民党反动派和中间派别的反革命一致性，鼓吹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⑱。他们否认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反对北方落后论”的口号下，要求在北方农村普遍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军中普遍地组织哗变。他们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中心城市，采取进攻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群众的赤色团体，经常无条件地号召举行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

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的贯彻，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了几乎百分之百的损失，丧失了“九·一八”以后的有利形势，给蒋介石有机可乘，得以重新组织反革命力量向革命进攻。一九三二年一月，蒋介石勾结亲日派汪精卫以及西山会议派，结成反革命联盟，重新上台，更加疯狂地进

攻红色根据地和镇压人民抗日民主运动。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农村根据地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著作的发表】

一九三二年夏，蒋介石经过短期的策划，自任总司令，发动了对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敌人先集中力量向鄂豫皖区和洪湖区发动进攻。鄂豫皖根据地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红军第四军⑩、第二十五军等部组成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开始时曾给进犯的敌军以重大的打击。但当时窃据红四方面军领导职位的张国焘，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已经是“偏师”了，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因而不作继续反“围剿”的准备。当敌人再次进攻时，又惊惶失措，没有得到党的允许，便率主力于一九三二年十月退出鄂豫皖区，转到了川陕边界。红二军团也退出了洪湖区，转移到湘鄂川黔边境。

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以陈诚、罗卓英等部为主力，用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敌人分三路向广昌推进，企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的主力。由于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在中央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贯彻，红军仍按照毛主席的军事原则，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在宜黄南部之黄陂、大龙坪、登仙桥，红军用大兵团伏击，歼敌两个师。三月二十一日，又在霹雳山、雷公嵊，围歼敌人一个师，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中央根据地在这次反“围剿”胜利后，向浙赣边界发展，与闽浙赣根据地联成了一片。红一方面军发

展到十万人，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有了发展。至此，全国红军扩大到三十万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出现了新局面。

从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开始，各根据地先后开展了查田运动。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敌我争夺十分激烈，根据地的情形极为复杂。不少地区的封建势力还没有来得及肃清，有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混入了乡村党政机关和民众团体，土地革命的果实没有完全落到广大贫雇农和中农的手里。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工农民主政府首先在瑞金等地发动了查田运动。一九三三年六月，毛主席召开了石城、宁化、长汀、汀州、瑞金、于都、宁都、胜利等八县查田运动大会，批判了包庇地主富农的右的错误，反对了侵犯中农利益、打击中小工商业、消灭富农的极“左”政策。会后，广大农民和干部纷纷动员起来，查阶级，查田地，重新没收地主隐匿的土地财产，重行分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查田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一九三三年七、八、九三个月的统计，中央根据地闽、粤、赣三省共查出了隐瞒成份的地主、富农一万三千六百多户，收回土地三十一万七千余担。查田运动的开展，进一步解决了农村土地问题，打击了反革命，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例如瑞金县壬田区，不到两个月就扩大红军七百余人，卖给红军谷子一千九百余担。一九三三年，中央根据地的农业收成，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根据地建设却受到了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一九三三年初，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临时中央，在白区工作遭到破坏被迫迁入中央根据地后，进一步排斥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变本加厉地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他们放弃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采

取“竭泽而渔”的方法，片面地强调动员全部财力、物力，同强大的敌人拼消耗，致使根据地社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他们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改政策，和消灭富农经济、打击中小工商业的经济政策，干扰了土地改革和查田运动，影响了根据地的生产。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扩大主力红军，不注意地方武装的建设。他们否定正确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和官兵关系，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取消了红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要任务。

为了抵制和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在被夺了权的情况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和党的利益，自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到一九三四年初，在根据地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重要著作，总结了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关于人民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伟大思想。

毛主席明确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因为，只有开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才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从物质上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才能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才能从经济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巩固革命根据地。因此，动员根据地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就成了当时党和工农民主政府的一个重大任务。毛主席还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规定了基本原则：**“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

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政策》）并规定了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奖励发展私人经济同时并进的方针，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毛主席强调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此，党和红军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紧密地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全力支持革命战争。

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中心问题，是实行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毛主席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各阶级、阶层的状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制定了正确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把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严格地区别开来，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党的政策。这样，就从农村阶级关系上进一步解决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策略问题，批判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各项“左”的政策。

毛主席的这四篇光辉著作，代表了我们党关于建设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制定党对农村各阶层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起着指导作用，才使根据地的军事、政权、经济等方面的建设获得了很大的成绩，长期支持了红军的反围攻战争。

【王明“左”倾路线对红军战争的危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准备，一九三三年十月又调集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向我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并以五十万兵力集中进攻我中央根据地。在这次反革命“围剿”中，蒋介石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战术，采取了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作战方法，仅在中央根据地周围就修筑了近三千座碉堡，企图从四面包围、压缩、蚕食我根据地，逐渐消耗我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最后迫使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目的。蒋介石的这一次进攻虽然比过去严重，但这时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红军有了很大的发展，又有几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条件是有利的。根据地广大军民斗志昂扬，决心消灭来犯之敌。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继续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那末，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导致了这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九三四年一月，临时中央召集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全会是王明路线发展的顶点。会议不顾“九·一八”事变以来形势的发展，盲目地宣称“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

存在着”，断定第五次反围攻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它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说什么：“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

与政治上的冒险主义相适应，王明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并逐步在红军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要求红军实行所谓“正规化”，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反对红军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的方针，要求实行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他们反对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上的速决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正确方针，要求“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他们以这套错误的所谓“新原则”代替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敌军为割断中央区和闽浙赣区的联系，首先占领了黎川。红军由福建回师北上，在洵口打了一个遭遇战，歼敌一个师，获得了胜利。但是，他们违反“**慎重初战**”的原则，不把洵口战斗看作是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震惊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急于收复黎川，冒险地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结果，红军在硝石一战不胜，资溪桥再战又不胜。以后，就辗转寻战于临川、金溪、黎川地区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被蒋介石调来福建从东线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共同抗日反蒋。这正是红军消灭敌人的良好时机。毛主席力主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赣南闽西的敌人回援其统治中心。这样，既可粉碎敌人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又援助了福建人民政府。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拒绝采用这一扭转战局，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的正确措施。**“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又集中全力进攻红军。敌我双方在宁都、建宁、泰宁地区，相持达九个月之久。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拼命主义。他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们捧着消极防御当宝贝，把兵力分得很散，强使红军在敌人的堡垒面前，构筑工事，进行短促突击，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他们企图用消极防御来“顶”住敌人，其结果却使自己丧失了主动，既未能消灭敌人，也未能保住根据地。红军在广昌战役失利后，即退守兴国、宁都、石城一线。接着，在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战役中，“左”倾机会主义者继续推行消极防御路线，使红军有生力量又遭受严重

损失。到了一九三四年，反“围剿”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之久，红军在错误路线的危害下，被压缩在敌人堡垒线的包围中。这时，毛主席再次提出以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又拒绝这样做。**“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工农红军开始长征。遵义会议的召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一九三四年七月，红七军团由江西瑞金北上抗日，经福建、浙江、安徽转入赣东北。十月，在江西德兴附近，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师，组成了红军第十军团，又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继续北上的征途中，红十军团多次打破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不少胜利。十一月，进到杭州、芜湖附近一带。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赣东北的怀玉山，遭到国民党十倍于我的优势兵力的围攻。红军英勇突围后，继续在闽浙赣根据地坚持斗争。在突围中，方志敏同志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头目，包括蒋介石在内，用尽各种方式来劝降。面对着敌人的威胁和利诱，方志敏同志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以“我们为革命而生，愿为革命而死”的大无畏精神，回击了反动派的无耻伎俩。在敌人的法庭和监狱里，他义正词严地斥责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卖国罪行，宣传了我党的革命主张。一九三五年七月，方志敏同志英勇就义于南昌。

一九三四年八月，紧接着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后，湘赣区的红八军和湘鄂赣区的红十六军组成红军第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先遣部队，开始突围西征。十月，红

六军团在贵州东部与红二军团会师，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由任弼时同志任政治委员，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二、六军团在桑植、石门、印江等地开展活动，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八十多个团的“围剿”，部队发展到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连同中央机关共八万多人，从江西瑞金、雩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西转移。党中央决定，由陈毅同志等率领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三万余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陕甘边区以外，也先后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初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长征开始前，他们既不在红军和干部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不认真进行战略转移的组织准备。长征开始后，他们以消极的防护作战，来掩护整个部队和庞大机关的转移，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那时，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了四道防线，阻拦红军前进。广大红军战士和干部前仆后继，英勇作战，渡漳水，占宜章，过粤汉线，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防线。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在和红二方面军的会合上，不顾一切地命令红军硬攻硬打。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红军与敌军激战一星期，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却使部队损失过半。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中央红军已减员至三万多人。党和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如果再和优势敌人硬打硬拚，红军就有覆没的危险。在这个紧要关头，毛主席力主放弃和红二方面军

会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使被动转化为主动。毛主席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支持。十二月，红军攻克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决定向贵州前进。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

第五次反围攻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损失，使广大干部和党员逐渐认清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觉悟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攻失败的教训，集中在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王明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攻’的主要原因。”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决议强调指出，当前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会议撤换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领导职务，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

遵义会议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是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我们党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奋斗，从胜利与失

败，前进与后退，扩大与缩小的多次反复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毛主席才是自己的伟大领袖，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是流了多少鲜血，付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从此，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永远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胜利前进！

第五节　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的斗争。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反对张国焘逃跑主义的斗争。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红军广大指战员后，人人欢欣鼓舞，个个斗志昂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红军经过整编，精简了机关和后勤部队，丢掉了笨重的辎重物资，采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中央红军北上经桐梓渡赤水河时，四川军阀急忙调集三十六个团的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并构筑碉堡封锁了长江。红军遂改变计划，西进至滇东北之威信。蒋介石又调国民党中央军奔集阻拦。红军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城，消灭了贵州地方军阀的两个师。接着，我军同敌追击部队周浑元、吴奇伟部展开激战，一直打到乌江边，歼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来不及渡江的，悉数被歼。这一战役，共歼灭敌人二十个团，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三月，我军又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布置封锁线，企图围歼我军于长江以南。但红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他唯恐红军夺取贵阳或东出湘西，慌忙调集云南军阀部队至贵阳及其以东地区，妄图阻止红军前进。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三军团占领倪儿关，掩护全军通过湘黔公路，然后分两个纵队向云南进发。四月下旬，红军进逼昆明。云南军阀龙云主力东调，后方空虚，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准备死守。我军却虚晃一枪，分三路向金沙江挺进，连夜急行军，抢占了绞车渡，用七只小船，经九天九夜，于五月初，全部渡过金沙江。当敌军大队赶到江边时，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于敌军之间，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途中大量歼灭敌人，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我军于川滇黔边境的反革命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我军作战史上的光辉典范！

红军巧渡金沙江后，党中央在会理召开会议，粉碎了林彪、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阴谋夺权的反党分裂活动。会后，红军继续北上，进入大凉山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红军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宣传了红军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主张，揭露了蒋介石反动派挑拨汉彝两族人民关系的阴谋，释放了被国民党政府监禁的

几百名彝族人民。依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地区，赶到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我第一师连夜渡河，扫清北岸的敌军，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随即沿着大河东岸，同河西的第二师夹河而上，五月二十五日，西岸红军开始强夺泸定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桥身由十三根铁索组成，桥下是惊涛骇浪。红军二十二个勇士，组成突击队，手持步枪，身背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密集的弹雨，攀着铁索，冲过桥去。接着，后续部队也冲过了桥，占领了泸定。三十日，红军大队人马从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在汉源，红军击溃了四川军阀的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遇到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的险阻。夹金山，海拔四千多公尺。山上白雪皑皑，积雪最深处有十几丈，掉下去就再也爬不上来。山中气候恶劣，瞬息万变，空气稀薄，使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困难吓不倒英雄汉！红军战士手拉着手，坚定地向前迈进，走不动的扶着走，不能走的抬着走，终于翻过了第一座大雪山。六月十六日，中央红军在川西北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自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退到川陕边境后，和当地川东游击队会合，以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建立了川陕边区根据地，部队扩大到八万余人。川陕根据地红军在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九月，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从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张国焘就被蒋介石在第五次围攻中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

退却路线。一九三五年三月，在胡宗南匪军进攻下，张国焘竟自动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向四川西康边界退却。

懋功会师后，党中央政治局于六月十八日作出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⑳，迎接全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二十六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毛主席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抗日，在抗日前线的西北部战胜敌人，开辟新的根据地，使党和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但是，张国焘却反对毛主席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就已成立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企图使红军退却到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去。这时，他主张红军向康藏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党中央、毛主席拒绝了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决定红军继续北上。

两河口会议后，毛主席率领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于七月到达四川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张国焘不但坚持他预定的退却计划，而且妄图按照他的意志改编红军。为了同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和宗派分裂活动作斗争，八月初，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由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低落，而是继续向前发展。因此，过分夸大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革命的力量，

从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会议再次肯定了红军继续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强调了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和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分裂主义。在经过尖锐的斗争和耐心的说服教育后，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党中央的北上抗日的方针。

毛儿盖会议后，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一、四方面军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组成，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主力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组成。右路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从毛儿盖出发，来到了纵横数百里，人烟稀少的水草地。草地到处是淤黑色的水，人吃了就会中毒，伤口泡了就会红肿溃烂。草茎和腐草结成“泥潭”，人在上面走过，一不当心，就会陷下去。加以天气变化无常，行军途中缺乏粮食，真是困难重重。但是，最大的困难也吓不倒共产党人。红军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斗争，终于在茫茫的草地上踏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胜利地越过了草地，到达四川西北的巴西。左路军由朱德同志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从卓克基出发后，原定经上下阿坝出草地，进至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路线，当左路军通过草地进至阿坝后，他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命令，反诬中央红军是逃跑主义，公开在军队中进行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甚至阴谋以武力截击中央，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紧急形势下，党中央于八月二十九日在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脱离危险区域，同时

把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支队，以实现毛主席的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部署。

九月初，红军北上抗日支队从巴西出发，渡包坐河，进入四川俄界。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会议，听取了毛主席《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会议严肃地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反党、分裂红军和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展开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会后，毛主席率领部队沿白龙江前进，到达甘肃东南部腊子口。腊子口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是一条长约三十米，宽三米多的隘口，它是甘南和岷县的天然屏障。蒋介石用了三个团守在隘口，妄图阻止红军北出甘南，阴谋将我军消灭于雪山草地。红军一方面发动正面进攻，一方面机智地攀上陡峭的石壁，绕到守敌的侧后，夹击敌人。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于九月十七日突破了天险腊子口，并乘胜追击，歼灭了大部守敌。接着，红军越过岷山千里雪，到达甘南之岷县、西固间的哈达铺。以后，又连续突破了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和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跨过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高峰——六盘山。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旗镇，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红军越过岷山之时，写下了歌颂这个历史性的长征的光辉诗篇：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十二个月中，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红军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它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人民群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了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播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在中央红军向陕北进军时，原来活动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第二十五军，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组成了红军第十五军团。十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陕北胜利会师。当时，蒋介石正向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下，陕北根据地处于非常危急的境地。十一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

在毛主席的指挥之下，经过充分的准备，以少数兵力诱敌进入直罗镇，而以主力埋伏在镇的南北两边山地。第三天下午，敌一〇九师开进直罗镇。两路红军象两只铁拳同时砸向直罗镇，敌人纷纷瓦解逃窜。不到两小时，红军就占领了直罗镇，全歼敌人一〇九师。接着，又乘胜追击，歼敌一〇六师一个团，并迫使敌一〇八师、一一一师退回甘肃境内。从东路进犯的敌一一七师，也随着退出了鄜县。正是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挽救了陕北根据地，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毛主席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的破产】　张国焘截击中央的阴谋破产后，擅自率领被其欺骗和控制的左路军以及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南下，重过草地，翻雪山，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逃跑。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张国焘野心毕露，不顾其他同志的反对，在绰木碉宣布成立他自己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自命为“主席”，公开打出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黑旗，严重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与团结。

毛主席、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伪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的决定。但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的命令，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在他的退却路线的危害下，红四

方面军遭到了严重的挫败。部队重过草地南下。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都不利，行军途中没有粮食，严冬时节没有棉衣。在天全、芦山停留三个月，受到敌人的多次围攻，部队损失很大，而张国焘却举棋不定，直到部分阵地被敌人突破，才不得不退到西康的甘孜一带，仍企图向青海西宁方向逃跑。

这期间，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奉命开始长征，转战湖南、贵州、云南广大地区，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七月初，红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由任弼时同志任政治委员，贺龙同志任总指挥。这时，张国焘又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红二方面军同意他的错误路线，共同反对中央。但这一罪恶企图遭到红二方面军的拒绝而完全失败了。由于毛主席、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的原则，由于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纷纷起来同张国焘作斗争，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毫无出路，最后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他的一套伪中央的组织机构，表面上同意北上，实际上仍然野心不死。一九三六年七月，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分左、右两路军北上，经东谷、阿坝、包坐，再过雪山草地，十月到达甘肃的会宁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也转战到这一带前来迎接。于是，全国的三大主力军，在会宁地区会师，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的任务。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壮大了革命的声势，使我们党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建立了巩固的阵地。

会宁会师后，张国焘仍在继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他

假借中央名义，提出什么“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等口号，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两万五千余人组成西路军，于十月二十六日由甘肃靖远西渡黄河，向青海西进。部队到达甘州、肃州地带，即被国民党军队辗转包围，虽经广大指战员英勇抗击，仍遭惨败。最后只剩下八百多人，从祁连山突围到新疆，经党中央的营救，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回到延安。

一九三七年四月，毛主席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反党行为，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并作出了系统的总结。会议指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原则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中已经开始出现，在川陕根据地时已发展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区到成立伪中央，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则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会议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艰苦奋斗，英勇苦战的革命精神，并对此表示深切的敬意。指出过去红四方面军在路线上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会议号召全党全军在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积极完成党的伟大任务。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对于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仍尽力进行教育和挽救，重新分配他担任负责的工作，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

张国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口头上表示接受党对他的错误路线的批判，并发表声明，表示“今后绝对忠于党的路线”，实际上却准备最后叛党。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借口去陕西中部祭黄帝

陵，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跑到西安和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的怀胞，成了可耻的叛徒。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整顿党的作风》）四月十八日，党中央决定将叛徒张国焘开除出党。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路线的危害，损失很大。到长征结束时，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二万五千人，革命根据地只剩下陕甘边区一块。我们党的力量，从数量上看是暂时减少了。但是，由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成了党的指导路线，从质量上看却比过去更强大了。全党全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前头，朝气蓬勃地去迎接新的伟大的战斗任务。

第六节　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的发表

【瓦窑堡会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发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三年又向我热河、察哈尔发动了进攻。由于蒋介石政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三月日寇侵占了热河省会承德。接着，又占领长城各口，并进攻滦东，直逼北平、天津。五月三十一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寇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

定”。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日本占领我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划为日寇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使整个华北放置在日军的监视之下。一九三五年，日寇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五月，日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同时调集大量军队侵入关内，以武力相威胁。六月，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头目梅津美治郎签订了所谓“何梅协定”，接受日寇的无理要求，使我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十月，日寇在河北省的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据了县城。十一月，日寇进一步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也指派宋哲元等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寇“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侵略野心，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联名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广泛地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的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一万多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

行，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爱国口号。反动政府出动大批军警，举着大刀、水龙前来镇压。赤手空拳的学生，同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在十二月十六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那一天，北平的学生、市民三万多人再次举行示威，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得到了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武汉、长沙、太原、开封等地学生，纷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表示声援。爱国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也发表通电、宣言、谈话、赞扬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停止内战，武装民众，一致抗日，并成立各界救国会，出版救国刊物。全国人民一致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遍全国。“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一九三六年九月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二·九”运动标志着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在革命形势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急剧转变的关头，我们党迫切需要制订新的政治策略方针，以指导革命向前发展。“九·一八”以后，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者没有实行这个策略的转变。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建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但是，由于当时军事形势非常紧急，还来不及彻底清算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政治策略方面的错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主席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策略路线方面的问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

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二十七日，毛主席根据中央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彻底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毛主席在报告中，首先对“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个变化，变动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工农阶级有可能重新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其左翼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其他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当时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时局的另一特点是，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两种特点都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党的任**

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要建立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就必须彻底批判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者认为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毛主席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道路是曲折的，在曲折的斗争中前进，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中国无产阶级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有坚固的和可靠的同盟军，而且还需要争取一些动摇的和不可靠的同盟军。**“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如果不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武器去射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就会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把自己孤立起来。其结果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所以，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要建立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还必须善于利用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旧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各帝国主义都豢养了自己的一批走狗。走狗虽属一类，却有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分，又有亲日派

与亲英美派之别。反革命营垒中的这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产阶级应该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武器，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集中力量去打击当前最主要的目标。实践证明，**“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报告中还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来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仍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阶级和政治集团。报告并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策。

毛主席在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同时，又着重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毛主席说：**“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即将形成的时候，毛主席就及时提醒全党要注意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警惕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报告，从政治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我们党制定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正确路线。

【红军的东征与回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瓦窑堡会议后，毛主席领导全党为争取国内和平，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巨大的努力。

一九三六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发出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党的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表示希望首先同东北军实现停战，并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陕甘根据地来协商共同抗日的办法。二月，毛主席亲自率领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晋西晋中地区。红军在这个地区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没收汉奸、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广大贫雇农，并且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迅速发展了部队。但是，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时候，蒋介石却派了十个师以上的兵力进入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拦和围攻红军出师抗日，同时又命令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为了保持抗日实力，促进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决定回师河西，以示团结抗日的诚意。五月五日，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由于日本继续向华北进攻，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它们的在华利益，开始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并给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政策以深刻的影响。日本的进攻也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使日蒋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情况表明，在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介石政府有参加抗战的可能。根据这一估计，我们党从回师通电开始，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分化和争取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党中央又致书国民党中央，揭露与批判了国民党对日寇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同时建议两党派出全

权代表，“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为了团结抗日，信中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我党采取的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行动和策略，迅速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调动了各种抗日力量的积极性，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发展，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海、天津各日本纱厂先后罢工，响应抗日运动。十一月至十二月，上海的日本纱厂和中国纱厂共二十六个厂，四万五千余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十二月，青岛各日本纱厂工人，为响应上海工人的斗争，也全体罢工。一九三六年五月，各地抗日救国会组织的代表在上海开会，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有很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会议通过了《全救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纲领》，指责国民党政府“置外侮于不顾”，“以内战手段排除异已”，提出了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一致抗日的要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寇及伪军进攻绥远，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抵抗。全国各地抗日民主运动迅猛发展，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变。这个转变的枢纽就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当时，驻在西安的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在工农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对内用兵的反动政策，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联共抗日。蒋介石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并在西

安屠杀抗日青年。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临潼拘捕了蒋介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亲日派和汉奸、托派互相勾结，散布谣言，乘机制造混乱。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兵遣将，派出大批军队由洛阳进至潼关一带，准备进攻西安，还计划出动飞机炸死蒋介石。他们的目的是企图煽动大规模的内战，破坏全国抗战局面的实现，借以制造日本灭亡中国的有利条件，并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宋子文、孔祥熙等，则主张南京同西安之间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事变，以维护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地位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新的内战爆发，全国抗战推迟实现；一种是内战由此结束，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早日建立。因此，西安事变的正确解决成了当时时局发展中的关键。

在我们党内，张国焘等人由于对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表示怀疑，事变发生后，他们就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进攻国民党部队。这种主张，正是日寇与国民党亲日派所欢迎的。毛主席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前途，坚决反对了这种错误主张，采取了在有利于抗战的前提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当时我们党的方针是：（一）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求得和平解决。（二）联合南京政府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它走向抗日的立场。（三）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军事上政治上的援助，使之实现抗日的主张。（四）同时，充

分作好打退南京亲日派“讨伐军”进攻的准备。

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等赴西安参加谈判。十九日，党中央发出通电，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指出：“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建议以“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为基本纲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指引下，经过种种艰巨的斗争，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回南京途中，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内容含糊曲折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他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开始转变其十年反共内战政策，但又要坚持专制独裁，极力掩盖西安事变的真相。针对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十二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严正指出，蒋介石的出路，只有**“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如果蒋介石还要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那末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必将他席卷以去。毛主席的这个声明，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迫使蒋介石向着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化。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我党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于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

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停止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普选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在我党的坚决斗争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力下，国民党三中全会终于否决了亲日派汪精卫提出的“剿共”降日的政治决议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接受国共合作抗战的提议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基本上实现了。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结果。这时，从全党范围来说，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恶劣影响还没有彻底肃清，仍然是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但在同时，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也开始抬头了。

在新的形势下，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王明，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从极“左”跳向极右。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就暴露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一九三五年底瓦窑堡会议后，他继续在国外发表了《抗日救国政策》等文章，鼓吹阶级合作论，否认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主张建立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国防政府”和以国民党军队为中心的“抗日联军”。

一九三六年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从革命根据地到达国民党统治区，在天津窃据了党的北方局的领导职位，竭力贩卖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他热衷于走上层路线，搞合法主义，主张对蒋介石政府“委曲求全”、“卑躬屈节”，贯彻了一条错误的白区工作路线。八月，他又

指使薄一波等几十个人在监狱中叛变自首，结成了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叛徒集团。

因此，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建立，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已经迫切地提到党的面前了。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准备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牢牢把握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系统地分析了从“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新形势，总结了这一阶段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指出“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实现抗战。

毛主席指出，要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必须**“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

我们党内历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倾向。这时，党内有“左”倾观点的人，观察问题不从根本之点出发，而从许多局部和一时的现象出发，于是对形势形成了一幅暗淡的画图。他们认为“日本后退了，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否认国民党开始转变，否认新阶段的到来和新任务的提出。这种估计是错误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不从这一点出发，就会否认过去一年半以来为建立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就不可能把革

命车轮推进一步。因此，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则以民族斗争来否定阶级斗争，抹煞国内的阶级矛盾。他们在国内和平实现后，只讲抗日，不要民主，把抗日与民主对立起来。毛主席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盾矛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的发展以有利条件。毛主席还指出，抗日是人民的抗日，抗日需要人民的动员，因此，就要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日战争，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所以，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自由权利的取得，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的重要部分，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针对右倾机会主义者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应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要求的错误，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只有认清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坚决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才能保证我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

党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自己对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

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些基本政治口号，还要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如“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等，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党的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和纪律的严格。

毛主席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任务，就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情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毛主席号召全体干部学习革命先烈，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毛主席这两个报告，批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为我党领导抗日战争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重要

准备。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发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主席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光辉著作，并在党中央举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作了讲演。这部光辉著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的总结，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在这部著作里，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深刻地批判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在军事问题上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着重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加完整地为我们党制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

毛主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这是我们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

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具体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特点，即：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

些特点规定了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都必须从这些特点和规律出发。毛主席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指导路线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正确的作战方针原则。

毛主席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是毛主席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后发制人，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根本指导思想。它把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争运动的基本形式辩证地统一起来，做到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紧密结合，防中有攻，防是为了攻，攻防交替运用。它通过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战略战术的正确运用，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使我在战略上完全掌握主动，迫使敌人由全体上的优势变成劣势，由战略上的进攻变成防御，我即以战略反攻和进攻，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向敌人实施战略追击，直到彻底消灭敌人，赢得战争的胜利。

为了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主席制定了诱敌深

入、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

诱敌深入，就是实行有计划的战略退却，把敌人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这是处于劣势的红军在优势敌军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毛主席指出："**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把敌人放进来，我们就能广泛动员人民用各种各样的行动参战，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可以使我军主力相应地集中，进行机动作战，选择有利战场，迫使敌人就范。它可以使敌军发生错误，分散兵力，背上包袱，疲劳沮丧，到处挨打。这样，就能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战胜敌人。

集中兵力，就是在战役战术上，以优势对劣势，以多数对少数。"**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从战略上、全体上看，敌是多兵外线进攻，我是少兵内线防御；敌强我弱；敌主动，我被动。但是，由于我军采取集中兵力的原则，在战役和战斗上就能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以优势兵力打敌一部，再及其余，各个击破。这样，在战役战斗上、局部上，我变成了强者，敌变成了弱者，我主动，敌被动，从而逐步地从整体上改变原来敌强我弱的态势，改变在战略上敌主动、我被动的地位，实现了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面转化。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红军的作战形式，"**基本的是运动战**"。运动战就是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打运动战，就能使我主力部队在广阔的战场上，高度地机动，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迅速地集中和分散，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充分发挥我军的长处，充分利用敌军的弱点，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出于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的需要，对于某些战略要点和重要阵地的坚守，对于敌人某些设防阵地和据点的攻击，都是应该承认阵地战的。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红军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决定了我军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但是，**“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敌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敌军比较地密集等情况下，我军必须实行速决战。为了打速决战，须要创造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

歼灭战，就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通过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直到最后战胜敌人。毛主席指出：红军作战的**“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

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的。毛主席指出：**“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红军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就能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挥自己的优点，利用敌人的弱点，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对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特别是对王明“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指出王明、林彪所推行的军事路线，**“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哲学著作的发表】

在土地革命战争快要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为了总结我党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从思想上、理论上引导全党分清路线是非，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下了一系列光辉的哲学著作。

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路线是非，最主要的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弄清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的思想根源，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总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来揭露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不断地

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来武装全党。

早在一九三〇年五月，毛主席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出发，深刻地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意义，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并且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历代尊孔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者所鼓吹的“先哲”之类的唯心论先验论，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主席又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并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了讲演。毛主席在这两部光辉哲学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王明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从思想上、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总规律和宇宙发展的根本法则。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人的认识依赖于人的社会实践。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否认了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离开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可

靠的知识。毛主席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原理，批判了王明、孔老二轻视实践，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实践论》分析了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指出**“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人的认识，在低级阶段，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表现为理性的。感性和理性两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实践论》又分析了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理论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用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总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在认识论上，都是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统一这个根本观点背道而驰的。王明之流绝拒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研究中国革命实践，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去吓唬人们。他们坚持唯心论和主观主义，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进行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反对理论联系实际。而有一些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的同志，不了解理论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规律，对了不知对在那里，错了不知错在何处，因而有时上当受骗，做了这种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俘虏。为了保证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必须坚持思想上、理论上的正确路线。**“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毛主席强调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用这个观点来分析我们革命失败和胜利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起作用的。当我们清算了陈独秀机会主义，革命就重新发展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又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打击，是因为党内产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当我们清算了王明路线时，革命又重新发展了。所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毛主席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客

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因此，在我们党内始终存在着矛盾斗争。**“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矛盾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各别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研究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进行考察。然而，王明之流却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完全不管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毛主席还指出，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因此，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是我们党正确地决定政治上、军事上的路线和政策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王明机会主义者却与此完全相反。他们根本拒绝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不分析每个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在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时候，改变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导致了革命的严重挫折。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后，还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毛主席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一切矛盾着的东西，都是互相联系着的，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我们党正是按照这个客观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去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而反动派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妄图论证剥削压迫制度古已有之，而且要求永世不变地长存下去，以反对社会变革，反对人民革命。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坚持这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死的、凝固的东西。机会主义者的这种主观主义，一害革命，二害自己。

毛主席指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我们党内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因此，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又要给犯错误的同志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历史证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正错误的。

《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伟大的哲学著作，批

判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大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给了全党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

第七节　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深入。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化运动，配合人民革命战争，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成为当时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这场深刻的文化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鲁迅写下的一系列的战斗檄文，是广大共产党员必读的著作。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反动文人，在它的指挥刀的保护下，亮出各种招牌，疯狂地“围剿”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正是在这刀光剑影中，鲁迅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团结并率领广大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粉碎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进

攻。鲁迅在同“新月社”㉑的斗争中，撕开了胡适、梁实秋之流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假面具，戳穿了他们“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真面目。之后，一部分堕落的文人公开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挂起“民族主义文学”㉒的招牌，歌颂侵略战争，鼓吹民族投降主义。鲁迅愤怒地斥责他们是“洋大人的宠儿”，揭露了他们出卖民族的奴才本相，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正当鲁迅同“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斗争的时候，托派匪徒胡秋原却打着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攻击革命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剥夺作家的“自由”，“破坏艺术形式”。鲁迅辛辣地讽刺了这伙匪徒，指出他们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㉓与托匪“自由人”同时出现的，是以苏汶为代表的所谓“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㉔。他们宣扬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并居心叵测地向受着反动派残酷压迫的“左翼”文坛要“创作自由”。鲁迅剥开了他们的伪装，指出他们虽然标榜自己是“第三种人”，实际上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不过是顽固地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而已。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以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㉕，大肆提倡“闲情逸致”的“幽默”小品，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太平。鲁迅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群“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㉖，他们捧出“幽默”来，无非就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㉗，借以麻醉人民。鲁迅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围攻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阶级分析为武器，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

动谬论，杀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鲁迅还切密切配合红军的反“围剿”斗争，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对内对外的反动政策。他根据形势的发展，通过对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分析，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及其“以华制华”的老法宝，揭露了蒋介石卖国集团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革命嘴脸。鲁迅用高超的文笔，勾画了买办官僚们在国难声中一面逃跑投敌，一面搜括民脂民膏的丑态，戳穿了他们污蔑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反动宣传。同时，鲁迅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安身立命的反动理论基础——“孔孟之道”，发表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著名讨孔檄文，彻底批判了孔家店的反革命本质。鲁迅深刻地指出，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捧出尊孔这块招牌，都是“怀着别样的目的”的，一语道破了尊孔复古的反动用心。鲁迅的文章、讲话和宣言，是匕首，是投枪，刺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颤，坐立不安。

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他们采取了种种卑劣的法西斯手段，查封、捣毁进步文化团体，逮捕以至杀害进步人士。鲁迅本人曾被“通缉”，多次被迫转移。一些战友被秘密杀害。但是，鲁迅仍然不计个人安危，“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28]决不退缩一步。在白色恐怖中，鲁迅先后用了一百三十五个笔名，以隐晦曲折、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坚持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命革家顶恶风、战逆流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正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化战线的英勇斗争，使得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也罢，封建买办文化的精神枷锁也

罢，御用文人的伪装欺骗也罢，统统挽救不了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失败。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新民主主义论》）

文化战线上反革命的“围剿”和革命的反“围剿”之间的斗争，实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战线上的领导权的斗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不久，在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创造社、太阳社里的某些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挑起了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他们采取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多方围攻鲁迅。鲁迅向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就左翼作家队伍的建设问题，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鲁迅深刻地批判了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以及思想上的个人主义，指出它们的哲学基础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指导战斗的左翼文化运动的纲领。

从一九三一年开始，窃取了“左联”领导职务的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在政治上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上则以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的理论为指导，形成了一条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但是，鲁迅并没有被他们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他领导和团结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向这条文艺黑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鲁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更好地去战胜敌人，积极团结广大作家，对周扬之流的错误曾作过多次严肃的批评和帮助。但是，周扬一伙为了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却大搞宗派分裂活动，拒绝鲁迅的劝告。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唆使同伙或亲自出马，发表化名文章，制造谣言，施放暗箭，恶意诬蔑和攻击鲁迅。他们实际上是充当了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别动队。对此，鲁迅曾经愤怒地指出：“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㉙

红军长征胜利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动。毛主席、党中央根据这个新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周扬一伙却追随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一九三六年春，他们背着鲁迅，解散了“左联”，并公开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陈独秀一伙托洛茨基匪徒，这时则以极“左”面貌出现，恶毒攻击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利用周扬一伙围攻鲁迅的机会，妄图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

鲁迅为了驳斥托派匪帮，于六月九日写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严正声明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热情地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无情地揭穿了托匪的理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不免要“掉

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痛斥托匪“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实在“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十日，鲁迅又写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抓住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关键问题，正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击中了“国防文学”的要害。

由于鲁迅对周扬一伙深刻揭露，迫使他们的主子不得不亲自出马上阵。大叛徒刘少奇化名莫文华，抛出黑文，叫嚷统一战线要“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30] 一直紧跟王明的隐藏在党内的叛徒、托派、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这时也跳了出来。他叫嚷两个口号的论争应当立即“休战”，却又吹嘘“国防文学”“是联合战线的口号”，“是不可驳倒的”，诬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宗派主义”。他还抛出了“国防哲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鼓吹要“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帮助、合作下，让反共头子、买办文人、文化特务以及资产阶级学者，以封建的“孔孟之道”，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蒋介石标榜的”礼义廉耻”，来“开发民智”，“启蒙大众”。这种所谓“国防哲学”，同周扬一伙的“国防文学”以及“国防音乐”、“国防戏剧”等等，完全是一丘之貉，都是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是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帮凶。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周扬之流明知鲁迅病情转重，却指使徐懋庸写信骂上门去，乘机“大布围剿阵”。他们攻击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胡说无产阶级“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要“以特殊的资格去要

求领导权”，否则就会“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徐懋庸还指桑骂槐地诬陷鲁迅“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鲁迅敏锐地看出，“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31]于是，鲁迅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病痛，扶病口授《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并化了四天时间亲自加以修改和增写。文章再一次声明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文章指出，周扬一伙所侈谈的什么“基本的政策”，只不过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的东西。鲁迅又根据他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正确地断言：“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鲁迅在卧病期间，就是这样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周扬一伙所推行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为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不幸在上海逝世。鲁迅的一生，是共产主义者光辉战斗的一生。他坚持革命作家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斗争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社会，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又切切实实地无情地解剖自己，改造主观世界。直到临终前两个月，他还表示：“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32]。鲁迅正是以这种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的精神，在斗争实践中，认真读书，真正弄通马列主义，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作了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本章小结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国内革命战争。

这个时期，由于有了前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全党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

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

这个时期，我们党曾遭受过多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正如毛主席所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关于情况的通报》）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很快又出现了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初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个时期内，虽然出现过陈独秀取消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以及其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的倾向，但是，主要是这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极大，教训极深。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全党。按照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没有人有了人，没有枪有了枪，没有政权有了政权；按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丢掉了人，丢掉了枪，丢掉了革命根据地，使工农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从此，我们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注　释】

①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天津《大公报》

② CC系：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授意陈果夫、陈立夫扩大"浙江同志会"，在南京成立"中央俱乐部"，以把持国民党党务和文化教育等部门。其中，专设职业特务机构"调查科"。一九三八年，更名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统"。关于CC有两种说法：一说，"陈"字英文拼音第一个字母为C。CC即两陈的意思；或说，CC是"中央俱乐部"的英文译名Centyal club的速写。

蓝衣社：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仿效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专门从事破坏革命运动、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的罪恶活动。一九三二年成立"复兴社"，社员制服为蓝衣蓝褂。其核心组织为"力行社"，由特务头子戴笠主持。一九三三八年在"蓝衣社"的基础上，成立了特务组织"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③ 引自《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八月）

④ 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其干部多为共产党员。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这个警卫团于八月三日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武装

起义。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南下，乃到修水与平江浏阳农军会合。

⑤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九二七年二月）

⑥ 十大纲领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治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八、改善士兵生活，给士兵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⑦ 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⑧ 转引自《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一九三〇年九月）

⑨ 引自《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⑩ 引自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⑪ 参见《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六月二七日）

⑫⑰⑱ 引自《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⑬ 引自《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

⑭ 转引自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⑮ 淞沪停战协定，即《中日上海停战协定》。“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派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去英领事馆，同日本公使重光葵进行停战会谈。五月五日，签订了这个卖国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无驻军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域，而日本则可以在上海许多地区驻扎军队。

⑯ 引自《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⑲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会师，合编为红军第四军。

⑳ 转引自《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

㉑ 新月社：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三年，因出版《新月》月刊（一九二八——一九三三年）而得名，主要成员有胡适、梁实秋、徐志摩、叶公超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后，他们从原来依附于北洋军阀转而向国民党反动派卖身投靠。在政治上公开反共反人民，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效劳；在文学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为艺术而艺术”等谬论，攻击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充当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

㉒ 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是国民党反动派直接策划的卖国主义文学运动。一九三〇年六月，由国民党特务、反动文人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等发

起，主要刊物有《前锋周报》和《前锋月刊》。他们妄图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掩盖国民党反动派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实质，配合其主子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对抗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

㉓ 鲁迅：《论“第三种人”》

㉔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正当鲁迅同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斗争时，反动文人胡秋原、苏汶（即杜衡），自称居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左翼革命文艺阵营之间，伪装成所谓“自由人”、“第三种人”，打着批评“民族主义文学”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宣扬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反对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攻击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效劳。

㉕ 论语派，是资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流派，以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办《论语》半月刊得名。以后又陆续出版过《人间世》、《宇宙风》等期刊。主要代表人物有林语堂、周作人、邵洵美等。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时，他们提倡所谓“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引诱青年逃避现实斗争，起着麻痹人民群众的反动作用。

㉖ 鲁迅：《“题未定”草》

㉗ 鲁迅：《“论语一年”》

㉘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㉙ 鲁迅：《给杨霁云的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㉚ 莫文华（刘少奇）：《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㉛ 鲁迅：《给杨霁云的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㉜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第三章　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第一节　全国抗战的开始。国共两党的两条对立的抗战路线

【从“七七”到“八一三”。全国抗战的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上，盘踞在北平城郊的日本军队，借口一名士兵在军事演习中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芦沟桥边的宛平城搜索。接着，又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中国驻军，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的影响，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抵抗。

芦沟桥事变决不是一次地方性的事件。由于蒋介石从“九一八”事变起实行无耻的不抵抗政策，葬送了东北三省。从一九三三年春起，日军又向热河①、察哈尔②发动进攻。接着，国民党政府又通过卖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把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的主权奉送于日本侵略者。到一九三七年，河北、察哈尔、绥远③等省的一部分地区已直接被日伪军占领；汉奸、日本特务、浪人，更是遍布华北各地。北平虽尚在中国军队手中，但早已陷入日伪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只有西南面尚为中国军队驻防，而位于平汉线上的芦沟桥，就成了北平唯一的一条对

外通路。侵占芦沟桥，就是要完全占领华北主要中心城市北平和天津，控制整个华北，继而进犯全中国。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东北，已表明它决心要结束华盛顿会议造成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统治中国的局面，代之以自己一国的独占。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日本也正式宣布废弃华盛顿条约，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尽管这些活动都是直接对英、美、法等协约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战，但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却拒绝支持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反而企图把这股祸水引向东进和北上以反对苏联。一九三六年七月，在英、法等国的“不干涉政策”鼓励下，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内战实行武装干涉，支持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发动颠覆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武装叛乱。同年十一月，日本与德国结成同盟，东西法西斯魁首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加紧勾结起来。英、美、法等国的绥靖政策，怂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欲望。在一九三七年资本主义世界新的经济危机爆发前夕，日本终于悍然发动了它的新进攻。形势的发展表明，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大战，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纵容下，越来越接近于全面爆发。

总之，芦沟桥事变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英、美、法等国政府的绥靖政策之下，肆无忌惮地实行着完全灭亡中国的既定方针，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正在奋起抗战。**“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从此，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实行抗战的宣言，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现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宣言鲜明地表明了党实行团结抗战方针的坚定的决心。七月十三日，延安举行了实行抗战的紧急动员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共产党员和所有革命战士，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到抗日前线去。十四日，又发布了《关于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平津人民极力鼓励和支持华北驻军坚持抗战。各地群情激奋，纷纷要求全国动员、抗战到底。

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态度却极端动摇。这时，蒋介石和汪精卫正躲在庐山上，召集所谓“各界闻人”举行谈话会，讨论“重要政治问题”。七月十五日，庐山谈话会开始。主持会议的国民党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从来是反对抗日的，这时也别有用心地不提抗战问题，把议题限制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上。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头子蒋介石，虽然在西安事变时被迫接受了准备实行抗战的原则，但也并不想真正实行。他想把芦沟桥事变当成地方性事件，要华北地方当局与日军交涉，准备把事变地方化，实行局部的妥协投降。但是又慑于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热潮，害怕实行妥协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坚决

反对。是战还是降，在两条道路面前举棋不定。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动摇态度，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恰当的斗争。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同志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等在庐山举行谈判。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耐心的争取工作，极力督促蒋介石放弃妥协的打算，立下实行抗战的决心。为了促进国民党的转变，在谈判开始的前二天，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宣布国共两党合作成立的正式宣言交给国民党，并约定和蒋介石关于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一起公开发表。由于我们党的批评、推动和督促，七月十七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公开发表了准备实行抗战的声明，从举棋不定中向前走了一步，表示要实行抗战。

蒋介石的声明自然决不是真诚的。他一面向共产党的代表和全国人民表示要实行抗战，一面却在庐山训练班中提出了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同时，还亲自活动，企图在中国共产党内找寻他的代理人。④事实表明，蒋介石虽然参加了抗战，但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决不可能实行真正抗战的路线，国共两党之间必然要出现两种根本对立的抗战路线的斗争。

针对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毛主席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阐述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毛主席第一次概略地提出了党的抗日纲领，并深刻地指出：抗日战争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共产党的方针是坚决抗战，办法是依靠人民群众，其结果就能得到民族解放的前途。国民党的方针是妥协退

让，办法是压迫人民大众，其结果必将是做奴隶的前途。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民力和军力相结合”，“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走我党指出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道路。文章针对蒋介石片面抗战的方针，严正地指出了它的危险性，要求蒋介石**“实践自己的诺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这篇文章的根本思想照耀着整个抗日战争的行程。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从战争一开始便展开了。

这时，日本的灭亡中国的方针迫使蒋介石不能不勉强实行抗战。就在他继续抱着使芦沟桥事变“地方化”的幻想时，日本帝国主义已调派大量军队来中国。七月十七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动员四十万日军侵华。七月下旬，对平津地区发动大举进攻。由于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严重地束缚了广大人民和爱国官兵的抗战行动，北平、天津在七月三十日同时失陷。八月，敌军继续在华北扩大进攻。同时，驻上海的日军也一再制造事端。八月十三日，盘踞在上海日本租界和黄浦江中的日本陆海军，对上海发动进攻。上海的中国驻军在高涨的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实行了抗战。日军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影响蒋介石的经济中心及其政治统治的主要基地，也直接威胁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这就使蒋介石不得不增调军队，实行对日作战。从此，全国都进入了抗日战争。

【党的洛川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全国性抗战的开始，结束了我们党和国民党关于应否抗战的争论。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正式宣布委派朱德同志为第八路军总指挥，改编长江南北各地

红军游击队为抗日军队的工作也已开始。这表明，不管蒋介石主观上是否愿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潮流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了。但是蒋介石政府的反动政策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它不仅依然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还妄想借改编红军为名，消灭人民的武装。同时，抗日战争的开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成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在党内也出现了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新的形势要求党迅速制定抗日战争时期的纲领，以实现对抗日战争的正确领导。

为此，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从芦沟桥事变开始，中国的政治形势已进入了实行抗战的新阶段。但是，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将给抗日战争带来严重的危险，由此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转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抗战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但经过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必能克服一切困难，取得最后胜利。并且指出，要想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须要有国民党政策的全部和彻底的转变。并且严正地督促国民党，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行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相对立，洛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主席亲自写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

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共中央正式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提出了这十大纲领，要求坚决实行，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错误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纲领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抗战时期的具体化，是实现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有力武器。

洛川会议的这些决定，也是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的结果。会议期间，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些人，由“左”跳到右，幻想依靠国民党进行抗战，主张正规战而轻视游击战，不强调独立自主，并把抗战当成是可以速胜的。会议批判了这种倾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会议制定的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和“设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计划方针”等项主张，要求打破国民党对军权的垄断。这就纠正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这个不明确的口号。又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等政治主张，要求打破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这就对“国防政府”的口号作了正确的解释。洛川会议的这些正确决定，实际上是对王明提出的“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等右倾机会主义口号的批判和否定。

由于蒋介石政府顽固地拒绝改变它的政策，坚持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得以日益深入，国民党军队继续望风而逃。在华北战场

上，侵占了平津地区的敌军在八、九月间沿着三条铁路线继续进攻。到了九月中旬以后，平汉线上的保定、津浦线上的沧州先后失陷，国民党军队向河南、山东溃逃。沿平绥路进攻的敌军，八月下旬占领南口，接着又侵占张家口，席卷察南，进入山西。九月下旬蒋阎军弃战略要地大同而逃，使关系华北全局的山西省，门户洞开。在华东战场上，虽然作战的胜败关系到国民党统治的根本，蒋介石不能不出动主力抗战，不敢狂奔溃退；但是却不要人民参加抗战，军事上又实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结果完全陷于被动挨打。华北和江浙地区的战局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蒋介石不能不做出一些要团结抗战的姿态。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发表了蒋介石的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中国革命史上第二次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了。

为了使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九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肯定了两党统一战线的积极意义；并且指出：伟大的抗战任务不是停止在现在状况的统一战线所能完成的。这个统一战线还需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能限于国共两党，两党的合作抗日仅是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把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发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日斗争。这个统一战线要有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共同纲领，要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统一战线的政府，要改造实行旧制度的

国民党旧军队。在中国共产党宣告两党合作的宣言中曾指出，党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毛主席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确实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督促国民党要回到一九二七年因蒋介石的背叛而断送了的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道路上来。以后，十月间发表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党的这种根本方针。

【八路军开赴华北作战。两个战场出现】　当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时候，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命令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十二日起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在改编过程中克服了某些个别分子以受国民党委任（做官）为荣的新军阀主义倾向，并且和国民党的干涉进行了斗争，恢复了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和改称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改编成立的第八路军共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⑤九月，全军三万多人除一部分组成留守兵团，保卫陕甘宁边区外，在人民的热烈欢送声中东渡黄河，陆续进入山西，奔赴晋西北、晋东北前线，迎击日寇。

这时，山西战场的形势是危急的。占领了大同的敌军骄横地向里长城一线推进，企图突破雁门关一带防线，遥指太原。国民党军继续望风而逃。九月中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进抵平型关附近。二十五日，敌精锐部队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扬长地直进到平型关东南，被我军主力伏击。由于干部战士的英勇奋战，全歼了被围的敌军三千多人。这是抗战开始两个半月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胜利。这一仗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给了全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勇往直前的八路军和畏敌逃跑的国民党军成了鲜明的对照，清楚地表现了两种军队的本质不同。

但是，在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问题上，党内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尖锐的斗争。早在洛川会议上，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我党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八路军进军山西前线后，毛主席又在九月二十一、二十五日连续发出《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和《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强调指出：我军要以分散兵力、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不能以集中主力打大仗为主；华北的一切工作都应该环绕于游击战争。但是，彭德怀、林彪之流却竭力对抗这个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他们从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在军事上主张依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阵地防御，集中兵力配合国民党打大仗。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中的作战指导思想正是这样的。因此，虽然这一仗取得了战役上的胜利，并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战略上则是错误的。国民党由于实行反人民的片面的抗战路线，它在华北前线的几十万军队纷纷溃不成军，很快丧失了战斗力。幻想依靠国民

党军队抗战那是毫无胜利前途可言的。我军只有遵循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不顾国民党的限制和阻挠，不接受国民党的失败主义的作战命令，大胆地放手地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农村根据地，才能保证抗战的胜利前进。而集中主力配合国民党打大仗，既对粉碎日军战略进攻毫无结果可言，而又妨害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等这些最迫切的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任务的实现。这一切说明了林彪右倾机会主义战略方针的完全错误。

毛主席反复批判了那种依靠国民党、集中兵力打大仗的错误方针，指挥全军执行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分散作游击战”，“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敌军突破雁北阵地之后，沿同蒲铁路线进犯忻口，威胁太原。八路军按照毛主席的方针，一面配合忻口的防御战，一面坚决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北收复涞源、广灵；一二〇师在雁门关以北夺回井坪、平鲁、宁武。在我军的英勇奋战下，敌军由蔚县至平型关，大同至雁门关，朔县至宁武三条主要运输线被切断。一二九师一部又在十月十九日夜奇袭雁门关代县以南的阳明堡机场，焚毁敌机二十四架。一一五师另一部还越过五台山，进军冀西，收复平山、行唐、曲阳、唐县、定县、满城一带。这些胜利，是我军完全主动的独立自主地作战的结果。这种作战摆脱了对国民党军单纯防御的阵地战的依附，实际上却最好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如果国民党军有正确的方针，就可以造成极有利的作战形

势。

然而，国民党军的阵线是漏洞百出的。正当八路军在察南、雁北紧紧拖住向晋北进攻的敌军时，北面的敌军于十月中旬占据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席卷绥远省。在平汉线北段，敌军于十月十日攻占石家庄，又连下邢台、邯郸，十一月初越出河北省，占领了豫北的安阳。十月下旬，敌军开始由石家庄沿正太路西进，开辟了进攻太原的另一个战场。尽管我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各一部又急速驰援，并取得了不少胜利，然而国民党军却连连败退。十一月八日，对华北战场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太原终于失陷了。接着，国民党军在临汾停了一个短时期后，蒋介石的中央军大部南渡黄河，逃往河南，只有一部分留在晋南的中条山一角。阎锡山的军队虽然留在晋西，但根本不对日作战，把河东千里大好河山丢弃给敌人。至此，华北战场上已基本上没有国民党的抗日力量了。

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自太原陷落之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国民党军纷纷溃逃之际，八路军坚持着山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晋东北和冀西发动游击战争的第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同志领导下，十一月七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以五台山为中心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接着一二〇师在兴县地区建立了背靠陕甘宁边区的晋西北根据地，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中心建立了晋东南根据地。敌军虽然进入太原，霸占晋中，但在战略上却处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这就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从此，党在这些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

加强根据地建设。同时以这些根据地为基础，积极支援全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为广泛地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道路。

华北战场上的太原陷落时，华东战场的形势也急转直下。十一月五日，敌军在上海南面杭州湾上的金山卫登陆，迅速占领松江，威胁上海的后路。一直实行专守防御方针的国民党军队，又匆匆放弃阵地，辙退到苏州、嘉兴一线。十一月十二日，全国第一大城市上海陷于敌手。二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慌忙发出“迁都宣言”，宣告国民政府搬到重庆，躲进西南。国民党军队在南北两战场都遭到严重的失败。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反人民政治路线决定了的，也是他们实行畏敌避战，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的必然结果。而在广大敌后地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依靠人民力量，发动人民战争，不断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两条根本对立的抗战路线之下，出现了两个根本不同的战场。这种发展，贯串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决定着两种根本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表】

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四个月，这个伟大斗争的丰富经验，需要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加以总结；抗战的新形势也要求党进一步提出正确的路线，纠正已经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用抗日战争初期四个月的经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路线。

毛主席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抗战的基本趋势，是处在

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中。强调指出：**“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只有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毛主席分析了今后抗战的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强调国民党既没有决心从片面抗战过渡到全面抗战，又因为害怕人民的反对而不敢公然结束抗战，代之以投降。因此，抗战与投降并存于中国，这个危险严重地存在着，这就是当时抗战形势的基本特征。

毛主席全面地分析了围绕着抗日战争的各种基本政治因素，指出**“国内国际不许可投降主义得势的因素，占着优势。”**如果把这些因素好好地组织起来，不但将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因素，也将克服停顿于片面抗战的因素。因此，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我党和中国人民的迫切任务。

就是从对于形势的这种根本估计出发，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的任务，并严肃地告诫全党，警惕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的危险。

这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以及它的反共阴谋活动，也由于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经验，以及党内小资产阶级成份的大量存在，阶级投降主义倾向已经发生，并且成了妨碍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主要障碍。为此，毛主席继洛川会议之后，再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提醒全体共产党员，不要忘记了陈独

秀投降主义路线在一九二七年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教训。并且，明确地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毛主席总结了历史经验和四个月来同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新经验，深刻地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号召全党保持我们已经取得的阵地和发展我们的阵地，加强党的组织力量，更广泛地动员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论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问题时，毛主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的社会阶级阵线，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个不同的集团。右翼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它们就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正在、并且必将与日俱增地进行反共活动，策划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我党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就为全党制定了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斗争的根本方针，奠定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基础。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投降倾向。只要党克服了阶级投降主义，坚决地、并且有策略地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集团进行斗争，民族投降主义是可以战而胜之的。

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着毛主席的英明论断。上海太原

失陷以后，抗战和投降两种趋向尖锐地斗争着。十一月下旬，敌军在苏嘉线上全面突破了国民党军防线，江南大片土地沦于敌手，敌军长驱苏浙皖边，准备切断南京的后路。全国人民热切要求国民党坚持抗战，蒋介石却一直没有停止对日“和平”即投降活动。早在九月间，国民党政府就向受英、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国际联盟提出了对日本的“控诉”，企求英、美等国进行“调停”。接着蒋介石的特使仆仆于世界各国，既乞怜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庭前，也奔走于德、意法西斯的门下，妄想通过他们的“调停”结束抗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也各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积极活动。十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策动蒋介石政府向日本投降的谈判。蒋介石积极地加以响应。英、美等国也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成员国会议，企图按照有利于英美利益的方向进行“调停”。这种活动在上海太原失守之后是更加强了。不仅亲日派汪精卫之流组织低调俱乐部，千方百计准备投降，整个国民党政府全面投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十二月初，蒋介石接见德国大使陶德曼时，竟然表示承认以日本的条件为谈判基础，并且同意“共同防共”。“和谈”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方针和全国人民包括一部分国民党人士的继续抗战的要求，不能不使蒋介石有所顾忌。同时，日本坚决灭亡中国的方针，也使国民党政府处于非战不可的地位。十二月上旬，敌军一面在苏南两路迫近南京，一面由苏浙皖边直扑皖南，南京陷于三面包围之中。蒋介石口头上高叫“死守”，实际上在十三日于极度混乱中狼狈弃城溃逃。但是，蒋介石从英美派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出发，又迫于形势，不敢接受日本的招降条件。德国法西斯

的诱降阴谋也就没有获得什么结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告“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形格势禁，蒋介石还不能不以一个“抗战派”的面目继续鬼混下去。

毛主席关于**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的论断，预见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形势演变的基本特征。在这整个时期中，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暗中勾结从没有断绝过。他之所以终于不敢公开实行投降，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进行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在党内坚持反对阶级投降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

第二节　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新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　毛主席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地提出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问题之后，原来担任党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从海外归来，到了延安。他不仅不接受毛主席的告诫，站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反而摆出一付钦差大臣的架子，反对党的正确路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他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不仅不批判蒋介石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反而降低共产党的原则立场，说国民党政府已成为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国防军”已经“开始建立”，甚至还说“人民开始有充分的民主自由”，说这是“无可争论”，“不可否认之事实”，竭力鼓吹将边区政府和人民军队“统一”于国民党。在这个会议上，

他极力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把它当成党的口号，提出了他的阶级投降主义的纲领。于是，早已由王明煽惑起来的右的机会主义倾向，终于形成为一条新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王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职务。

这时，国民党刚刚丢掉了南京，武汉成了国民党区域的事实上的军政领导中心。由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蒋介石也只得扬言继续抗战，并且在继续反共、反人民的同时，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民主团结的姿态。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少数地方取得了一定的公开合法活动的条件，在武汉公开出版了党的机关报刊⑧。这是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广泛开展抗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同时，自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正式公布了建立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的命令之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也正在积极进行。江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一、二、三支队，共六个团。江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四支队，共三个团。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付军长。同时建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受长江局领导。这是发展华中和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强大的力量。这一切造成了长江局开展工作的极其有利的条件。

但是，王明把党委托给他的领导岗位，当成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据点。他一到武汉，就超越他的职权，冒用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提出六点投降主义主张，公然同毛主席提

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对抗。他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抹煞国民党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反共活动的大量事实，把“巩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当成是“中心环节”，他背弃党的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张，要求组成“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他背弃我党关于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为各抗日阶级联盟政府的主张，提出了“充实和加强”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要各党派的代表参加国民政府。二十七日，他又抛出《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更加系统地宣扬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完全放弃无产阶级的原则性，混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原则区别，说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甚至掩盖人所共见的事实，奴颜婢膝地代国民党辩解，硬说它“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他把持长江局的领导，把它变成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独立王国。

王明不仅在他主管的工作中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而且还极力要用这种路线干扰党中央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晋察冀边区在阜平召开辖境三十九个县的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边区政府。十四日向全国发了通电。这是新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我党我军的重大胜利。革命政权的发展自然是蒋介石国民党十分忌恨的。王明充当蒋介石、阎锡山的代言人，二十八日竟然打电报给中央，反对用边区名义，并认为，这种事应“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指蒋）”。这种表演，既暴露了他的投降主义者的真面目，也反映了他企图向全党推行这条路线的野心。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党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问题。十一日，王明又自行发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文，把他的机会主义主张冒充成会议的一致意见，妄图鱼目混珠，把投降主义路线强加给全党。在这篇反党黑文中，他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错误路线。在军事上，他提出了所谓“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反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继续鼓吹“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的荒谬主张，甚至要求实行“统一编制”和“统一作战行动”，把原来就提出的五个“统一”扩大到七个。在建立敌后抗日政权问题上，他主张要“事先征得”国民党的“同意和批准”，坚持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更进一步向国民党“提议”，要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地设立“统一领导机关”来“组织群众”，同时要我党领导的群众团体自动“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把群众组织完全纳入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这些谬论把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发展到更加恶劣的程度，并制造了代表党中央的假象，带上了更大的欺骗性，妄图达到他篡夺全党领导权的野心。

由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没有在全党取得统治地位。但是，它却暂时控制了一部分地区的工作。这条路线的推行，无论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还是对国民党统治区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危害。

【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与两条路线斗争】　自从太原失陷，国民党溃逃，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在整个华

北战场上进入主要地位之日起，伟大领袖毛主席胸有全局，立即指挥八路军，排除彭德怀、林彪之流的干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适时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不过半年多的时间中，很快地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使华北战场的抗日力量有了一个迅猛的发展，造成了极其有利的形势，为进一步发展游击战争和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晋察冀地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间，粉碎了敌军对新创建的根据地的第一次围攻，收复了晋北、冀西、冀中、察南五十多个县。一九三八年春，八路军一个支队向东挺进，创立平西根据地，前锋深入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一带。冀中地区，在七七事变以来广泛的起义和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广阔的平原游击战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了冀中抗日民主政权。六月，八路军一个支队又挺进到平北和冀东，配合党的地方组织发动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开辟了冀东根据地。这种战略展开，对于平汉路北段、平津地区的敌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并造成了我军向长城以北发展的有利形势。

在晋西北地区，由贺龙同志率领的八路军一二〇师，迅速开展了游击战争，创建了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寇乘我军开赴同蒲路作战之时机，调集万余兵力，占据了宁武、神池等七个县。一二〇师主力星夜赶回，激战二十多天，打退了日寇的进攻，全部收复七县。在这同时，又开展了吕梁山地区的游击战争。同年八月，一二〇师一个支队北出绥远，越过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地区，和当地的抗日武装会合，在绥东、绥西、绥南直到察哈尔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以后，这里

和晋西北统称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深入塞外的草原和沙漠，对推动内蒙古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晋东南地区，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一二九师多次粉碎了敌军的进攻，包括一九三八年四月的三万多敌人的九路围攻，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在开辟晋东南区的同时，一二九师多次派出部队挺进平汉路以东的冀南地区和冀鲁豫大平原，开辟了两个根据地，广泛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一九三八年二月，冀南地区召开了军政民代表大会；八月，正式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这些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为以后成立统一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奠定了基础。由冀南向东挺进的我军，还越过津浦路，与鲁西北和津南地区的地方党组织会合，在冀鲁边开展了游击战争。这和冀鲁豫一道，为八路军支援山东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山东，从一九三七年底起，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五月间，迅速在全省十几个地区建立了抗日阵地，为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五月以后，毛主席指示调派大批干部支援山东，并指定八路军派遣主力部队一部进入山东，作为人民武装的骨干。全省人民武装到一九三八年秋发展到四万多人，九个支队，组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并在胶东的蓬莱、黄县、掖县等地，首先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就为建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整个华北战场上的迅速展开，与国民党战场适成鲜明的对照，开辟了依靠人民的力量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的前景。这极大

地鼓舞了全世界正在为反对日益疯狂的法西斯势力而斗争的人们，为中国人民争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和崇敬。一九三八年中，国际无产阶级和青年学生组织的代表团纷纷来到中国，一些国际主义的朋友积极来中国参加敌后抗日工作。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人白求恩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来到中国，并且参加八路军，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事业。

和华北战场上的发展比较起来，华中和江南的抗日游击战争，却由于受到王明路线的干扰而迟缓得多。新四军编成之后，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第一、二、三支队陆续到皖南岩寺一带集中，军部也才进驻皖南。这时，国民党阴谋把新四军限制在一个狭小的防区中，企图借敌军之力，收“反共”之效。项英却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拒绝东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停在皖南，背靠国民党，面向敌军正面战线，等候“点验”，还幻想国民党会向我军发枪。那时，由于国民党在宁沪地区的溃败，江南大好河山沦于敌寇铁蹄之下，急待我新四军挺进敌后，发动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但是项英不及时进兵江南，坐令国民党戴笠系统的特务在那里编组了反共的忠义救国军，使以后敌后游击战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困难。同时，皖南我军几乎像处于刀俎之间，使蒋介石、顾祝同的借刀杀人之计有实现的可能。继续这条错误路线，是会给新四军和整个华中抗战造成极大危害的。

毛主席对项英推行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四月中，党中央一再电促迅速组织东进。项英到四月底仍只派了一支只有一个侦察连的先遣部队进入江南。五月四日，

毛主席致电项英，切责他迅速组织主力部队跟进，开辟大茅山根据地。并且从广阔而高度的全局出发，指示项英准备进军苏州、吴淞地区，和分兵渡江进入江北。自此以后，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才在陈毅同志统率下东进江南，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六月在镇江以西首战告捷，“脱手斩得小楼兰”。以后，逐渐开创了以大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但仍留在皖南的项英依然站在王明路线立场上。江北的第四支队，也由于当时支队领导的错误而迟滞不前。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仍在进行。

为了批判王明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分清两条军事路线的界限，使全党充分认识人民游击战争的伟大意义，毛主席在五月中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毛主席指出：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性，由于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并且不仅有战术的配合作用，而且有重大的战略作用。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独立自主的作战。游击部队不仅要担负作战任务，而且还必须担负起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战略任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本身也将逐步向正规部队和正规战争发展。毛主席还论证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在游击战争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方针，和实现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等重要问题，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部战略纲领。

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伟大理论，给了全党以战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军事路线的理论武器。它指导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全过程，使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沿

着正确路线胜利发展，保证抗日战争在我党领导下胜利前进。

【《论持久战》的发表】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南京失陷之后虽然不能不宣称继续抗战，实际上恐日病依然在严重发展，亲日派汪精卫集团放肆地鼓吹“亡国论”，甚至公然说什么“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⑦。蒋介石一伙，一面暗自散布失败主义的亡国论，一面又幻想不要多久，国际形势变化，就可以取得胜利，鼓吹“速胜论”。两种错误思想一起威胁着抗日战争的坚持和发展。

这两种谬论，是随着正面战场上形势变化而交互起伏的。南京陷落之后，敌军沿江西上，有向安庆进攻之势。国民党紧张地在武汉疏散人口，准备逃命。稍后，敌军停止西进转而由山东和安徽南北两面向徐州夹攻，企图打通津浦铁路，连接南北两个战场。国民党集中重兵困守徐州。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亡国论是主要邪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鲁南台儿庄一个战役中，国民党集中主力四十万，消灭了日军七千人，造成了被大吹大擂了一段时间的所谓“台儿庄大捷”。这时，“速胜论”的鼓吹就热闹起来了。亲蒋的《大公报》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利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来审判”。他们鼓吹“速胜论”的真正目的，是拒绝实行政治改革，坚持反动的片面抗战路线。就在这种吹嘘声中，国民党在三月二十九日举行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他们拒绝和各党派一起制定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却通过了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片面抗战路线的《抗战建国纲领》。同时，逐渐加强法西斯统治，以压制强烈地要求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的人

民。

台儿庄之战以后不久，由于国民党自始至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敌军在徐州以西的陇海路上突破防线，威胁徐州守军的后路。结果，国民党的吹嘘言犹在耳，几十万大军却在五月十九日从徐州狼狈撤退，使敌人达到了打通南北战场的战略目标。接着日军准备进攻武汉。国民党以自己军事上的惨败戳穿了他自己吹起来的“速胜论”的肥皂泡。“速胜”既不可能，于是又倒向了亡国论。反动派中的亡国论的调子就又流传起来了。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实质上也是崇信“速胜论”的。他宣称“南京军队表现他们能抵御日本机械化部队从海空各方面的攻击”⑧，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则诬蔑说：“现在大家都喊游击战，好象有了游击战什么都不成问题似的”。⑨在党的工作中心问题上，他一贯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指示，坚持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城市，醉心于合法运动，致力于拉拢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五月二十二日，中央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华中工作的中心应由城市转入农村，应不惜武汉的城市工作部分地受到损失，而要派主要干部、动员大批工人、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武装民众，准备和发动游击战争。但是王明顽固地拒不执行，一直坚持他的城市中心论。王明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毫无做艰苦的发动人民战争、保障抗战胜利的战略思想，却幻想依靠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来取得“速胜”。

为了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阐明抗日战争的规律和党的路线，毛主席自五月二十六日到六月三日在延

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连续发表讲演《论持久战》。这部伟大的著作全面地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所处的时代特点和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精辟地论证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的问题。不仅彻底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而且系统地阐明了党的革命路线，清楚地指明了夺取抗战胜利的道路。

毛主席用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了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对主要矛盾，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毛主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中日双方有互相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来看，日本的长处是暂时的，而且可因我的努力而使之削弱；日本的短处是基本的，而且可因我的努力而使之扩大。我国的短处是暂时的，并且可因自身努力而克服；我国的长处是基本的，并且还会因不断努力而加强。日本的长处和中国的短处，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长处和日本的短处，决定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根据这些分析，毛主席英明地指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这种完全科学的结论，十分令人信服地彻底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给了人民以坚定的胜利信心。

在论述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夺取最后胜利时，毛主

席深刻地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坚持持久战的过程也就是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削弱敌人，扩大自己，转变敌我强弱对比，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过程。并且强调指出：**“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那就不仅可以制敌人于死命，而且还必然要打出一个新中国。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地批判了王明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取得胜利的错误，也以无限信赖人民群众力量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了全党和广大人民。

但是，顽固地站在错误路线立场上的王明，不但不接受这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育，反而极力加以抵制。他拒绝在受他控制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这篇光辉著作，连摘要地、分段地发表都不同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受他把持的地区中依然不能贯彻执行。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敌军开始北起陇海线、南至长江两岸向武汉大举进攻，北面的开封和南面的安庆先后相继失陷。这时，王明依然拒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三令五申要准备和发动中原、华中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的指示，擅自在武汉宣布战略的中心是“保卫大武汉”，向蒋介石提出所谓政治军事保障计划，向陈诚保证把民众力量统一到武汉卫戍工作中去。但是，当敌军步步进迫，亟需动员人民支援战争的时候，蒋介石却指使陈诚下令解散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群众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和青年救国团。这时，敌军南北五路，全线进攻。国民党在前方

节节败退，在后方文恬武嬉，只知全力压制人民。九月中旬，敌军占领了田家镇，长江已无险可守。自南京失陷后就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的武汉已经危在旦夕。事实清楚地暴露了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

在抗日战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这个重要时刻，一九三八年十月，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讨论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新阶段时所面临着的各项重大问题，以保证全党沿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前进。

在这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毛主席代表政治局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党在五中全会以来的五年，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十五个月以来的工作。毛主席论述了必须用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特别着重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强调既要坚持统一战线，又要坚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统一战线中是有严重的阶级斗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忘记了阶级斗争，被人抹煞或自己抛弃了党的独立性，那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些指示再一次强调了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也规定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

为了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毛主席强调要学习我党十七年来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并且严正指出：在反倾向斗争中要注意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毛主席还着重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

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并且特别指出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强研究，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以便完成历史赋予我党的艰巨的任务。

这个报告虽然并没有直接点王明的名，却深刻地触痛了他的神经。他大要两面派手法，在十月二十日又作了一次又臭又长的发言，表面上同意中央政治报告，实际上继续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谬论，顽固地对抗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毛主席在会议结论中又进一步驳斥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谬论。

十一月五日，毛主席着重地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那时，虽然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但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甚至不容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经过我党一年多坚持争取民主的斗争，国民党不得不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但是，这不过是国民党控制下的一个谘询性质的机关，共产党只能以“文化团体”的名义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毛主席指出：**“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王明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彻底实行阶级投降主义。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

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六日，毛主席又针对王明轻视武装斗争、反对发展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妄图将我军“统一”于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着重论述了战争和战略问题。毛主席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与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离开了准备武装斗争和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武装斗争，民众的组织和斗争就不能真正发挥革命的作用。王明在武汉搞的那点合法组织，本来就起不了多大作用，国民党一禁止，就全垮了，就是深刻的教训。由此可见，紧紧地掌握无产阶级的兵权，是决定党和人民的命运的大问题。毛主席教导全党：**“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战争和战略问题》）

这时，华南和华中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十月十一日在广东大亚湾、大鹏湾一带登陆的敌军，一路无阻地陷惠阳，下增城，国民党军不战而溃。十月二十一日，国民党未经抵抗就把华南最大城市广州让给了敌人。接着，被高唱入云要“誓死保卫”的“大武汉”，也在二十五日未经激烈战斗就陷于敌手。广州、武汉的先后陷落，更充分地证明了王明路线的谬误。根据战争形势的变

化，六中全会调整各地中央代表机关的设置，撤消了原设在武汉的长江局，另在重庆设立南方局，在华中敌后设立中原局，改原由长江局领导的东南分局为东南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最后通过了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批准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又在组织上结束了王明把持一部分地区领导权的状况，基本上克服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全会重申了党的纪律，规定任何党员个人未经中央同意不得以党的名义发表宣言和文章。全会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

第三节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相持阶段的有条件的到来】　武汉广州陷落后，日军已侵占了半个中国，控制了大部分主要交通线和大城市，国民党则基本上被赶到了西南和西北的后方。日本侵略者认为蒋介石政府已不能对它造成多大的威胁。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骄狂地提出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的野心，同时又宣布：“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有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加拒绝。”这样，它就改变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把战争初期采取的对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策略，改成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企图借

此分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以华制华”的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的招降声明一出，立刻就从国民党那里得到响应。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代表马上赶到上海，在十一月中旬和敌方代表秘密会商，接受了敌人的招降条件，实行所谓“日华共同防共”，中国承认满州国，允许日本驻兵和日本人在华居住和营业自由等等，并无耻地把这些说成是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潜离重庆，经由昆明到达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这时，敌人把事前商定的条件在二十二日作为第三次近卫声明公开发表。然后，汪精卫在二十九日发表所谓“艳电”，公开响应近卫声明，宣称要按声明的条件和敌人进行“和平之谈判”。由此，汪精卫及其一伙党羽就公开实行了对日投降，并且劝说蒋介石也接受这些条件。

但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然不是国民党亲日派所能出卖的。敌人对国民党改变策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敌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广大的土地，但是战线越来越延长，兵力越来越分散。而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却迅速发展起来。这使日本政府感到国民党虽然不能阻挡住它的进攻，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却是可怕的。于是，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用到解放区战场。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时，敌大本营在《关于一九三八年秋季以后战争指导的一般方针》等文件中，就一再强调“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确保主要交通线”。为此，一九三八年秋冬，敌军就对华北各主要根据地展开了残酷

的“大扫荡”。一九三九年春，华北敌军又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军事上提出了“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从此，敌后战场逐渐变成了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妥协投降，领导敌后军民，不顾艰苦困难的条件，英勇地展开反“扫荡”战争，不断打击敌人，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军民，决不允许国民党出卖祖国，妥协投敌，就迫使蒋介石不敢公然和汪精卫走上同一条路。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表面上说要继续抗战，但是却在会上说明“抗战到底”的“底”，是“复恢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为实现投降摆出了“价格”。他的党羽们也公然制造“日本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地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等投降舆论。蒋介石还派出密使与敌人在香港、上海等地进行秘密谈判，随时准备转而结束抗战，代之以投降。实际上是徜徉于阴阳之界，徘徊于和战之间，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唱双簧，装红白脸。

蒋介石的这种反革命两面政策，是和他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态度分不开的。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成立“反共轴心”以来，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一贯借口“中立”，实行所谓“不干涉”政策，纵容法西斯侵略活动。一九三八年七月，英、法和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希特勒，企图引德军东向进攻苏联。日本在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的同时，正在准备对苏联发动进攻。英美帝国主义也想在远东演出慕尼黑丑剧，企图在维护自己的殖民利益的情况下，促成中日妥协，促使日军北向进攻苏联。一九三八年冬和一九三九年春，英国驻华大使多次往

返上海、香港、重庆之间，为日蒋牵线搭桥，企图策动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出卖中国抗战。

但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却使远东慕尼黑阴谋不能得逞。一九三九年七月，英国在有关天津租界的问题上与日本订立《有田—克莱琪协定》，完全承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实际局势。日本于五月间在中蒙边境诺蒙坎发动的进攻遭到惨败，不得不向苏联要求停战。因此，远东的反苏战争并没有发生。在欧洲，英、德、苏三国关于集体安全的谈判于四月开始进行。由于英、法只要求苏联保证它们的安全，却又企图在东面开一个缺口让德军东进威胁苏联，所以，到八月中旬谈判终于破裂。八月二十三日，苏、德签定了互不侵犯协定。九月一日，希特勒进攻波兰。英、法企图“坐山观虎斗”的诡计失败，不得不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爆发了。国际形势的这种发展，使蒋介石对日本投降难以实现，这一次远东慕尼黑阴谋也终成泡影。

武汉、广州失陷之后，正面战场上敌军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停止，标志着战略阶段的某种转移。毛主席指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下，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了。但是，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的军力对比，并未由我之劣势转为敌我平衡，所以“相持”只能是基本上的和有条件的。只要敌军一旦发起进攻，蒋介石军队就会继续退却。一九三九年二月，敌军登陆海南岛，国民党军的防线几天内就全部瓦解。三月，敌军又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江西南昌。六月，广东的潮州，汕头

等地也陷于敌手，此后，国民党战场上的这种损兵失地的事依然是不时发生的。

【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　蒋介石是随时准备结束抗战，代以投降的。因此，他的政策不仅不是加强团结，改革政治，准备反攻的力量，而是加紧反共活动，强化法西斯统治，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在武汉、广州失陷之后，国民党政府明显地实行了它在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转移到反共反人民。

一九三九年一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以后，又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沦陷区防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国民党在各地竭力控制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行动，破坏一切群众组织，加强特务统治，限制和镇压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到处进行磨擦破坏活动。又编造雪片一般的所谓“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陕甘宁边区实行封建割据，向外扩张”，乃至“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等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制造反革命舆论，准备实行分裂。从此，全国各地到处弥漫着反共的黑潮。蒋介石还派出一部分军队，进入敌后，打着发展游击战争的招牌，实际上和敌伪勾结，专门反共。于是，在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到处出现磨擦事件。

对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反动派早已进行封锁和破坏。他们阻止革命青年去延安，并由特务机关在西安、兰州设立法西斯主义集中营，加以逮捕和囚禁。同时，在边区内部，开展所谓“点线工作”，发展特务组织，进行破坏活

动。一九三九年初，国民党在陇东地区制造土桥、庆阳事件，破坏边区政权。在绥德专区，利用他们还保存着的专区及县的行政机构，大肆进行反共活动。五月，在边区周围大规模地修筑由沟、墙和堡垒构成的封锁线，断绝边区与外界的交通，准备发动军事进攻。

在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抗日游击战争一开始，国民党就破坏统一战线，到处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冀中的张荫梧，山东的秦启荣这些反共专家，都是在一九三八年春，根据地刚开辟时就开始搞"磨擦"活动。以后，国民党又委派所谓省、专区等政府官员进入敌后，妄图向共产党"收复失地"。他们还宣称要取消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晋察冀政委会等抗日政权。一九三九年四月，山东反共专家秦启荣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干部战士四百多人，制造了博山惨案。六月，河北的磨擦专家张荫梧袭击八路军在深县的后方机关，惨杀我指战员四百多人。在华北各根据地到处发生了这类惨案。张荫梧与敌军和华北伪治安军勾结，共同进攻八路军，无耻地自称"曲线救国"。这种政策立即为蒋介石所推广，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陆续投降敌人，改编成伪军，在"曲线救国"的名义下公开反共。从此，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经常处在日军，伪军和反共顽固派三方面夹击之中，使斗争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了。

在华中地区，国民党除在皖南限制新四军的活动，在江南敌后极力破坏我军的东进抗日之外，一九三九年起，又到处破坏新四军的后方机关。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

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位同志，制造震动全国的“平江惨案”。

所有这些反共活动与围绕和战问题闹得甚嚣尘上的投降倾向，成了当时政治形势中极为严重的危险。为了反击这种逆流，毛主席在六月三十日发表了《反对投降活动》的重要文章，号召**“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的周恩来同志写信给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提出了严重抗议。七月七日，党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八月一日，延安举行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纪念大会，毛主席亲自出席，发表题为《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强烈地提出**“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并针对蒋介石妄图利用“统一”的名义消灭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阴谋，鲜明地提出了要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的主张。大会打电报给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议平江惨案，要求取消那秘密流行、并成为各地磨擦事件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毛主席又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和《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等一系列著作中，教导全党要提高警惕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

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毛主席指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强调必须坚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重要的政治原则，重申了我们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的政治口号，号召全国人民用一切努力去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阴谋，力争时局的好转。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必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的自卫原则，以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发表】 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我们党面临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一九三九年六月，毛主席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分析反投降斗争形势和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便对付可能的突发事变，引导革命的航船绕过险滩和暗礁，驶向胜利的前途。这样，革命的实际运动迫切要求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一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路线。这个重要的任务已经历史地提到党的面前来了。

准备自己，也就是加强党的建设。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群众中威信迅速增长，大批革命新生力量要求参加党的队伍。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党中央政治

局会议，就已专门作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定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力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和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一年多以来，党的组织工作随着革命斗争的迅速展开，而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但是，由大批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新组织，还不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有提高水平的问题，老组织也需要进一步巩固。而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党内也混进了不少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针对这种情况，一九三九年八月，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规定在一个时期中，一般地停止党的发展，而把整理、紧缩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且特别指出，要把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纠正各种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观点，当作巩固党的中心一环。

毛主席十分重视从政治上思想上建设我们党的问题。十月，党中央出版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专门刊物《共产党人》。毛主席亲自写了长篇的发刊词，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任务。毛主席指出，要解决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党的问题，这是与党的十八年斗争历史分不开的；并且深刻地分析了我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特点，在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党的建设问题。

毛主席揭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因资产阶级背叛革命

而被迫分裂统一战线。并且总结了这种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也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十八年来，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两重性，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他们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不懂得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被迫分裂统一战线时，又不懂得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重新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这两种机会主义，都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毛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学习这个历史经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主席揭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另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争形式的。我们党经过了参加北伐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个时期的斗争，才逐步学会了

和坚持了武装斗争的。不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不把各种斗争组织到以武装斗争战胜敌人的总目标中来，就不能真正理解怎样建设我们的党。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也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毛主席教导全党：**“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正确处理革命武装斗争，是党的建设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这两个特点，都为我国革命所有，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正确地理解这两个问题，决不能靠抄袭任何现成的公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现结合起来。毛主席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全面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我们党的建设过程，同样是有三个阶段的特点。党的幼年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经过革命斗争的反复实践，经过反对党内错误路线斗争，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党对于理论和实践有了更加深入和更加统一的理解，就能胜利地领导和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这种深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给了我们党以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

宝。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这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以这三大法宝武装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决定性的意义。

《〈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光辉著作，是毛主席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它鲜明地指出：党的建设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只有在革命实践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才能从思想上政治上巩固党。这是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是和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完全对立的。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不久，一九三九年七月间，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抛出了大毒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闭口不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却大肆宣扬孔孟之道，大谈唯心主义的“思想意识修养”，要人们关起门来“吾日三省吾身”。这种离开当时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修养”经，其目的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腐蚀党。这样的建党路线，只能使我们党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党员“修养”成资产阶级伪君子、两面派，以适应蒋介石“溶共”政策的需要。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共产党人〉发刊词》，实际上是对刘少奇的修正主

义建党路线的深刻批判。

【《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　在准备自己、也准备群众、准备舆论的斗争中，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更深入更完全地结合起来，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伟大的理论著作。

国民党顽固派从加紧反共投降活动以来，便更进一步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谬论。一九三九年又发起了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高叫“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它的目的都是妄图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反共声浪一时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民族资产阶级也摇摆不定。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同时，全国的民主宪政运动也在开始展开。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须要加以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道路也须加以批判。这也使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更直接的提到全国人民的面前。只有从理论上彻底弄清楚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才能正确地指明中国的出路，把全体革命人民组织起来，去打倒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夺取革命的胜利。

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战胜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错误的政治路线总是以错误的理论为基础的。抗战以来，王明从“左”跳到右，推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时也在理论上宣传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他鼓吹要发扬“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些所谓“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叫嚷要原来敌对的阶级、党派、军队，都在“仁爱”的旗帜下“相互礼让，

相互尊重、相互敬爱”。党的六中全会之后，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是这一类荒谬的理论宣传并没有终止。刘少奇、陈伯达还公然抛出《论共产党员修养》和《新人生观的创造》、《三民主义概论》等修正主义大毒草，继续毒害党和人民。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彻底介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问题，用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已变得十分迫切而必要了。

为了解决这个伟大任务，毛主席在这个时期作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亲自主持编写了干部的政治理论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根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说明。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论断，是关于中国革命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

一九四〇年一月，毛主席发表了伟大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了全面的科学论述。这部著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彻底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问题，更加完整地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

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指出：中国社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虽然革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是已不属于旧的范畴，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了。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

级，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并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这个光辉论断，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正警告。如果它们顽固地坚持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就必然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结果。这也是对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深刻批判。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阶级投降主义，便必然会滑到反革命方面去。第三条道路或者中间路线是没有的。

毛主席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以及这两步之间的正确关系问题。这时，蒋介石雇佣了几名托洛茨基匪徒，大肆鼓吹“一次革命论”，胡说什么一切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之内了，共产主义应该“收起”云云。针对这种叫嚣，毛主席科学地阐明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区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反革命三民主义，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宣扬“一次革命论”的目的，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消灭任何革命，为投降日寇制造舆论。同时，毛主席又总结了党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经验，完整地论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

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并且明确地指出：**“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毛主席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制定了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以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政权构成形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为国家所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建立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著作，不仅从思想上政治上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而且完整地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前进的航向。这些著作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发展了关于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关于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毛主席在从事伟大的理论斗争的同时，还领导全党为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危险，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的政治和军事斗争。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春，蒋介石为了准备投降日寇，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九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在湖北省东部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

惨杀共产党人五六百人。十一月十一日，国民党军和特务一千八百多人围攻河南省确山县的新四军留守处，残杀伤员和军人家属二百多人，造成了确山惨案。就在这时，国民党举行五届六中全会，秘密决定从以政治“限共”为主的方针，进而实行军事“限共”为主的方针。这样，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发展到公开实行军事进攻的程度，第一次反共高潮就此开始了。

这次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蒋介石、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原来在抗战初期，在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山西成立了群众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组织了抗日武装决死队（新军）。在蒋介石的策动下，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秋和日军直接勾结起来，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反共事变。十二月初，阎锡山在晋西假说发动冬季攻势，要接受我党领导的新军配合出击，同时制造谣言，诬蔑新军“叛变”。并且调动事先集中的六个军的兵力，发动突然袭击，企图消灭新军，乘势进攻解放区。这次反共高潮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对陕甘宁边区的直接进攻。蒋介石在十二月底，指令胡宗南部向边区大举入侵。胡部出动陆空军配合进攻，强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个县城。并且集结大军，准备进攻延安。在绥德专区内的国民党顽固派也肆意进行破坏活动，接应胡宗南部的进攻。这两次东西相应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把延续了一年的反共磨擦活动推到了高潮。

对于反共顽固派的这种猖狂进攻，毛主席领导全党进行了坚决斗争。新军在八路军支援下，给了阎军以重大打击之后，分头进入晋西北和太岳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军也从此正式编入了八路军。十二月二十五日，八路军将领

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和控诉了蒋介石“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罪行，从政治上进行了反击。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由华北前线回援陕北，协同留守兵团，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驱逐了盘踞在绥德地区五个县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巩固河防，消除了内敌，并且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联成一片。

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毛主席及时地指示全党掌握正确的策略。一九四〇年一月，毛主席为党中央写了《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指示，全面地分析了政治局势，指出当时形势的特点，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抗战方向，在对立的斗争中，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必须对一切投降反共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制止投降和反共的全国化；另一方面，也必须认清还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团结和进步的有利条件，可以迫使国民党顽固派不易完全妥协投降，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因此，党的总方针，应该是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高可能发生突然事变的警觉性。除了坚决反击顽固派的军事、政治进攻之外，还必须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

毛主席亲自领导全党贯彻党的这个总方针，向反共顽固派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汪精卫和日寇签订了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⑩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延安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讨汪大会，毛主席亲自出席，并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为题发表讲演，并为大会起草《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

这些文件，声讨了汪精卫的反共卖国罪行，也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活动大张挞伐。同时向全国发出号召，要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二月二十日，延安举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主席又亲自出席，并以《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为题发表演说，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争取民主的斗争。毛主席尖锐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口谈宪政、实际上坚持法西斯专政的欺骗宣传，指出我们现在需要的宪政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是经过同反动派的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毛主席的指示，给全国的宪政运动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我党的这些强大的政治攻势，对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还在继续进行。一九四〇年二月，冀南地区的国民党石友三部完全投降了日伪，勾结敌军向八路军进攻。接着，蒋介石又在三月指令朱怀冰等部和日伪军配合，在晋东南地区分三路进攻太行根据地，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我一二九师在多次劝导，顽军仍执迷不悟的情况下，奋起自卫反击，歼灭朱怀冰三个师和击溃石友三部，彻底击败了这次进攻。

顽固派在军事上受了挫折，在政治上又陷于孤立，终于不得不收缩它反共的魔手。至此，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就被打退了。

第四节　人民抗日力量的迅猛发展。《论政策》等著作的发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解放区战场的反“扫荡”战争。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加强】　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继续同敌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和“扫荡”，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同时，在斗争中迅速壮大了自己。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到一九四〇年七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五十万人，共产党员发展到八十万人，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已经达到大约一万万人。我军抗击着侵华日军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八和伪军的全部，总数共达七十万。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已经成了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解放区战场已经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

在华北，八路军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四个大的战略区。

晋察冀边区：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我边区军民粉碎了五万敌军的二十五路“围攻”，毙敌七千人，伤敌万余人。一九三九年，日寇在春季大“扫荡”被粉碎后，十月间，又在北岳、冀中两个战场上发动了冬季大“扫荡”。敌人对北岳区分兵十二路进行围攻。我军除分路阻击外，并深入敌后作战。十一月三日，日军第二混成旅团

头目阿部规秀中将，从涞源派出一个联队约七百余人，向我军进攻，被我围歼于三岔口山沟里。阿部接到求援急电后，倾巢而出，向我军反扑。结果，陷入了我军布置的包围圈内。阿部规秀犹如一条受了伤的疯狗，率领残部一千六百多人疯狂向北突围。在黄土岭、上庄子一带，又被我阻击部队截住。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名将”，东冲西突，到处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阿部及其以下五百余名官兵均被我军击毙。日寇哀叹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到十二月中旬，我军共打死打伤日寇四千多人，俘虏日伪军二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冬季“扫荡”。这时，晋察冀边区已发展到同蒲路以东，正太、德石路以北，张家口、沽源、承德以南，山海关以西，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之各一部，划分为北岳、冀中、平西、平北、冀东五个区。

晋冀鲁豫边区：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我军粉碎了三万敌军对冀南的进攻。一九三九年七月至九月，在反击敌人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中，又歼敌近万人。这样。发轫于太行山上的抗日游击战争，便扩大为西起同蒲、汾河，东至渤海，南靠黄河，北沿正太、德石路的一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划分为太岳、太行、冀南、鲁西、冀鲁豫五个区，包括山西的东南部、河北的南部、河南的黄河以北部分以及山东的西部。

晋绥边区：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初，我军粉碎了敌人春季大“扫荡”后，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在晋西北召开了第一次晋绥边区行政会议，建立了晋绥地区的抗日民

主政权。接着，又粉碎了敌人的夏季大“扫荡”和冬季大“扫荡”，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山东区：一九三九年三月，罗荣桓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一部进入山东西南部。我军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即投入战斗，首先攻克了敌伪重要据点郓城西北的樊坝。四月下旬，敌人动员了泰安、兖州、济南、东阿等十七个城市的守备兵力六千多人，坦克一百辆，在其山东最高指挥官的率领下，分兵七路，向我军驻地泰安、肥城一带山区的陆房包围靠拢，妄图一举围歼我军。五月十一日，我军连续打退了敌军多次冲锋，毙伤敌军一千三百多人后，乘夜四面突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次日，敌军在炮火掩护下窜进陆房，不见我军影子，惶惑地叫道：“八路军天上飞去了！”最后，只得拖着一批尸体，狼狈而归。八月，我军再次在古梁山泊附近歼敌一个大队。一九四〇年一月，又击退敌三万余人的进攻。山东地方游击队也于一九三九年统一了编制，有力地配合着主力部队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全区有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等五块抗日根据地，包括津浦路以东之山东省的大部地区以及河北和江苏两省的各一部地区。

在华北我军反对日寇的斗争胜利发展中，却受到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顽固坚持王明路线的彭德怀，背着中央，从一九四〇年八月起，擅自调动八路军一百十五个团四十万兵力，发动了“百团大战”。这次战役，错误地把正在发展中的游击部队过早编成正规军打大仗，进攻敌占交通要道，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在敌人面前暴露了华北我军的实力，违反了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政治上适应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

实行阶级投降主义。这一严重错误，造成了华北我军尔后作战的许多困难。同时，在“扫荡”和反“扫荡”的尖锐斗争中，敌军也极力加强它对铁路沿线的控制，侵占了一部分县城、主要集镇和交通要道。敌军还按照所谓“囚笼政策”的需要，加强修筑公路线和一小部分铁路线，到处筑碉堡，安据点，大挖封锁沟，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和包围。华北敌后斗争的困难正在逐渐增加起来。

要坚持长期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加强根据地建设，有重大的意义。从抗战一开始，毛主席就强调要建立敌后民主政权。但是，由于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干扰，有不少地方并没有真正建立起革命的政权。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但是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加上右倾路线的影响，边区以下的地方政权的情况却是复杂的。绥德等区的行政权力把持在顽固派手中，还有不少县份是国共两方各自派有县长的。在河北省，冀中、冀南都早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但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竟从遥远的后方任命了一个所谓“省政府主席”，要在敌后复辟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而忠实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彭德怀，竟然大张旗鼓地予以欢迎。在山东，从一九三七年冬起，我党就发动游击战，逐步建立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王明路线的影响，没有及时独立地建立人民政权，顽固派却打着“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招牌，指挥秦启荣之流反共专家，到处进行反共屠杀。历史经验证明，不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就不可能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王明路线的不要政权的错误，正好适应顽固派反共投降的需要。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纠正错误路线的干扰，指导解放区政权建设，毛主席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为中央写了党内指示《抗日据据地的政权问题》。指出：**“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这个文件，对我党要建立的政权的性质、三三制原则和施政方针，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个指示，结束了王明路线的不要政权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纠正了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

在毛主席指示的指引下，各敌后根据地普遍加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太行、太岳两根据地和冀南、鲁西、冀鲁豫几个根据地，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建立统一的行政联合办事处，形成包括五个地区的晋冀鲁豫边区。一九四一年正式选举成立边区政府。在山东，一九四〇年底建立了战时行动委员会，作为山东地区的最高行政机关，原来已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加强了政权建设工作。一九四一年二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改选。十一月，举行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毛主席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演说，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进一步树立了典型。各个战略区的形成，各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加强，对于华北敌后抗日斗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起着重要作用。

【华中和华南敌后抗战的发展】　当敌军以主要力量对华北我军进行扫荡战时，新四军正在长江两岸积极实行战略展开。东进江南的第一、二支队在基本上建立了茅山根据地之后，一九三九年初开始，一面东进武进以南的

滆湖地区，一面北上经营扬中、苏北。五月，主力一部组成东进纵队，越过沪宁路，开辟江阴、无锡、常熟间的三角地区和阳澄湖地区，挺进上海、苏州近郊，六月夜袭了虹桥机场。十一月，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任指挥。长江北岸我军，五月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同志任指挥。第四、第五支队在皖东的津浦路东和路西建立了根据地。由河南东进的游击队，开辟豫皖边区，以后又编成第六支队，进入淮北开辟根据地。另一支游击队在鄂豫开辟工作，以后组成鄂豫挺进纵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党中央鉴于华中我军已经实现初步的战略展开，决定进一步大力开展华中敌后抗战，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一九四〇年一月，江南新四军组织挺进纵队，向苏北扬州、泰州地区进军。同时，八路军二万多人，由山东和冀鲁豫地区陆续南下，增援淮水和皖东北的新四军。这样就造成了由北、西、南三面协同开辟苏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形势。

发展华中敌后抗战的工作，是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首先，在皖南领导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项英依然拒绝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持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放手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人民军队。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主席专门为中央写了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批评了项英的错误。毛主席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我们必须坚决实行发展的方针。**“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

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并且告诫项英，对于反共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必须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要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这个指示下达后，在苏南，陈毅同志立即贯彻执行了。但是项英却仍然不愿执行，使皖南新四军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国民党在西北和华北发动的反共军事进攻被击败后，就把华中变成了新的反共磨擦活动的重点。盘踞在苏北的韩德勤部拒绝团结抗日，从一九四〇年三、四月起，不断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李品仙部一起，向我皖东和皖东北根据地进攻。大别山的桂系顽军还围攻我在鄂中、鄂东坚持游击战争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国民党并提出要在安徽、江苏坚持抗战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军撤往皖南，企图霸占江北，割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以便各个击破。这些地方的我军，在江北指挥部指挥员张云逸同志和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同志的领导下，都坚决实行了自卫的原则，坚持了抗日根据地，并坚决地拒绝了国民党要四、五支队南下的“命令”。

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给日军造成了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的有利条件。就在国民党驻鄂、豫、皖三省的军队大部用于磨擦战争时，从一九四〇年五月起，华中敌军发动了鄂豫战役。国民党军队稍作抵抗便一败涂地，六月前半个月中，连失襄阳、荆门、沙市、宜昌，敌军前锋直进到三峡门口，国民党军退缩到恩施一角。武汉失陷后还剩下来的大半个湖北省，这时又精华全失。千百万人民，被勇于反共、怯于应敌的国民党顽固派委弃于敌军的

屠刀之下。

针对这种形势，为了督促国民党对敌抗战，中国共产党中央在纪念抗战三周年对时局宣言中，提出了正确解决抗战进程中的两党关系问题的建议。宣言声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将自己的行动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个县境内，与一切抗日军队协同作战。但要求国民党约束其部下，不采取足于引起冲突的行动，以保证抗日战线上的团结一致。但是，蒋介石不仅对这种合理建议完全置之不理，反而在七月中旬向我党提交所谓“中央提示案”，要八路军、新四军“扫数”集中到河北和察南、晋北的一个狭小地区去，而且要“所有纵队、支队及其它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结束”。这个狂妄的方案，不仅要人民把大片已经收复了的土地交给敌人，要人民军队停止抗战，而且妄想把人民军队赶到一个狭小的地带，假敌军之手一举而消灭之。这是蒋介石的十分阴险毒辣的狼子野心的暴露。

但是，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不会上蒋介石的当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部队，继续在敌伪顽军的夹击下，有力发展华中敌后抗战。一九四〇年七月，陈毅同志领导的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与挺进纵队会合，建立苏北指挥部，东进黄桥，开辟泰兴、靖江、如皋等五县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在打退了顽固派的进攻之后，也在南下的八路军支援下东进开辟淮海地区。但是一贯不打日本，专一反共的顽固派韩德勤部却集中苏北的顽军，大举向南线我军进逼，扬言要歼灭我军于长江以北。我军苏北指挥部根据协同对敌作战的愿望，按照韩德勤的要求退出姜堰，并一再退让到黄桥，

并提出强烈要求，希望他们停止进攻，协商合作抗日。但韩德勤完全错误地估计形势，认我军团结抗日的行动为可欺，继续向我军进犯。十月初我军奋起自卫反击，进行了黄桥反顽战役，歼灭了进犯的顽固军主力。蒋介石和韩德勤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他们妄想消灭新四军苏北部队，却以他们自己的失败促成了我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稳固。从此，华中敌后抗战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华南，从广州失陷后，以东江地区红军游击队员、省港工人、学生为主要成份，组成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他们不断打击敌伪军，先后在淡水、东莞、惠阳、宝安等地建立根据地。一九三九年春，在南海、顺德、中山一带也开展了游击战争。抗日武装力量遍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并以淡水为中心，在二十多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一九四一年，发展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在海南岛上，一九三八年冬，原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琼崖抗日自卫队独立队。日寇入侵之后，游击队奋起抵抗，并在斗争中迅速成长壮大。到一九四一年，发展到数千人，成立琼崖纵队，在儋县、临高、琼山、澄迈一带山区建立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坚持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人民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迅猛发展，是和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正确地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分不开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仅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联合，而且还和一部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从这个统一战线形成之日起，毛主席就强调指出，在正确执行党的路线中，右倾机会主义、即阶级投降主义将

是主要危险倾向，并且领导全党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不断的斗争。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但是，当我们党着重反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时，“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实际上被掩盖着；到了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十分尖锐时，这种过左的错误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而且干扰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

这种过左的倾向，表现为忽视中日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把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计为马日事变，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很快就会全面破裂，全国性内战即将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已经不适用了。从这种错误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出发，便不能不在政策和策略上出现一系列错误。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不懂得适可而止，不懂得在目前条件下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还不敢完全投降日寇、彻底与我党分裂。不善于区分顽固势力和中间势力，并忽视对后者实行团结和争取的方针。不注意争取知识分子。过分打击愿意抗战的地主以及资本家、商人等。在政权工作中忽视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作用。甚至反映到军事行动上，不坚决执行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认为国共合作即将破裂而主张向国民党军队驻防地区发展。这些倾向还没有发展成一条错误路线，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以后的一个时间中，却成了妨碍正确执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主要危险。

毛主席领导我党正确地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在继续反对右的倾向的同时，针对当时的形势，号召全党注意纠正开始变成主要危险的“左”的倾向。一九四〇年三月，毛主席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

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重要报告，全面地论述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同年十二月，毛主席又写了党内指示《论政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策略方针，并且详尽地规定了一系列的重要政策。这些著作完整地表明了毛主席的策略思想。

首先，毛主席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抗日战争中划分为进步、中间、顽固这三种政治势力的特点，完整地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论政策》）的策略路线。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革命的基本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动革命的群众运动。这是我们一切斗争的立足点，是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是党的一项极重要的政策。**“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但是，要实现这些任务，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这就是：我们有充分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我们对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方面同他们的反共投降政策作坚决的斗争。**“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

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团结他们共同抗战。这三者是党的完整的策略原则的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

要正确贯彻这种斗争策略，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毛主席强调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以为斗争会使统一战线破裂，而幻想以片面的退让求团结，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错误的。只有对顽固派的投降反共政策作坚决斗争，才能阻止投降和内战的全国化，借以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但是，以为斗争的手段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统一战线可有可无，这种“左”的机会主义倾向也是错误的。

为了实现抗战胜利和建设新中国这个总任务，我党不仅要尽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且要充分利用顽固派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在顽固派还没有公开的全面的破裂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应争取他们留在统一战线中，其时间越长越好，这对于坚持团结抗战是有利的。我们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思想上、政治上乃至军事上的各种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主席制定了统一战线中反对顽固势力斗争的策略原则，指出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必须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

防御性。有利即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也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而是利用顽固派内部的矛盾，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原则。对顽固派斗争要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以后，应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并主动地同他们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双方实行休战，而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时，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总之，**“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论政策》）为了实现这个基本原则，克服“左”的右的倾向，毛主席还规定了党对于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这些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是总结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经验的结晶。毛主席教导全党，必须记取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样两种极端政策的教训，实行综合联合斗争两方面的政策。这一套完整的斗争策略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它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高度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

【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开始的。这年四月，希特勒德国占领北欧，五月向西线发动进攻，英法联军不堪一击，在一片混乱中逃往英国，德军进入巴黎，法国宣布投降。九月，德、意、日签定同盟条约，正式形成法西斯三国轴心。同时，日军霸占了越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蒋介石以为日美斗争从此激化，日本将无力侵华；另一方面，日本也以退出龙州、南宁为饵向蒋介石诱降。蒋介石决心利用时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十月十九日，他用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表“皓电”，大肆诬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强令黄河以南的人民抗日部队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并要五十万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十万人。同时密令大江两岸的国民党军几十万人，准备向我军大举进攻。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也大大增加。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这样开始了。

在对付这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我党在一开始即采取了既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又照顾团结抗日大局的立场。十一月九日，我党以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等名义，发出“佳电”，恰当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要我军限期北移的荒谬命令。但是，为了顾全抗战的大局，同意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同时，对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公开的抨击，要求解决国共两党间的若干重要悬案。电文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扫清道路。”这些人“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这就向人民指出了

时局的严重危险，使人民提高警惕，准备应付突然事变。这种既坚持原则又顾全大局的态度，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取得了中间派的同情，使顽固派蒋介石陷于被动，而我党在政治上则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同时，党中央又指示华中全军紧急动员，为应付突然事变，进行充分的政治军事准备。

但是，奉行王明路线的项英等人，起初不顾背靠顽固派的危险，企图株守皖南，不愿北移。以后，在中央的一再批评下，几经拖延才决定北移，却又违反中央指示，不按中央指出的路线前进，而去和顾祝同商量我军北上路线。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共九千多人开始北移。这时，顾祝同、上官云相早已布置了七个师共八万余人对我军进行伏击。五日，我军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同国民党军遭遇。由于项英指挥混乱，举措不定，以致逐渐被顽军合围。面对着敌人的重兵围攻，我军广大指战员奋战七昼夜，终于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于十四日阵地全部被占。军长叶挺同志最后领导部队奋勇突围时，被窃据东南局付书记职务的饶漱石迫使去和顽敌“谈判”，以致被扣。项英在危急时出逃未成，最后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全军除千余人英勇突围外，其余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反咬一口，于一月十七日发出反革命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二十余万军队向新四军江北部队进攻。第二次反共高潮至此达到了罪恶的顶点。

事变发生之后，毛主席领导全党迅速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

令，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二十九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正式重建，并将华中我军改编为七个师。在八路军的有力配合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坚持和发展华中的抗战。与此同时，我党在政治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二十二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反革命事件的严重政治阴谋。并严正警告顽固派，要他们**“悬崖勒马，停止挑衅”**。提出了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何应钦等人、停止华中西北的反共活动、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等十二条，作为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行动纲领。我党呼吁全国人民警惕事变的发展，准备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并且严正宣告，无论时局如何黑暗，我党和全国人民都有责任和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反动派横行到底。

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解放区广大军民坚决声援新四军的斗争，痛斥顽固派的反共投降罪行，并为打败顽军的新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各阶层人民，也纷纷要求团结抗战，反对反共内战。许多海外华侨团体为此发出了通电。本来劝我让步的中间人士，这时也转而对我党表示同情和支持。蒋介石在政治上完全陷于孤立，他的英美主子也不愿他完全投降日寇。在内外责难，狼狈不堪的情况下，蒋介石企图用诱骗我党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办法来掩饰他的罪行。我党坚决回击了这个阴谋，拒绝出席参政会。三月二日，我党提出了要求国民党停止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等十二条，作为解决时局的临时办法和出席参政会的条件。我

们党的这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阴谋，获得了广大人民包括中间派的广泛同情。三月六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说什么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这实际上已是退兵时的一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被打退了。

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的面目被彻底揭露，我党的正确方针则得到了国内外一切赞成抗日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我党对顽固派的坚决斗争，也支持和争取了中间派。在这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在他们的统治区大规模逮捕进步分子，镇压进步文化活动，实行白色恐怖。中间势力在我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开始组织民主党派。在一九四一年八月，正式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我党合作进行抗日民主运动。这次斗争的经验，充分证明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的英明伟大。毛主席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著作中，再一次强调了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教导全党，要认真执行《论政策》中的原则指示，防止“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善于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反革命的两面政策，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有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这些总结进一步丰富了我党的斗争策略。

第五节　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

【整风运动的准备】　我们党创立以后，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经过和机会主义路线的不断斗争，直到伟大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彻底地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从那时以来，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不断地胜利前进。党在政治、军事、思想和策略等方面，都有了正确的完整的路线，党不仅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而且还规定了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硕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发展。党的历史经验，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一条真理：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路线不正确，即便夺取了政权，还会丧失政权。路线正确，没有政权也会取得政权。

遵义会议以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依然存在。机会主义路线仍然不断地从右的或“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只有坚决同这些危害革命的错误路线作斗争，并且彻底战胜它，正确路线才能得到贯彻执行。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错误路线，这时虽然已得到纠正，但也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彻底地加以清算，特别是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就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发表之后，王明还把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加上三版序言，

重新出版，为错误路线辩护。《论政策》一文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也受到党内一些人的非难。同时，党的老干部虽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迫切需要提高马克思宁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抗战以来，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大批新党员有很可爱的革命极积性，但又带着不同程度的旧阶级和旧思想的烙印，迫切需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理论是路线的基础。要彻底纠正一条错误路线，不但要进行组织上的整顿，而且还要进行思想上理论上的整顿。要贯彻执行正确路线，也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为基础。为了使全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必须开展整风运动，把两条路线斗争提高到理论上来加以解决，从思想理论方面打败错误路线，彻底摧毁错误路线的理论基础。只有把思想上的路线搞正确，才有可能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这是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是正确路线彻底战胜错误路线的保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已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善于把它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的任务，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这个指示并没有正确地贯彻。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全党进行一次深入的整风运动，不对党员进行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端正起来，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政策和策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毛主席、党中央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了准备。一九四〇年底，从各地抽调了一些负责干部和“七大”代表来延安学习。一九四一年三月，重新出版了《农村调查》。毛主席在序言中严肃地批判了

那种“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错误态度，重申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强调必须**“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为题作了重要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正是这个主流，保证了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但是，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和这种主流背道而驰的、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教条主义这个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指出：**“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实行和提倡的是理论和实际分离。**“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毛主席号召全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此，毛主席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以及根本改造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的任务。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之一。它为开展整风运动提出了战斗的纲领，作了重要

的政治动员和理论准备。全党整风运动的准备工作，在这个报告精神的指引下全面地展开了。

这时，抗日战争正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我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一九四〇年中，侵华日军以几乎一半的兵力使用于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一九四一年，更增加到以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兵力进攻解放区。三月，日寇和汉奸在华北提出所谓"治安强化"的口号，妄图巩固他们对占领区（敌人称为"治安区"）的统治，加紧对敌我争夺的游击区（所谓"准治安区"）的"蚕食"，和对我解放区（所谓"非治安区"）的"扫荡"。在"扫荡"中，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八月，敌伪军十万人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一九四二年五月，敌伪军五万人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大"扫荡"。对晋冀鲁豫、晋绥和山东等根据地的"扫荡"也大大加强了。对华中解放区，敌伪除了进行"扫荡"、"蚕食"以外，从一九四一年年中开始，还进行了反革命的"清乡"活动。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

在日伪加紧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猖狂地实行"曲线救国"。大批国民党官吏和将领投敌反共，整师整军的顽固派军队换上了汪伪军的旗号全力进行反共战争。同时，蒋介石又增派军队包围抗日根据地，加强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根据地军民。本来就微薄不堪和拖延欠发的八路军、新四军军饷，从第二次反共

高潮一开始便被全部扣发。加以华北广大地区连续发生的水、旱、虫灾，更增加了解放区的困难。在内外敌人的进攻和封锁之下，抗日队伍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有的地区的军民不得不以树叶草根充饥。这种严重的困难局面，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年中一直延续着。抗日根据地缩小了，解放区人口由一亿降到了五千万以下，华北解放区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由四千万减少到二千五百万。八路军由四十万减少到三十多万，新四军由十三万五千减少到十一万，干部损失很多。

世界法西斯势力也猖獗一时。法西斯德国占领了西欧之后，一九四〇年开始侵入东南欧。一九四一年春，席卷巴尔干。这时，美英又一次玩弄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企图实行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的局面。六月二十二日，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十二月八日，日本袭击了美国的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并向英美宣战。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菲律宾、关岛、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缅甸、荷属东印度等广大地区。一九四一年七月和一九四二年六月，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先后同英国、美国签订了共同对德作战协定，最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抗战形势极端艰苦，斗争任务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毛主席把领导整风运动作为带动全党一切斗争任务的中心环节，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中国革命的航船经过曲折的航道驶向胜利。

【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　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毛主席、党中央继续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了一系列

准备。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了加强党性锻炼的问题。鉴于我们党长期处于农村和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占据很大比重，容易产生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中央在决定中要求全党同志增强无产阶级党性锻炼，使我党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八月，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意义，并对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作了重要的部署。九月，党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讨论了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克服主观主义，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这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干部的一次整风会议。九月二十六日，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规定中央及各解放区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和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问题。毛主席亲自担任中央学习组组长，并领导各高级学习组。十二月十七日，中央通过《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以后又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纠正了干部教育工作中违反正确路线的错误。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重要演说《整顿党的作风》，向全党发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伟大号召。从此，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了。整顿三风，从思想上清算机会主义路线，主要是王明路线，这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它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基本原则，

以便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

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这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用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而在当时，教条主义则是主要危险倾向。王明一伙就是教条主义的典型。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那不过是吓唬、欺骗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实际上他们从来也不照马克思主义办事，从来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从中引出结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相反地，却把某些书本上个别结论，当作天上掉下来的灵丹妙药，以为只要得了它，就可以包医百病。这样，他们的路线和政策便必然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广大人民的要求，同反映这种客观规律和人民要求的革命路线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也就必然要在实践中遭到破产。而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轻视马列主义的指导，结果往往被教条主义所俘虏，并成为他们的助手。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虽然表现形态不同，但在思想方法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以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为特征的，都是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只有克服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使党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贯彻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为了战胜主观主义，毛主席向全党提出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任务。**“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

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又严正地批判了党风中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陈独秀的家长作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李立三的一言堂，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都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毛主席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剷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为了克服宗派主义倾向，毛主席号召全党同志要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为全党进一步规定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新干部和老干部、以及几部分军队、几个地方、几个部门之间的正确关系。

为了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毛主席为整风运动规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强调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主席在解释这个方针时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

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的准则，既区别于否认矛盾、不分是非的“党内和平论”，又区别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了团结大多数的原则。这个方针，要求在进行党内斗争时，实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在实践中第一次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接着，二月八日，毛主席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重要讲演，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毛主席指出，党八股也是一种洋八股、洋教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党八股这个形式主义，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文风也是党风的一个方面，它是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在我党历史上，围绕着文风问题进行的原则斗争，是和两条路线斗争分不开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就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么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就要原形毕露了。只有彻底破除党八股，代之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文风，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才能得到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党的事业也才能向前推进。

毛主席的这两个重要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论述了清除机会主义路线影响、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

作风的问题。分析批判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这两个报告和《改造我们的学习》是领导整风运动的基本文件。同年，四月三日，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接着，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六月间，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全党展开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党整风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　政治路线的斗争，总是要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反映出来的。抗战以来，王明、周扬之流在延安和解放区各地，通过报纸、刊物、文艺作品、书籍，以及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阵地，狂热地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胡说什么提倡学习马列主义，就会妨害创作情绪，写不出作品来。他们以反对功利主义为名，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们主张以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作为文艺的理论基础，鼓吹“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他们提倡所谓“暴露文学”，宣称“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他们在“写熟悉生活”的口号下，反对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专门去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条文艺路线，是“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为王明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

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混在革命

阵营中的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王实味、丁玲、肖军、罗烽等，在周扬的纵容下，积极配合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向党发起了进攻。丁玲、陈企霞把持的《解放日报》副刊，成了反党的前沿阵地，发表了大量反党反人民的毒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作。周扬本人也赤膊上阵，抛出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坚持推行王明路线，公然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这批毒草一出笼，就博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喝彩叫好，被当作反共宣传材料，大量印行，有的还被改编为剧本上演。

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思想文化界，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对这条文艺黑线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是"五四"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阶级斗争的继续，是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王明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伟大的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出席会议，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五月二日，讲了"引言"，二十三日，又讲了"结论"。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批判了王明、周扬之流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路线斗争的历史

经验，为我们党制订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毛主席的这部光辉著作，是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文艺、改造世界的战斗纲领，是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必读的经典文献。

《讲话》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的光辉思想，强调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为千百万工农兵服务，还是为一小撮剥削者服务？这是马列主义文艺路线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斗争的焦点，它深刻地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历史观的斗争。无产阶级文艺必须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强大工具。它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的目标和任务，服从于党在一定时期中的纲领和路线。因此，革命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不断增强路线斗争观念。

《讲话》精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观点，全面地论述了文艺与现实生活、文艺创作和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

中改造主观世界，转移立足点，学习和总结亿万工农兵所创造的宝贵经验，努力反映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

《讲话》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人性论”的种种表现，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这是对孔孟之道的反动性虚伪性的尖锐批判。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各种错误言行，坚决斗争到底，努力做到：**“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

为了更好地发展革命的文学艺术，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作斗争，必须掌握文艺批评这个有力的武器。文艺批评的标准是什么呢？毛主席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无产阶级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就为文艺批评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最后，毛主席号召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指出：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而且

尖锐地提出了究竟按照什么阶级的面貌建设党、改造党的问题。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些人就必然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的主张，要求人们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必须向他们大喝一声道：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党的队伍，**“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开展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只有积极展开这种斗争，才能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的发表，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新纪元。延安和各解放区文艺界，立即掀起了学习《讲话》、实践《讲话》的热潮。以王明、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受到了揭露和批判。大批革命文艺战士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和工农兵群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创作了许多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革命文艺开始把抵抗日本侵略者、反对国民党投降反共活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作为创作主题，小说、诗歌、杂文、报告文学、剧本、歌曲、木刻、漫画等，都开始反映革命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东方红》由一个贫农创作出来了。群众性的文艺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许多村庄都成立了村剧团或宣传队。采用陕北秧歌及其他民间艺术形式创造出的秧歌剧和大秧歌，深受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在秧歌剧运动普遍开展

的基础上，涌现出了歌剧《白毛女》这样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新戏剧。对旧戏剧的改革工作，在毛主席的“**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也开始进行。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在戏剧舞台上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使旧剧开了新生面，成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立】　毛主席、党中央在发动整风运动的同时，领导解放区军民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在各根据地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加强党、军队和革命政权的建设，夺取抗日斗争的更大胜利。

一九四一年以来，日寇在对根据地频繁的“扫荡”中，实施了残酷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人力物力遭到巨大的损失，加之长期战争的消耗使人民负担日益加重，遂使根据地的物质困难十分严重。同时，在敌人实施分割、封锁的蚕食政策下，根据地被缩小，敌之合击与“扫荡”也随之更加频繁，我们在抗战以来迅猛发展中所形成的庞大的组织机构，已逐渐不能适应敌后战争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兵精政简以减轻人民负担，解决战争机构与战争环境不相适应的矛盾，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党中央在一九四一年十月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精兵，就是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充实编制，加强地方部队和发展民兵，并且加强整训，达到短小精干、机动灵活、提高战斗力的目的。简政，就是要求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目的。十二月十七日，党中央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指示》中，进一步强调了既能支持

长期战争，又利于将来反攻的精兵简政政策，并且指出：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

各根据地遵照中央的指示，把精兵简政列为中心工作之一。当年冬天，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就精简了百分之二十四。十一月七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主力军大力实行精兵政策，同时大力整顿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甚至实行主力部队完全地方化。指示规定，在各根据地建立军区和军分区的独立建制和指挥机关，以加强对地方武装和民兵武装的领导。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虽然主力军暂时缩小了，却大大加强了地方武装的领导和民兵工作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而且健全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推动了人民战争的发展，也为主力军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大发展准备了雄厚的基础。

解放区的精兵简政工作，在整风运动的推动下迅速向前发展。各根据地经过精简后，党政军脱产人员一般只占全民人数的百分之三以下，军政费开支大为减少，人民负担随之减轻，并且部队、机关人员积极参加生产，深入基层，不但改善了生活，增强了干部、战士的群众观念，也密切了军民关系，改进了思想作风。经过精兵简政的战争机构，适应了当时敌后斗争的环境，不仅在粉碎敌人合围"扫荡"中行动轻捷，应付裕如，而且由于组织精干，战斗力强，为执行全面对敌斗争方针，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事实证明，**"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它对于克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发展人民力量，

都有很大的意义。

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使解放区军民在物质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对于在抗战期间，我们将遇到极端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毛主席早有预见，多次指示对此必须有精神准备，一切要从长期打算，并指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必须依靠群众，依靠自己，以**“自力更生”**的方针，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在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党必须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并号召解放区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以便战胜财政经济困难。各根据地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极积行动起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一年三月，原来守备在绥德分区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向延安以南的南泥湾，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用树枝搭草棚，安营扎寨，开荒种地，揭开了大生产运动的光辉的一页。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在一九四二年也广泛开展起来。几万机关干部、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学员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发展自给经济。边区政府办了不少自给工业，机关团体纷纷组织机关生产。组织群众生产的工作也逐步开始。一九四二年，南泥湾的部队生产已经做到“不要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边区开垦的荒地即达二百万亩。一个广泛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开始形成起来了。

同年十二月，陕甘宁边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总结了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规定了**“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决定财政的是

经济，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解放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这一方针，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

减租减息，是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推动生产的发展，建设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又一项重要政策。毛主席指出：**“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自洛川会议决定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后，各解放区都先后公布了有关的法令，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减租减息，获得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但各地在执行中还存在着政策不够统一和工作不平衡的现象，存在着右的或“左”的偏向。为了进一步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党中央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对减租减息政策作了具体的全面的规定。它的基本原则是：（一）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必须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交租交息，并保存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三）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对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租息也须照减；同时，在适当改善雇工生活的条件下，保护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

减租减息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充分发动群众，

才能胜利地进行这一场斗争，因此，必须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加强农民团体，依靠群众自己起来开展斗争。各解放区认真执行了党的政策，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的热潮。通过这个运动，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推动了根据地的其他各项斗争，使解放区革命政权从根本上获得了巩固。

斗争形势的发展，要求在各根据地中正式确立党的统一领导。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适应根据地日益缩小和被分割的严重形势，发挥党政军民的共同力量，更好地进行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各根据地必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每个根据地应当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并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各地区军政机关和民众团体中的党员或团员，必须服从上级和同级党委的领导，执行其决定。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现，从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的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

由于整风、生产、精兵简政等工作的伟大成就，各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立，使解放区军民充分地动员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成为一个强大的战斗整体，为战胜困难，巩固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造成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节　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　由于整风运动的初步胜利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统一领导等重要政策的逐步落实，一九四二年底以后，解放区就开始从严重的困难中逐渐走向恢复。这一年十月，毛主席指示晋绥地区积极发展游击战争，结束根据地因敌军侵蚀而逐渐缩小的趋势，并且提出了**“把敌人挤出去”**的战斗口号。这个伟大口号，立即变成了各抗日根据地共同的行动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军广泛发动民兵围困敌军据点，大力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伪势力，摧毁伪政权。同时机动地使用主力军，并和地方武装、民众相结合，粉碎敌军的“扫荡”，相机拔除敌军据点。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侵入我根据地时建立的据点，一个个被挤掉。从一九四二年冬天起，华北解放区战场就开始结束了敌军的入侵，而逐渐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华中解放区，严重困难时期的开始和结束都比华北迟一些，但到一九四三年春，敌军大规模“扫荡”也以失败告终。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有了飞跃的发展。根据地的人民，男女老幼齐动员，普遍参加自卫队和民兵。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到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在晋绥地区，抗日军民创造了许

多“挤”走敌人的斗争方法。在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民兵英雄大摆地雷阵，严重地打击了“扫荡”的敌军，推动了地雷战的发展。在冀中平原上，地道战在反击敌人的反复“清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各种游击战争形式，也都有了新的发展。由于群众武装的广泛配合，主力军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也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到一九四三年底，八路军重新发展到三十三万九千人。新四军发展到十二万五千余人，根据地的人口又上升到八千余万人。解放区战场的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看，发展和变化的情况就十分复杂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中、苏、英、美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宣言。这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加强。但是，这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在对抗日本的同时，加强了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关系。蒋介石被任命为联合作战的中国战区总司令，美国空军正式进入中国作战。二月七日，美国决定给予蒋介石政府五亿美元贷款。三月，美国派遣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租借物资继续涌入中国，美国政府为国民党政府大量地训练军事人员。美蒋还合办镇压革命人民的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美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大大加强了。

以美帝为后台老板的蒋介石，一方面，继续消极抗日，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另一方面，依靠美援加强它的军事政治力量，发展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极力巩固它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统治区中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腐朽和反动在继续加深。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仍以又打又拉的手段，引诱蒋介石投降。一九四一年四月，敌侵占了浙东宁

绍地区。不但对蒋介石的故园财产不加破坏，反而加意保护，敌酋畑俊六还派遣代表到奉化祭祀蒋的祖坟。一九四二年五月，敌军发动浙赣战役，经金华、兰溪，占领了供美国空军使用的衢州机场。接着又从南昌出动东西夹击，打通了浙赣铁路。但不久又部分地退出了。一个又打又拉，一个若即若离，蒋介石投降的危险仍然存在着。

在欧洲，一九四二年秋，斯大林同志领导苏联红军在伏尔加河上英勇地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进攻，经过艰苦的斯大林格勒城市保卫战，在十月间突破德军包围，十一月十九日展开全线反攻。到一九四三年二月，全歼德军三十三万人。这个战役是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战发展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本来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便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的能力了。但是，尽管如此，英、美依然迟迟不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只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北非实行了一次对于欧洲战场并没有多大影响的登陆作战。因此，一九四三年春德军还能在苏德战场发动了一次局部的反扑。这个事实说明，在欧洲反法西斯阵线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斗争。

就在这种形势下，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提出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完全从积极的革命的意义上同意了这个提议。五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宣告，完全同意这个提议，“自即日起，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定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决定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和它对中国革命的支援，并且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情况已变得十分复

杂，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各国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需要了。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比较其存在更加有利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很久以来，党就已经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决定自己的路线、政策和行动。抗战以来，在敌后经过空前艰苦的斗争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不假外力、独立创造出来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心和创造性更加增强，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站在抗日战争的前线，战胜日寇及其同盟者德国法西斯。他们将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定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肩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

【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蒋介石又喜又怕。喜的是可以不费力气，乘机捞取胜利果实。怕的是法西斯国家垮台，人民力量增强，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更加孤立了。为了消灭人民力量，维护反动统治，国民党在一九四三年春起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了一本由汉奸代写的臭名昭著的反动小册子《中国之命运》⑪，拼命宣扬法西斯主义，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是“封建割据”。全书的主题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同时，极力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孔孟之道的中庸哲学，作为他的反动的理论基础。这是一套系统的法西斯主义理论。黑书一出，国民党政府立刻通令全国机关

团体、学校、军队一体诵读。既用以加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统治，又为新的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接着，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全面发动反共高潮。六月九日，国民党特务、托派张涤非在西安召集九个人开了十分钟的会，"通过"了一纸电文，叫嚷什么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解散"。七月六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了这个消息。接着便百犬吠声，到处发出了这种反共叫嚣。同时，蒋介石加紧反共军事部署，妄图在陕甘宁边区发动闪电式的进攻。胡宗南指挥的三个集团军，早就已经有两个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到六、七月间，又把担任黄河防线的一个集团军中的两个军调回，参加包围陕甘宁边区。这样，国民党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反动军队，已达到六十万人之多。反共战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新的反共高潮发展到了顶点。

与此同时，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原来早已降敌，五月，又由敌方派回重庆进行诱降活动。蒋介石亲自加以接见，并与之密谈。事实证明，反共与投降始终是密切联系着的。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反共新高潮，进行了强有力的斗争。《中国之命运》出笼后，我党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公开的批判。七月七日，延安三万人举行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反共军事部署，惩办特务，讨伐国民党投降将领，审判日本诱降密使吴开先。解放区到处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反投降、反内战的抗议运动，军民一致动员起来，掀起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热潮。同时，我军为实行自卫反击，作了充分的准备。

七月十二日，毛主席为《解放日报》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对反共投降的阴谋作了尖锐的揭露，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并且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准备进攻边区和中央社发表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两件事都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的，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八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日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用共产党抗击着大部分敌军和全部伪军的事实，驳斥了蒋介石的诬蔑。同时揭发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五十八人和“副总裁”以下的中央委员二十多人降敌的罪行。这个鲜明的对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个伟大真理。

我党的这些政治斗争，帮助广大人民认识了蒋介石的本质，也得到了中间派的同情，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解放区军民严阵以待，也使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国际形势也对他不利。我党的全国抗议运动展开后，世界进步舆论也一起谴责蒋介石的反共投降活动。这时，法西斯意大利于九月无条件投降，苏联正准备发动新的攻势，投降日本必无出路。这些因素，使蒋介石不能不暂时罢手。九月，国民党先后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党参政会的三届二次会议。一面通过诬蔑共产党的反动决议，一面又唱起“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调头。实际上，是被迫暂时放弃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野心。这一次新的反共高潮就被打退了。

十月五日，毛主席在为《解放日报》写的《评国民党

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社论中，对国内外形势和国民党今后的政治动向作了精辟的分析。国际形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也面临着灭顶之灾的命运。但是蒋介石丝毫不想走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道路，**“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告诫一切爱国的和革命的人们，必须对局势的发展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运动本身的发展，到一九四三年秋季以后，逐步进入深入发展的阶段。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继续认真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在整风的基础上审查干部，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肃清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指示中说：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是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而又在性质上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前者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者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根据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在反“扫荡”，反顽和战胜物质困难斗争的同时，把整风运动推向深入。

时事政策学习，是深入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抗战以来，党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党组织是处在抗日统一战线的环境下，加上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流毒也还没有肃清，以致不少党员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还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对中国现阶段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缺乏完整的认识，特别是对无产阶级领导、对工人农民

为主体、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等重大问题认识不清。有的同志甚至看不到蒋介石反动派的本质。政治思想上的这些倾向，妨害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和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为在党内进行阶级教育，提供了极好的反面教材。各地在深入整风的过程中，都按照中央的指示，结合反顽斗争进行了时事政策学习。

时事政策学习的中心内容，是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前途的问题，是从政治上分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清除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思想影响，进一步清除投降主义路线的流毒。广大干部和党员批判了《中国之命运》，学习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解放道路》以及《从九一八到七七》、《抗战以来敌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一笔总账》等文件和材料。同时，结合检查执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的情况，尤其是反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进行学习和讨论。这个教育运动，帮助全党全军正确认识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头子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分清了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区别，了解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认识了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之命运，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得解放，理解了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这对于准备全党迎接正在到来的复杂的斗争，确立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整顿思想作风的基础上，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各解放区有准备地先后开展了审查干部的运动。这个运动，帮助广大干部提高了阶级觉悟和组织观念，经受了一次严格

的政治思想锻炼和组织上的审查，挽救了一部分有严重问题的人使之重新做人，也使隐藏在党内的叛徒、托派、特务，在群众的揭发检举之下暴露了原形。这个运动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也使各级党组织能全面地掌握干部的情况，为更好地进行教育工作，培养和选拔干部创造了条件。思想作风上的整顿使党在思想上进一步纯洁起来，审查干部则使党在组织上纯洁起来，这就使党更加巩固，为实现党的路线和政策，夺取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审干运动是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毛主席总结了我党历史上肃反工作的经验教训，排除了刘少奇、彭真之流对审干工作的干扰，指导审干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指示》，规定了审干的路线和政策。这条路线的基本内容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在机关的肃反斗争中，坚持实行“一个不杀”。以促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以便使大多数的问题由机关、学校自己处理。毛主席指出：审查干部和全体工作人员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最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实行这个重要指示的结果，陕甘宁边区的审干运动发动了群众，正确地贯彻了政策，取得了很大胜利。由于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和陕甘宁边区的成功经验，各解放区的审干运动都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反对主观主义，改造党的作风的过程中，毛主席进一步总结反对王明路线斗争的经验，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为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号召全党清除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毛主席在决定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个教导，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又把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决定把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进一步推向前进，对于提高全党干部的工作水平和思想水平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整风运动使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军民更加团结。一九四三年春节期间，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地方拥护军队和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运动，改进和加强了军民关系。根据这个经验，一九四三年十月，毛主席指示全国各解放区，在一九四四年春节期间普遍地开展一次军队人员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根据地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全体人民群众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运动，并在以后每年举行一次。从此，**“拥政爱民”、“拥军优抗”**

的运动广泛展开。为了促进军队和地方各自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主席提倡在运动中要**“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这个指示的执行，在解放区军民之间，进一步建立了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关系，也大大提高了人民军队的政治素质。

【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大生产运动在各解放区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在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三年春节期间，著名的劳动模范发起了生产竞赛，并迅速推广开来。三月，中央西北局指示各地党委开展生产竞赛运动，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层，组织生产，从此，全边区工厂农村的生产竞赛发展得热火朝天。边区的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发动了起来，组织到生产劳动中去，形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十月，毛主席为中央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要求敌后各根据地的**“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毛主席在指示中指出，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在这个指示的推动下，一九四四年各解放区的生产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连游击区中也创造了发展生产的好经验。

减租减息是发展生产的一个强大推动力。一九四二

年，各根据地普遍实行了减租，但是由于地主的拖延对抗，干部和群众的经验不够，减租并没有完全彻底的实现。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切实核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发现那些没有减和减而不彻底的问题，实行完全和彻底的减租。强调指出：**“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解放区普遍检查了减租政策实施的情况，深入开展了减租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建立或改造农会组织。减租减息斗争的发展，对于巩固解放区，加强对敌斗争，发展生产运动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解放区的面貌。一向贫瘠荒凉的陕甘宁边区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本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发展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边区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许多地方做到了三年可积存供一年食用的余粮（“耕三余一”），并向“耕二余一”前进。较少担负作战任务的边区留守部队，做到了粮食、被服、经费全部自给，并且大大改善了战士的生活。敌后各解放区条件比较困难，但是也实行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作战部队也按照不同的情况达到了自给一半和一小部分的程度。全军兵强马壮，士气旺盛，由敌伪的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造成的物质困难克服了。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普遍参加生产，大大地改进了工作作风，加强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群众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婆姨娃娃，一起上阵，你追我赶。在这种大潮裹挟之下，懒

汉二流子也得到了改造，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白天，开荒的歌声遍野，晚上，纺车和机声盈耳。全解放区沉浸在一片军民团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空气中。这一切就形成了**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就在这个群众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象张思德同志那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大生产运动中，农民群众建立了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群众自愿参加的集体劳动互助组织。这种集体劳动组织，除了互助合作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综合性合作社。通过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历史意义的新事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讲话，及时地总结了这个经验，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它不仅起了把群众的力量组成劳动大军的作用，而且形成了集体化的萌芽，在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农业中，开始出现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毛主席向各解放区农民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并要求共产党员到群众中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共产党员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克服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

大生产运动的胜利，是党的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一九四五年一月，陕甘宁边区举行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

进一步总结了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自力更生方针的重大意义。毛主席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同时，由于领导大生产运动，我们党在实践中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毛主席十分重视这种经验，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党学会了领导生产运动，我们将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气，更有精力，愈战愈强，只有我们去压倒敌人，决不怕敌人来压倒我们。并把学会做经济工作，作为夺取全国胜利、学会管理城市的重要准备，向全党发出号召：**“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对全党学会领导经济工作，有极大的意义。

第七节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

【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和白劳德修正主义的出现】

随着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巩固，反“扫荡”、反蚕食的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侵入解放区的敌军据点逐渐被“挤”了出去。到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全国各解放区都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被侵占的地方，有的地区还有了发展。一九四三年底时，解放区人口（包括一面和两面负担粮税的）已上升到八千多万，军队人数重新发展到四十九万，党员发展到九十多万。这就使解放区不仅渡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准备了开展局部反攻的条件。

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形势，经过一九四三年的根本转变，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欧洲战场上，苏

联红军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从第聂伯河前线发动攻势，到一九四四年春已在一些地区突破了旧国界。陷于法西斯铁蹄下的阿尔巴尼亚等国人民，也加强了反法西斯游击战争。希特勒德国复灭的结局，已经是隐约可见了。在东方，美国对日本的反攻，进展是缓慢的，不过也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登陆吉尔贝特群岛，显示了在太平洋中部展开进攻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以及如何处理战后世界的一些重要问题，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反法西斯阵营各国举行了一系列国际会议。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举行的开罗会议，公布了《开罗宣言》，规定在对日战争胜利之后，日本强占中国的领土，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应当归还中国。接着，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了德黑兰会议，广泛地议论了如何战胜德、日法西斯和一些战后需要解决的国际问题。这时正象毛主席在不久前预料的那样，英美眼见得希特勒德国摇摇欲坠，已经感到必须登陆法国、打进西欧去了。因此，会议确定了英美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同时，英美迫切需要苏联在对德战争胜利后立即参加对日作战，以便减轻他们的严重困难。斯大林也在原则上承认了结束对德战争后，出兵远东，联合打击日本。这些会议促进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会后不久，苏军在攻势作战中解放了绝大部分国土。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英美军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第二战场终于开辟。八月二十五日，法国无产阶级的地下武装，在英美军迫近时举行武装起义，解放了巴黎。同时，东线苏军打出国境，横扫波兰境内的德军，在九月开始攻入德国领土。希特勒完

全复灭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共同作战中的前进，使战争胜利的前景更加确定了，这对世界各国人民是有利的。但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人抹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甚至幻想整个战后世界都应围着这种苏、美、英联盟打转。这种倾向在有些地方发展成为一条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种错误路线的突出表现就是白劳德主义。从一九四三年底起，窃据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的叛徒白劳德，连续发表一系列讲演和论文，鼓吹修正主义，并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出版《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修正主义纲领。他根本歪曲美帝国主义的性质，美化美国垄断资本，实行阶级投降主义；甚至在他主持下解散了美国共产党，另行组织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他把苏、美、英三国的德黑兰会议当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开始找到在同一世界中和平共处和合作的道路”。他要求各国共产党应该放弃他称之为“分裂路线”的阶级路线，“而代之以亲英、美、苏的团结路线”。他硬说每个国家的斗争应该“从一个长期的持久的和平的‘德黑兰’前景”出发，应该坚持“战后世界中的英、美、苏联盟目标”。一句话，诱骗各国人民去维护幻想中的“英、美、苏联盟”，而完全放弃革命斗争，这就是白劳德修正主义的实质。

毛主席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估计，是和白劳德主义完全对立的。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演，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总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

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而后一个特点，正是当时许多人没有看清和没有正确认识其重要性的。正象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严重的阶级斗争一样，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也是有尖锐斗争的。只有坚决支持和发展反法西斯阵线中的人民力量，战胜反人民势力的破坏，才能保证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离开了这种革命的路线，象白劳德那样为了“战后世界中的英、美、苏联盟”，而限制和放弃各国人民的斗争，那就只能助长反人民势力的猖獗，断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开罗、德黑兰等会议的召开，一方面表明联合作战的加强，另一方面却也包括反法西斯势力内部的反人民势力的勾结，例如蒋介石与美帝加强勾结的活动。向各国人民掩盖这种现实，抽象地提倡什么走“德黑兰道路”，是对各国人民的革命十分有害的。

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对时局的分析的无比正确性。在战争胜利的发展过程中，反法西斯阵线中的反人民势力正在极力向人民进攻，企图夺取胜利果实。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一些国家的革命势力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一九四四年十月，英军乘德军败退，带着流亡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英军司令斯科比，用武力支持这个反动的流亡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在血泊中建立了白色恐怖的统治。接着，在法国和意大利，由莫斯科回国的修正主义头子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先后迫令两国无产阶级，把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几十万人民武装自动实行“缴枪”，把胜利的果实亲手奉献给两国的大资产阶级。这就是典型的白劳德

式的“德黑兰道路”。事实证明，白劳德主义是一条国际性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这种一方面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大好，一方面反人民势力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逆流抬头的复杂形势下，我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坚定地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绕过暗礁，向人民的胜利前进。

【国民党战场的大溃退。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

这时，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这个特点，在我国表现得特别清楚。最突出的事实，就是从一九四四年春开始的国民党战场上的大溃退，和我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的陆续展开。两个根本不同的战场，再一次出现了十分鲜明的对照。

一九四四年春，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失败已经接近，美军在太平洋上的进攻也有所加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最后挣扎的力量，重新对我国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发动了进攻。它的目的，是要打通平汉铁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把它在东南亚的大片占领区和本部联结起来。三月，开始了河南战役。敌军只用了五、六万兵力，而国民党军蒋鼎文、胡宗南、汤恩伯等部四十万人都望风而逃，丢了战略要地郑州。以后，又在三十七天内，失城三十八座，河南省绝大部分沦于敌手。从此，鄂、豫两省敌军联成一片，平汉铁路被打通了。接着，五月下旬，敌军十万人在湖南北部发动攻势，拥有重兵的国民党薛岳部不堪一击，不过半个月，湘北、湘中一起沦陷，国民党弃长沙而逃。敌军横行湘南，六月底又完全包围了粤汉和湘桂两铁路的联结点衡阳。这时，敌军短期地停止了军事进攻。日本政府加强了对蒋介石诱降的政

治攻势。八月七日，衡阳守军头目，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投敌。湘桂铁路的东段也大部陷落，敌人的攻势已伸进了广西。以后，广东敌军由南面向北夹击，打通了粤汉铁路。

国民党军对他们的西南“大后方”也一样无力防御。九月起，敌军一面由湘桂铁路沿线进攻桂北，一面由广东的西江一线进占梧州，并从雷州半岛进攻桂南地区，三面包围了桂林、柳州一带。国民党军依然一触即溃，十一月中旬，桂林、柳州相继失陷。接着，敌军又由越南进占龙州，与经柳州南下的部队夹攻，在二十四日占领了南宁。这样，敌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在国民党军一溃千里的条件下，终于完成了。为了巩固这一战线的侧翼，日军又沿黔桂公路北上。不过三千多敌人大摇大摆地追逐着已成惊弓之鸟的大批国民党溃军，迅速越过广西省，在十二月初直抵贵州省的独山以北，深入于西南腹地。贵阳在二日下令紧急疏散。国民党豪门官僚们几年来当作安乐窝的重庆也大受震动，蒋介石甚至准备再向西昌逃跑。不过，在日军看来，留着这个专反共、不抗日的政府，对它倒是有利的；同时，它在其他战线正越来越困难时，也不宜在这里把战线搞得太长。于是，日寇把衡阳降将方先觉送回重庆。蒋介石恬不知耻地大肆吹捧，给予盛情接待。从此，彼此心照，敌军从独山战后撤到黔桂边境，结束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蒋介石这才算又可以在重庆偏安一偶。

这是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一片胜利声中唯一的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溃败。这个战役涉及五个省区，包括还在国民党手中的几乎全部铁路线。但是，由于他们多年来从不对敌作战，反动机构实际上已经溃烂，毫无战斗力，

因此，不过半年多一点时间，竟让敌军横行了半个中国，完全达到了它们的战略目的。国民党损兵五、六十万，失地二十六万平方公里，使六、七千万人民陷于敌军的铁蹄之下。这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以来实行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反动、腐朽本质的大暴露。

和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相反，解放区战场正以胜利的步伐迎接对日反攻作战的到来。从一九四四年春起，我军即在广阔的战线上发动强大攻势，展开局部反攻。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进行了一系列攻势作战，进一步摧毁敌人的分割、封锁，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山东发起了第三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的战役。华中解放区进行了车桥歼灭战。我军的攻势作战，使敌人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战争局面迅速向着有利人民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新形势下，一九四四年四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与时局》的重要报告，提出了我军独立自主地准备战略反攻的问题，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了使我党能够担负这一重大责任，毛主席号召全党：要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我党我军和抗日根据地，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沿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方向发展的。国民党军从河南溃退后，我军就开始进行和敌人争夺河南的斗争。一九四四年七月，党中央发布向河南进军的部署命令和政策指示，决定从太行，太岳根据地抽调精干部队，

挺进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以冀鲁豫部队积极策应，以新四军五师一部从平汉路北上配合行动。并以新四军四师一部进入宿县、肖县、夏邑、永城一带，建立阵地，打通与杞县、太康地区的联系，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遵照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我军组织豫西支队，南渡黄河，开辟了豫西解放区。新四军第四师在巩固淮北根据地的基础上，西进收复了豫皖苏边区。第五师一部也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建立豫南根据地。我军的这些重要部署和作战行动，为实现连接西北、华北、华中三大解放区和收复中原的伟大战略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新四军第五师还以一部兵力加强鄂南分区，相机南进。在湘桂两省沦于敌寇时，党中央又抽调在南泥湾屯垦的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他们转战数千里，突破敌顽的重重包围，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会合新四军第五师，建立了湘鄂赣和湖南解放区，并南下湘粤桂边。同时，广东的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在已有发展的基础上，于一九四四年春统一编制为华南抗日纵队。我军在南线的胜利进军，是尔后收复中南和华南的准备。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旬，自苏中南下的新四军第一师主力一部渡过长江，会合在苏皖边坚持斗争的第十六旅，建立苏浙军区，在苏浙皖交界处开辟了广大根据地。新四军浙东纵队在一九四二年开辟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解放区，到一九四四年又有了新的发展。我军在苏、浙、皖地区的发展，为解放包括上海、南京在内的东南广大地区，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我军在一九四四年中，对敌作战两万多次，毙伤敌伪军二十二万多人，俘敌伪军六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近三万人，收复县城十六座，攻克据点五千多个，新解放了八

万余平方公里国土和一千二百多万人口。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季攻势中，我军又进行了大小战役百次以上，攻克县城二十二座，收复国土八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五百多万。

经过一年多的局部反攻，我军人数有了很大的发展，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主力已经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人。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外，计有华北的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冀热辽区、晋绥区、山东区，华中的苏北区、苏中区、苏南区、淮北区、淮南区、河南区，皖中区、浙江区、湘鄂赣区、鄂豫皖区，华南的广东区和琼崖区等，共十九个解放区，北起内蒙，南迄海南岛，东临大海，西至陕甘宁，面积共达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九百五十万。至此，日寇所占领的全国大多数中心城市和交通线，都已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

此外，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七七事变后曾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下发展到十二个军。以后，虽然有一部分被打散了，那些一度参加统一战线的国民党旧军队和地方武力，也投敌叛变或溃散了。但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却经住了严重的考验，继续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游击战争。这也是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完成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伟大使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　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反共反人民政策的结果，不仅在前方遭到了全线溃败；在后方，造成了民生凋蔽，民怨沸腾，民变蠭起的危机。蒋介石政府的反动腐朽和一切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更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觉悟。人民已经懂得，国民党统治区的

一片黑暗，归根到底是蒋介石集团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结果。

蒋介石反动集团七年来一贯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经济上，加紧掠夺人民，聚积了大量财富，加强了四大家族对金融、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独占地位，迅速发展了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果，使农村破产，工厂倒闭，物价飞腾，亿万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在政治上，依靠庞大的特务组织，厉行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人民没有任何自由民主的权利，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惨遭迫害。在军事上，大部份国民党军队撤退到西南和西北地区，坐山观虎斗，保存实力，准备发动内战。在文化上，暗无天日的压迫箝制，尊孔复古。全国人民对于蒋介石反动派在政治上的独裁、经济上的掠夺和军事上的惨败，无不愤怒异常。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战场惨败后，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掀起了一个爱国民主运动，各界人民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自由，改组国民党反动政府。

我们党及时领导了这一民主运动，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战、准备内战的种种罪行，指出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乃是一切罪恶的总根源。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我党派代表到西安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我党提出了实行民主团结，以便克服困难、加强抗战和准备反攻。但是，国民党却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央提示案”，不仅根本不提民主团结的问题，甚至连抗战也一字不提，却要“限期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五分之四，留下的五分之一也要在“整编”之后“限期集中使用”，同时，还要求改变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要完全取

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权。他们在谈判中也恬不知耻地强调所谓"军令政令的统一"。这样，谈判从五月拖到八月，从西安争论到重庆，从河南大溃退时拖到衡阳失陷，直到敌骑直捣西南后方的大门，还是连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极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这时，国民党政府于九月五日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讲了又臭又长的开幕词，厚颜无耻地掩饰军事上的惨败，说什么并没有"为害于我们国家的危险"，却重弹老调，说"今后安危成败所系的一点，这就是我们国家绝对需要统一"。这就是说，大好河山可以任他断送，人民要坚持抗战却决不允许，他事实上已向人民发出了内战的威胁。我党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九月十五日、我党谈判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和失败的症结，并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人民团体的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十月十日，延安举行群众大会，周恩来同志以《如何解决》为题，代表中央对我党关于挽救时局危险的主张作了具体的阐明。指出：应该立即按照实际情况召开代表各种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根据革命三民主义的原则制定改变国民党错误政策的施政纲领；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改组国民党把持的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然后，在联合政府成立后，重新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实行宪政。

但是，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不准有一丝一毫的改革。在十月十日，他发表了一个演说，继续对共产党和人民发出内战威胁，并对国内外批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舆论进行污蔑。十月十一日，毛主席为新华

社写了《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的评论，尖锐地驳斥了蒋介石的谬论。指出所谓双十节演说，表明了蒋介石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并为发动反共内战制造借口。评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

国共两党的斗争，集中反映了中国政治中的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走我党指出的道路，召开国事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就会实现民主团结，保障抗战胜利，并在战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如果让蒋介石集团继续它的寡头专政，沿着封建买办法西斯道路走下去，那就不仅会断送抗战前途，而且将使中国继续沦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这两条道路是不可调和的。还在抗战开始时，我党就已经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必须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成立民主的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抗战七年的经验已充分证明，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已把国家民族带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结束这个法西斯主义的政府和失败主义的统帅部，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要求。党终于把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当作行动口号提到全国人民面前来了。

全国人民热烈响应我们党的号召，展开了强大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实现国事会议、联合政府的斗争。不仅解放区人民一致行动起来，连国民党统治区中也逐渐发展了一个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月间，重庆多次举行集会，国民党民主派如宋庆龄等，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民主党派代表张澜等，都响应党的号召，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民主同盟（民主政团同盟改称）

也公开发表政治主张，要求结束一专党政，实行民主政治。昆明、成都、桂林、西安，到处举行规模不等的座谈会、讲演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十二月以后，重庆、昆明、成都等地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工人、学生纷纷起来进行反特务争民主的斗争。一九四五年二月，重庆工人为反对特务枪杀工人，举行了八万人的大示威。同年五月，昆明两万学生大示威，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消一切特务机关。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剧烈地展开了。

【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斗争】　中国的两个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是同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和反人民势力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中国解放区开始局部反攻的形势下，美帝国主义打着“援华”的招牌，加紧从各方面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击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妄图取日本的地位而代之，使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

在我党提出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开始发动起来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派赫尔利为特使来到中国。十月，美国宣布由魏德迈继任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十一月，由赫尔利继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些步骤，表明了美国统治集团全力支持蒋介石反动派的决心。赫尔利来华的目的，就是帮助国民党在全国“统一军事”，支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以“防止国民党政府崩溃”。而采取的办法，是企图诱使中国共产党“缴枪”，以便“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于蒋介石和魏德迈的指挥之下。这是反法西斯阵营中反人民力量扑灭人民革命的阴谋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反人民势力在欧洲一度施展得逞的狡计，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却碰了壁。十一月七日，赫尔利打扮成一个赞成“民主”的和平使者的姿态，由重庆飞到延安，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他妄想诱骗中国共产党把军队交给美蒋指挥，然后参加国民党政府。你交出军队，我给你做官，然后从根本上扑灭革命。赫尔利玩弄的正是这一套阴谋诡计。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坚持自己的革命路线。毛主席当时就针锋相对地向美方指出：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针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欺骗和恫吓都没有效果，赫尔利只得玩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接受了一个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为主要内容的“五点协议”，答应以这个协议作为“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协议”。

于是，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为代表，和赫尔利一道由延安飞到重庆，准备在“五点协议”的基础上与国民党政府当局商定具体实现联合政府的问题。但是，垄断资产阶级是不会讲信义的。一回到重庆，赫尔利就向蒋介石解释，说这种协议不过是为了要使共产党“将他的武装部队的控制权交给国民党政府”。结果，五点协议变成了由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反建议”。就是：要先收编人民的武器，然后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要先由国民党政府“统一指挥”人民军队，再“吸收”共产党人“参

加”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就连人民的自由权利也要由蒋介石政府根据“战时军事安全需要的限制”来“给予”。赫尔利也马上变了卦，反过来要共产党“接受国民政府的反建议”。伪善的“民主”外衣被迫剥去，显露出来的依然不折不扣地是那个“缴枪”、“做官”的阴谋诡计。这样，谈判毫无结果。

蒋介石在美国主子的指使下，继续玩弄政治欺骗。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他发表广播演说，宣布不要等战争结束，就“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人民”。我党坚决揭穿了这些阴谋诡计。一月三日新华社发表延安权威人士的评论，彻底驳斥了蒋介石的元旦广播，指出蒋介石的“国民大会”，不过是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坚持的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主张的档箭牌。不先消灭蒋介石的寡头专政，彻底改组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保障人民的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的国民大会。七日，赫尔利又电邀我党派代表继续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同志再次由延安飞重庆，行前发表声明，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并且郑重声明，除此并无别途可以挽救危机。但是，美国支持蒋介石的“统一”的主意早已定了。他们要谈判，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和欺骗世界舆论而已。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蒋介石的腰更加硬起来了。二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片面宣告国共两党谈判失败。周恩来同志在十六日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坚持法西斯专政使谈判毫无结果，并由重庆飞回延安。三月一日，蒋介石公开发表演说，毫不掩饰地坚持寡头专政，拒绝民主的联合

政府，并且确定地宣布“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宪政”，迫不及待地要“还政于民”。接着，赫尔利也彻底撕下了“调停”者的假面具，四月二日在华盛顿发表声明，粉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硬说中国“统一”的阻碍是“有武装的政党”，叫嚷要“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而不和共产党合作”，毫不掩饰地把他一贯执行的扶蒋反共的政策公开了出来。至此，由美国政府导演的蒋介石和赫尔利的双簧戏，达到了高潮。蒋介石自以为得计了，迫不及待地要把蒋记“中国之命运”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但是，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命运任人摆布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党坚决顶住了这股反动的逆流。三月二日，新华社严正地驳斥了蒋介石的讲演，指出他顽固地坚持法西斯寡头专政，拒绝民主联合政府；并且揭露了曲解国共谈判经过，请外国人来压异己的阴谋；而所谓“召开国民大会”，不过是追踪袁世凯的“新华春梦”而自寻死路。并且庄严地宣告：“我们的主张是坚定而清楚的，任何花言巧语，欺骗恐吓，江湖流氓，借外人以压同胞，逞武力以图异己等下流无耻行为，让那些下流人物自由自在地去干罢，要想吹动别人一根毫毛，那是没有希望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一定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第八节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整风运动的胜利完成】　全党的整风运动继续深

入发展。在深入进行整顿三风、时事政策学习、审查干部等工作的同时，党中央又领导党的高级干部，开展对党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内，党中央政治局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一九四三年以后，集中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和各根据地的高级干部学习组，都进行了同样的学习和讨论。为了帮助干部理解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批判历次错误路线，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党中央专们编辑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部文件集。集中各个时期党的主要文件和领导人的主要言论，作为学习和批判材料。参加学习的同志，在认真读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联系革命斗争实践，分析我党二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通过学习，力求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懂弄通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分清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经过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反复学习，逐渐分清了是非，划清了界线，比较深入地认识了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实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了批判和斗争。

在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重要时刻，一九四四年四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深刻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对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毛主席指出，研究历史经验，**“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

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党的历史上的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要实行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原则，反对那种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的错误态度。关于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问题，毛主席指出，经过遵义会议以来多次的党内斗争，那种具备原来的错误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宗派已经不存在了，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克服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的问题。毛主席还强调指出：**“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要把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加以解除。在我党的历史上，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要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在毛主席提出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党史学习进一步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既基本上弄清了历史上路线斗争的是非，又联系历史环境进行分析，懂得了产生错误路线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有些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恰当的检查和自我批评，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因此能够心情舒畅地改正错误，继续革命。在学习过程中，党中央还就一些专门问题举行会议，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也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倾向

进行批判，使正确路线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毛主席亲自关怀下，举行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甘根据地的错误做了结论。一九四五年，举行华北工作座谈会，批判了彭德怀从抗日战争以来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清除他的影响。这些工作，对提高干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四月，进行了三年多的伟大的整风运动，到了胜利完成的时候。二十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总结整风运动的成果，对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正式作出了决议。全会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着重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全会系统地分析了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上的表现，正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全会总结整风运动的经验，并且指出，由于全党对历史上的路线是非有了一致的认识，党已经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起来了。全会强调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而“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只要全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就一定能使中国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

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

义教育运动。它使我们党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使党的广大干部比较自觉地掌握了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并且在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中，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从思想上和理论上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伟大的整风运动，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出席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庄严宏伟的杨家岭大礼堂中，大会主席台顶端的横联大书着“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前进”十一个字。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大会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二十三日，毛主席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二十四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这些重要文件，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我们党二十多年的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一条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

这条路线，是以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为领导核心，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的路线。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这是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这条路线，是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相对立的，是我党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斗争的发展。实行这一条路线，人民就能够充分发展革命形势，使抗日战争的胜利，真正成为人民的胜利。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人民力量，重点是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与巩固革命根据地。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根据这条政治路线，毛主席阐明了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规定了党在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不同的任务，不仅指明了打败侵略者的具体途径，而且规划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

为了贯彻这条路线，毛主席完整地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党的三大作风。我们党的斗争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就必须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向人民群众学习，使党的任务和群众的要求相适合。同时，必须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和侵蚀党的机体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毛主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论联合政府》）只有按照这三大作风工作，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

策，完成革命的任务。

大会热烈拥护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同意毛主席代表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党的政治路线。出席会议的代表，用历史的经验和切身的经历，多方面地、生动地称颂了毛主席领导的英明伟大，深入领会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大会发扬整风精神，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包括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作了实事求是自我批评。大会生动地表现了全党空前一致的团结。这种团结，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团结，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团结，是在广泛发展自我批评与党内民主基础上的团结。

朱德同志在大会上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根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党的政治路线，系统地论述了党的军事路线，阐明了党的军事方针和任务。抗日战争开始以来，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广大人民相结合，创造了解放区，发展了人民武装，经过七年多的斗争，已经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一支主要力量。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人民战争路线的伟大成果。报告阐述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军事路线。并且根据毛主席的政治报告，提出了今后党在解放区、沦陷区等三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号召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转变，迎接抗日战略反攻的到来。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

的指针。”这是我们党二十四年斗争经验的结晶，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大会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经过充分协商，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由代表大会进一步确立了，这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六月十一日，代表大会圆满闭幕。毛主席在闭幕词中指出，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深刻地表明这一次大会的历史意义。经过这次大会，全党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为夺取革命胜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毛主席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教育全党，要坚决和全国人民一道，努力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教育全党要正确认识复杂的国际形势，坚决克服反动的逆流。号召全体党员**下定决心，不怕牲牺，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和军事进攻的斗争】

抗日战争日益接近最后胜利时，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也越来越激化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八日，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了。这时，国民党召开了它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黑会，坚持独裁的反人民的“统一”，拒绝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且不顾人民的反对，再一次宣布要召开由它一方包办的新式猪仔“国民大会”，甚至准备以“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为借口，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是一个决心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反革命黑会。它表明蒋介石反动派顽固地要使战后中国依旧沉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

国民党反动派随即发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叫嚣。六月六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陈诚公然声明，国民党将用美国供给的租借武器来进行内战。这时，国民党用来进攻解放区的部队也急剧增加了。一九四四年七月，用以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共计六十多万人。到一九四五年，更增加到了将近一百万。全面内战的阴影，越来越深重地笼罩着中国的上空。

另一方面，蒋介石又玩弄伪装“和平”，承认“商谈”的政治欺骗一手。雅尔达会议之后，苏美之间为协调对日作战而继续进行着外交折冲。六月，美国正式把雅尔达协定的内容和美国的态度，通知蒋介石政府。蒋介石派行政院长宋子文到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同时，宣布在七月七日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这是一幕摆在大炮前面的反民主的闹剧，企图用来一面诱人民上钩，一面为内战准备打掩护。

我党坚决同这种反革命两手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用各种方式揭露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事实，另一方面，对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采取抵制的策略。六月十六日，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党对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拒不接受，又不经任何协商，自行召开国民参政会，这完全是反民主的。而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更是实行分裂和准备内战。因此，我党拒绝参加本届参政会。这个坚决抵制的策略步骤，粉碎了蒋介石企图经过参政会，拉拢中间派，逼迫我党接受所谓国民大会的阴谋。并且使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中更加陷于孤立。

在这一场斗争中，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评论，揭

露和斥责了美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政策。毛主席指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向美帝国主义提出了严正的警告，也向全国人民预告了美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的必然发展。

在赫尔利和蒋介石扮演双簧的整个期间，国民党军不断在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绥西解放区、山西的太岳区、华中的皖中区，都遭到攻击。豫西、湘鄂赣、苏浙等新解放区，更是不断受到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七月十五日，胡宗南从河南和陕西河防前线调集六个师到陕甘宁边区南线。二十一日，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爷台山阵地发动进攻，企图夺取关中分区，控制陕甘宁。到二十七日侵占了爷台山阵地和附近的四十一个村庄。我军在党中央领导下，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给予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八月八日夜，发起反击战，斩断了蒋军伸入解放区的魔爪，恢复了被侵占的土地，使胜利的红旗重新飘扬在爷台山上。

【解放区军民举行全面反攻。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解放区军民经过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局部反攻，取得了巨大胜利。歼灭了大量敌人，恢复了很多城镇，扩大了解放区，缩小了沦陷区，给我军举行战略反攻造成了坚实的基础。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近百万军队和二百二十余万民兵，经过整顿三风、生产运动、时事政策教育和长期的战争锻炼，政治思想觉悟大为提高，团结更加巩固，战斗力空前强大。全国性的民主运动日益高

涨。这一切，都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最后胜利，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解放区军民正在加速对日反攻的步伐，准备举行全面的反攻。正在这时，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在我军的配合下，对日军发动进攻。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来到了。

毛主席在八月九日发表重要文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庄严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材，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十日，延安总部发布了反攻命令，令各解放区的抗日武装部队，向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对敌伪发出通牒，限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抗拒，即坚决予以消灭。十一日，又连续发出六道命令，要求晋察冀、冀热辽、晋绥、山东解放区的部队在绥远、察哈尔、热河展开进攻并向东北三省进军。其他各军区部队向各线敌军展开猛烈反攻，占领交通要道及城镇，通令敌军无条件投降。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下，各解放区军民立即展开全面反攻。党、政、军、民进行紧急动员，将分散的部队迅速集中，发动广大群众与民兵参军参战，组成声势浩大的反攻大军。我军主力部队，在中央军委和各根据地党委的统一指挥下，向敌占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击。地方武装与民兵，开展军事、政治攻势，围攻该区的敌、伪城镇据点，配合外线作战。各路反攻大军，连夜出动，浩浩荡荡，向敌占区挺进。沿途群众敲锣打鼓、热烈地欢送人民

子弟兵。我反攻大军，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对敌伪发起全面进攻。

我各路大军旗开得胜，迅速解放了大片国土。冀热辽部队和其他兄弟部队，由北宁路和渤海湾自东北进军，会同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解放了东北广大地区。晋察冀部队向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北段进军，解放了察哈尔省，包围了北平、天津、保定。晋绥部队向同蒲路北段、平绥路西段进军，解放了绥远、山西两省的广大地区。晋冀鲁豫部队向平汉路中段、陇海路中段进军，解放了黄河沿岸广大地区。山东部队向津浦路中段和胶济路进军，解放了山东省绝大部分地区。华中部队向沪宁、沪杭甬、浙赣、淮南等铁路线和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进军，华南抗日纵队向广九、潮汕两路进军，也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各路反攻大军，在八月十一日到十月十日的两个月中，经过激烈的战斗，毙伤俘日伪军二十三万多人，收复城市一百九十七座和国土三十一万五千二百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八百余万。

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作战十二万五千次，消灭敌伪军一百七十多万人，建立了总人口一亿多的十九个解放区，主力部队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人民革命力量的猛烈发展，保证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本 章 小 结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八年的斗争中，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又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顶住了美帝国主义扶蒋反共的反民主逆流，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战胜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结果。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更加完整地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毛主席所揭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被全党所认识，全党比较自觉地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出现了由必然王

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在这个基础上，以“七大”为标志，实现了全党的大团结。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展，为以后革命的胜利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在八年抗战期间，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组织和武装人民，巩固和扩大人民军队，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经过上升、下降、再上升三个阶段，最后战胜了敌人。在这个伟大的革命战争中，发展壮大了人民的军队，为在全国范围内武装夺取政权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中国的两个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尖锐起来了。但是，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已经完全有能力克服反民主的逆流，掌握国家的命运，使之朝着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前进。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的前奏。

【注　释】

① 热河，当时的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

② 察哈尔，当时的省名，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③ 绥远，当时的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巴彦淖尔盟东部等地。

④ 老叛徒、大汉奸陈公博以后回忆说：那时蒋介石曾专门把他找到庐山上去，问他认识一些什么共产党人，陈说：“对新进如陈绍禹等，我只闻其名，未见其面。”

一九三八年一月，由邓小平同志接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群众》周刊创刊，次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创刊。

⑦ 周佛海：《回顾与前瞻》见《时代文选》第五十六期。

⑧ 王明：《苏联社会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⑨ 王明：《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一九三八年）

⑩ 《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是汪精卫和日本签订的卖国密约。其主要内容有：一、东北割让给日本，把蒙疆（指当时的绥远、察哈尔两省和山西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二、汪伪政权自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三、伪军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亦由日本供给。四、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五、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⑪ 执笔人陶希圣，随汉奸汪精卫投降敌人，一年之后，又在一九四〇年初杨队回到重庆，并即成）蒋介石的和思想代言人。

⑫ 《新华社记者评蒋介石在宪政协进会上的演讲》（一九四五年三月三日）

第四章　人民解放战争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第一节　党为反对美蒋反动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而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美蒋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全世界出现了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高潮。不仅原来在德、意、日法西斯统治下的国家和地区的革命人民已经起来为独立和民主而斗争，就连在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和剥削下的人民群众也纷纷起来为争取解放而斗争。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开始全面地动摇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地壮大了。时局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帝国主义并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在战前的六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德、意、日三国已经垮台，英、法两国也已在战争中被大大削弱，而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却因为在战争中做军火生意而发了横财，变成了一个霸王。尽管它外强中干，却自以为独占全球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为了篡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果实，它到处扶植反动势力，摧毁各国的民主运动，妄图全面恢复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建立金元帝国的全球统治，把二十世纪变成“美国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包括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都聚集在美帝国主义的周围，依靠它的支持，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因此，凡是美帝国主义的魔掌伸到的地方，那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落在什么人手里，就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民主和反民主，革命和反革命，在世界各地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作为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它在亚洲的侵略计划的中心，就是通过扶植蒋介石反动派来镇压中国革命人民，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当日本帝国主义刚一发出投降的请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就立刻提出“建议”，要求日本把在中国的全部武器都交给蒋介石政府，如果交给了“反抗国民政府的作战部队”，就要受到“惩罚”①。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决定取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位置，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支持它的走狗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加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长期躲在西南后方坐待胜利的蒋介石，决心按照“既定军事计划”，从峨眉山上猛扑下来，妄图从人民手中抢走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蒋介石按照赫尔利的意旨，发出了两道

命令：一道给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要求“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进攻日寇，不许接受日伪军投降和向敌人收缴枪械；一道给国民党的军队，要求“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两道完全相反的“命令”，彻底暴露了蒋介石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力，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的阴谋。

但是，当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西北的边远地区，尽管美国主子用全力代运，还是来不及马上调到敌占区去。美帝国主义眼见如果这时日军全部放下武器，“那末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于是，它决定“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由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杜鲁门恬不知耻地说，这“就是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② 同时，蒋介石也于八月十一日在给汉奸武装的“命令”中，把同敌伪合流的“军统”、“中统”特务和推行“曲线救国”的伪军，统统叫做“地下军”，要他们和日军一起，“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防止解放区人民军队“擅自行动”。南京傀儡政权的头目周佛海等，立即执行了这个“维持秩序”的任务，指挥伪军继续与人民为敌。从此，蒋军和伪军迅速合流，由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达五十余万人之多。

总之，在日本帝国主义倒台之后，美帝国主义已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收罗在它的卵翼之下，蒋介石也消除了他与国民党亲日派的某些分歧，使自己回到了原来的反革命总头子的位置上去，力图恢复他“统一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这就表明，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国人民

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阶段已经过去，而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已经变成主要矛盾了。毛主席在党的“七大”的开幕词中就曾英明地指出：**“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这时，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是更加尖锐地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为了指导全党迎接这一场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报告。报告分析了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方针和策略，使党能有清醒的头脑来对待复杂的局势，针锋相对地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

毛主席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当时的形势，深刻地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蒋介石这个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政治代表，反革命的本性决不会改变。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他靠第一次国共合作上了台，立即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他躲在峨眉山上，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阴谋借敌伪军之手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此计不成，又决定在抗战胜利之日，下山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毛主席告诫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蒋介石想重演

一次“四·一二”政变，发动反共内战，来消灭共产党。他口中的一切“建国”、“和平”之类好听的鬼话，都不过是用来掩盖这个阴谋的。

毛主席又强调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美帝国主义早已把独占中国看成是称霸亚洲的中心一环，当作它的世界侵略计划的重要部分。它的伪善和恐吓的反革命两手会变换使用，但它霸占中国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它必然要反对中国人民，必然要支持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毛主席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分析，指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也规定了新的历史时期中的斗争任务。**“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这种复杂的斗争，贯串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整个历史时期。

根据这种形势和任务，毛主席为全党规定了彻底革命的方针：**“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对于美蒋反动派，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决不能被温情脉脉的“和平经”所欺骗，也决不能被其势汹汹的战争威胁所吓倒。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所夺得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就是这个历史时期中毛主席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的精髓。

毛主席预见到这一场尖锐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及时地向全党指出：**“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还一再提醒全党，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不要象陈独秀那样，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

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毛主席还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这是毛主席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一贯思想。当时，各国反动派叫嚷“美苏必战”，同美帝国主义一起，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来威胁人民，要各国人民放弃革命斗争。有些人也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被这种反苏战争的叫嚣所吓倒，不敢和美帝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要坚持革命斗争，就更加需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强调自力更生，就既能坚持国内的革命斗争，保卫和发展人民的利益，又能支持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斗争，担负起国际主义的义务。因此，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也是国际主义的方针。

根据当时的形势，毛主席教导全党要做好两手准备，以便能够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内战是必然的，这是不以人民的愿望为转移的。但是，全面内战爆发的早迟，却要依形势的发展而定。蒋介石要立刻发动全面内战，在当时也还有许多困难。**“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

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在这个阶段中，既要准备对付全国性内战的迅速爆发，又要看到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的范围内。

【反对美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向美蒋反动派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八月十三日，毛主席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写了一个电报，坚决地拒绝了他八月十一日的伪令，严正地指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同时，毛主席又为新华社写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指出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独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亿以上的人民。没有这支抗日军队，就根本不会有抗战的胜利。所以，**“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评论呼吁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致起来，坚决制止美蒋反动派挑起的中国内战。

当时，党和人民面临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同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妄图利用这个形势，迫使人民向他投降。一面，在十四日假惺惺地来电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举行“和平谈判”；一面，又在十五日指使他的发言人在重庆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胡说什么拒绝蒋介石十一日的伪令就是“人民的公敌”，为发动大规模内战制造

反革命舆论。针对敌人的阴谋，毛主席在十六日为新华社写了《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的评论，指出所谓“人民公敌”，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自己。蒋介石的反动叫嚣表明，他已经向人民宣布了内战。评论号召全国人民，**“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予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

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再次致电蒋介石，揭露蒋介石发布伪令的目的，就是要国民党军队以收缴日寇枪械为借口，大举向解放区压迫，挑动内战。电报提出了按作战地区分别受降、制止内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政治主张，宣布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不能代表解放区和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人民武装，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接受被包围的日伪军的投降，并且声明我已下令日军统帅冈村宁次，命令他率部投降。电报庄严宣告：人民军队将**“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这样，就坚决顶住了蒋介石利用国际压力迫我屈服的企图。十五日，还曾正式照会美、英、苏三国驻华使节转致各国政府，就这些问题提出声明，严正地表明了中国人民的立场，警告美帝，不得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并唤起正在反对新战争威胁的世界人民的注意。

在这期间，我军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置蒋介石的伪令于不顾，在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向日伪军发起了大反攻。自八月十一日到二十六日的两周间，收复了大小城

市五十九座，包括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重要城市、港口、矿区和广大乡村，连同以前收复的地区，我方已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进入东北的我军收复了东北地区的广大国土，为在东北建立牢固的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党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斗争的巨大胜利。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

【重庆谈判的胜利。《关于重庆谈判》的发表】

美蒋反动派为了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进一步玩弄反革命的两面策略。八月二十日和二十三日，蒋介石又两次来电邀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蒋介石要求举行和平谈判，既是假的，又是迫不得已的。他的军队大多数远离解放区战场，要调集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足够兵力，需要有一段时间，马上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解放区军民力量强大和蒋管区人民反对内战运动的展开，也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在这种形势下，通过谈判使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是可能的，对我们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加强战备，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同时，蒋介石的阴谋是，如果我们不去谈，他就好借口共产党拒绝谈判，蒙蔽全国人民，把内

战责任推到我们党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去谈，才能拆穿敌人的阴谋，有利于教育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我们党清醒地看到，全面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准备打；但我们“不为天下先”，而只能“后发制人”。只有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美蒋反动派的本性，认识内战的不可避免，才能更好地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和它们作斗争，战而胜之。因此，党决定去进行和平谈判，通过斗争，揭穿敌人“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于是，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揭露了美蒋反动派挑动内战、破坏团结、反对民主的阴谋，提出了避免内战、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六项主张，表示愿与各方共同努力，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为了使全党对于新的斗争有充分的准备，二十六日，毛主席写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全面地分析了军事上的大好形势，说明了和平谈判的可能条件和我党准备作必要的让步，并为粉碎蒋军势必会发动的进攻作了部署。毛主席告诫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准备反击敌人的新进攻。**“有来犯者，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样，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经过周密的准备，二十六日，新华社正式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率领周恩来同志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二十七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乘

飞机来延安迎接。二十八日，毛主席不畏艰危，深入虎穴，大无畏地走上和美蒋反动派进行谈判斗争的战场，在万众欢腾声中到了重庆。这个行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破了美蒋反动派污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使全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美帝国主义者事后承认，这是“出乎意料”的。

蒋介石做了半个月的和谈姿态，但由于他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被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步骤，弄得忙乱不堪，对进行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毛主席到重庆的第二天，立即向国民党代表指出，从抗战以来，内战没有断过，说没有内战，那是欺骗。但是，中国共产党曾经一再表示愿意进行谈判，反对打内战。在重庆谈判中，我们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使蒋介石不敢反对，只好赞成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

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从来是以打的一手为主的。他在第三次电邀我党进行谈判的同一天，就指使何应钦命令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原地“负责作有效的防卫”，继续向我人民军队作战，甚至还要日军去“收复”被我解放了的地区。毛主席到重庆的次日，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他在一九三三年编印的《剿匪手本》，并继续向内战前线调运军队，妄想用军事压力迫我接受投降的条件。因此，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会场上的争论和战场上的斗争紧密地联系着，形成了又打又谈的局面。

正在和谈进行过程中，八月间，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奉命进攻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解放区。占领整个绥远解放区和察哈尔西部，并继续大举进犯，迫近张家口。九月十日，被我军击退，大批官兵被俘。九月初，山西军阀阎

锡山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日伪军配合下，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阎部抢占长治后，即被我军包围。战斗进行到十月初，蒋、阎增调部队从太原榆次向长治一带压过来，企图消灭上党地区的人民武装。这时，重庆谈判已进行了一个月，并就初步方案达成了协议，但蒋介石自以为军事上得计，趾高气扬，拒绝签字。我军神速调动，首先消灭了北路南侵之敌，接着又回师围歼了由长治西窜突围之敌。这一仗，敌军总计出动十三个师，三万八千人，被歼三万五千人，军师长多名被俘，上党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治被我解放。正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关于重庆谈判》）战场上的胜利，迫使蒋介石收敛了他的凶焰。十月十日，只得让他的代表在双方会谈纪要上签字。这就是“双十协定”。

在“双十协定”中，国民党方面被迫接受避免内战、实行政治民主化、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等项原则，并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关于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合法地位等问题，由于蒋介石坚持顽固的态度，结果没有达成协议。

十月十一日，毛主席胜利地回到了延安。十七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重要报告，及时地总结了这次谈判斗争的意义和经验。这次谈判所取得的收获，是和蒋介石的内战方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结果。毛主席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在一定的形势下，谈判是需要的，盲目地拒绝谈是“左”倾幼稚病；但是，谈判和军事上的斗争一样，必须是针锋相对

的。进行谈判并不是幻想依靠谈判来解决问题，写在纸上的东西并不就是现实的东西。我们欢迎这个协定，是因为这样一来，蒋介石如果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来粉碎他的进攻。

在这次谈判中，我党作了必要的让步，主动撤出了位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等八个根据地。这种让步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它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有利于争取群众，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也有利于集中兵力对付即将到来的严重的战争。但是，对于蒋介石在谈判中继续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做官”的阴谋，是决不能让步的。**“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关于重庆谈判》）

“双十协定”宣布了和平的方针，但是，就在十月份中，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正规军已达八十万人，还不包括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的部队。针对这种形势，毛主席规定我们党的斗争任务是，坚持双十协定，继续争取和平，但如果敌军敢于进犯，就坚决消灭它。**“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革命发展的总趋势，总规律。人民革命一定要胜利，这是任何

反动派也不能阻挡的。但是，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只有坚持斗争，克服困难，才能达到胜利。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战胜各种机会主义的锐利武器。它指引着革命的航船，沿着曲折的道路胜利前进。

【围绕着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　“双十协定”签订后，中国共产党按照协议，将江南部队撤往江北，向全国人民表明了自己的诚意。但是，美蒋反动派对解放区的进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早在九月三十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便在塘沽登陆，进驻天津、北平。十月十日，又在青岛等地登陆。美海军航空队也相继侵入北平和青岛。同时，美国加紧用飞机、军舰把蒋介石的六个军运往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济南等地，抢占大城市，扩大对解放区的进攻。十一月八日，美国驻华军总司令魏德迈公然威胁说，华北美军“可能向共产党军队前进”。在美帝的支持下，十月十三日，“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即对其部下发出了“剿匪”密令，要他们“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从重庆谈判期间以来，北自察绥战场，南到黄河北岸，对华北解放区的进攻一直在继续着。十一月间，又开始了向东北解放区的进攻。在这期间，蒋军还在广东用七个师进攻我华南纵队。在河南和湖北，动员了国民党三个战区所属的二十几个师的兵力，四面包围和侵入我豫西、豫中、鄂东、鄂中、鄂南各解放区。在浙东、苏南、皖中、皖南、湖南等地，也分别截击我北撤的军队。十月十七日，我军总部宣布，自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已侵占我解放区城市三十一座。十一月七日，毛主席在给党内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

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号召全党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

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我军给予了坚决的回击。九月中旬已在豫北发起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十月中旬在郑州、新乡一带集结了二十多万人，疯狂进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十月下旬，其中一支共三个军侵入河北南部的邯郸地区。我军奋起自卫，激战一周，结果，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及其所部一万多人，接受我军劝告举行起义，第三十、四十两个军也在溃逃中被围歼，放下了武器。总计，这次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七万余人。

十一月五日，毛主席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穿了国民党进攻的真相，发出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的战斗号召。（《国民党进攻的真象》）在我党的推动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内战斗争逐渐发展起来。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制止内战，实行民主。十一月十九日，重庆各界人民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二十五日，昆明学生六千余人举行反内战集会，遭到国民党军警的破坏。接着，全市三万余学生一致罢课。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军队和武装特务在昆明实行镇压，打死爱国学生三人和教员一人，打伤多人。酿成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进一步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当时，国际形势也不利于美蒋反动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遭到了各国人民的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也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为了摆脱困境，美国政府进一步玩

弄新的政治花招。十一月二十七日，赫尔利宣布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任命马歇尔为美国总统驻华特使，打着“调停中国内战”的幌子，欺骗国际国内的舆论，掩护战争的准备工作，再一次试图用软化的方法消灭中国革命力量。十二月七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伪善地表示要促进中国的团结和民主，实际上鼓吹蒋介石的政府“在发展民主政治方面提供了最令人满意的基础”。十二月十五日，在苏、英、美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前一天，杜鲁门发表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一方面重复说些赞成中国团结和民主的空话，一方面宣布只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个声明表面上主张改变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实际上妄想共产党交出军队，放弃政权。十二月二十日，马歇尔来到中国，开始演出他的**“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别了，司徒雷登》）

在马歇尔的导演下，蒋介石宣布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争取部署全面内战的时间。对于美蒋反动派的这一阴谋，我党早已洞悉。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就及时向全党指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但是，为了充分地揭露敌人，教育人民群众，争取和团结中间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蒋反动派，我们党仍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就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团结等问题同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

十六日，我党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由延安飞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我党代表团明确表示，停止国民党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先

决条件，并提出了立即无条件停战的建议。经过二十多天的谈判，同国民党政府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简称停战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由双方分别发布停战令，规定十三日开始生效。停战协定和停战令规定，国内的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一律停止。还决定由国共双方各派出一名代表同马歇尔一起组成三人小组，会商解决军事冲突问题的办法，并在北平设立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执行停战协定。

一月十三日十二时起，我军严格地执行了停战令。但是，蒋介石却毫无停止内战的诚意。在停战令发布的前三天即一月七日，他就下达密令："政治协商会日内开会，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点。已下令前进至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其星夜前进。"一月十三日停战令生效后，蒋介石又不断破坏停战协定，继续向解放区进攻。美国则继续帮助蒋介石运输军队到东北地区，向东北解放区扩大进攻。军事调处执行部及其派赴各地的执行小组中的美方代表，更千方百计地庇护蒋介石破坏停战令的罪行。**"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

在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左、中、右三种政治力量，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七人，国民党代表八人，民主同盟③（其中包括后来参加了蒋政权的民主社会党④）代表九人，中国青年党⑤代表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主要由国民党推荐，大多数是反动分子），进步力量只占少数。

会议的中心是军队和政权问题。蒋介石提出了所谓必先实行军队国家化，而后才能实行国家民主化的反动主张。中间派的代表有的对蒋介石关于民主化的许诺抱着幻想，有的则妄想国共双方共同交出军队而由他们代表“国家”加以接受。我们党坚决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主张的实质，指出这一阴谋的目的是要消灭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要实行军队国家化必先实行国家民主化的主张，要求首先必须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人民民主国家。同时，对于中间派的错误主张和幻想，也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我们党经过坚决的斗争，团结了中间势力，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孤立了蒋介石反动派。在人民的压力和内战部署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国民党被迫在表面上接受了一些人民的要求。会议达成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和平建国纲领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一月三十一日，会议宣告闭幕。

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这些协议，在不同的程度上是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反动派的。然而，不同的政治力量对于这些协议抱着完全不同的态度。美蒋反动派企图利用这些决议作为发动内战的掩护，欺骗我们党交出手中武器，“统一”到国民党的政府中去“做官”。资产阶级中间派则一方面反对内战，主张民主；一方面幻想在美国的帮助下同蒋介石一起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我们党和革命人民则以这些协议作为武器，进一步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反对内战、反对法西斯独裁的斗争。事实表明，政协的协议从达成的时候开始，就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的。它只不过是新的斗争的开始。

【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

美蒋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生死斗争，必然要在党内反映出来。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刘少奇，充当了美蒋反动派的代言人。早在八月二十八日，当毛主席动身去重庆时，刘少奇就向出发去东北工作的干部做了一个报告，对重庆谈判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他在估计世界形势时，胡说：“全世界的和平建设阶段来了，不打仗了，”“全世界是个和平民主团结的世界”；在分析国内形势时，又说什么“在全世界和平民主进步的潮流下，中国要单独打内战是很困难的”，“这次蒋介石是真正要商量几个问题”的。根据这种错误的估计，刘少奇提出了“我们为和平而斗争”的机会主义口号。

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后一天，刘少奇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作了一个所谓《时局问题的报告》，公然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主张放弃斗争，抛出了“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刘少奇鼓吹这种“新阶段”的特点，是“三个国家、三个政党、三种人民合作起来要使中国走上民主化”。所谓三个国家即指美、英、苏三国，三个政党即指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三种人民即指劳动人民、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刘少奇认为马歇尔是“执行三外长会议决议的代表”，是代表着三国对中国“实行干涉”的，“内战是他停止的”。这种“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实质，就是要中国完全屈服于美帝的干涉，要共产党投降国民党，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屈服于大资产阶级。刘少奇还宣称：“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他认为，实行政协决议，共产党就要把军队交出去，编成

“正式国军，成为国防军，成为地方保安队，成为自卫军。”一句话，就是要我们党把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交给蒋介石，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去“做官”，同美蒋反动派“合作建国”。为了实现这种改变，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开展反对所谓“左的关门主义”的斗争，采用适应“新的斗争形式”的“新的组织形式”，“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改组”。刘少奇的这条路线，是陈独秀、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实质上是要按照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党的面目改造党，根本改变党的性质。

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国际上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的呼应。白劳德主义出现之后，遭到美国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批判。一九四五年七月，他们在福斯特同志领导下展开了反对白劳德主义的斗争，并且重建了共产党。但是在国际上，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并没有真正得到清算。法共缴枪之后，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选举中获胜，多列士在十一月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成了四个国务部长之一，以后又当上了副总理。在意大利，陶里亚蒂在实行缴枪之后，在一九四五年底到一九四六年初召开了意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实行“结构改革”的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议会选举之后，也当上了内阁部长。他们的叛卖路线，使法意人民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胜利果实统统化为乌有。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路线就是在这种“缴枪”、“做官”的逆流正在欧洲横行时提出的，是东西修正主义的呼应。他的接受“三国”对中国“实行干涉”的路线，正是白劳德的各国在战后应为维护美、英、苏三国联盟而放弃斗争的路线，正是要在中国走多列士、陶里亚蒂之流所走的道路。

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还和当时国际上一种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有关。这种悲观估计错误地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要求世界人民放弃革命武装斗争。一九四六年四月，毛主席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针对这种观点深刻地指出，英、美、法同苏联之间或早或迟必将在若干问题上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但是，**“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

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笼之后，在各地局部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实际工作中的右的倾向有所抬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革命的主流。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英勇地顶住逆流，坚决不“缴枪”、不“做官”，“坚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并且努力清除修正主义造成的影响，引导中国革命朝着胜利的道路奋勇前进。同时，事实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也一天都没有出现过。就在政协会议期间，内战也从未停止。政协决议签订之后，蒋介石就立刻加以破坏。二月十日，重庆人民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公然捣乱会场，殴打民主人士和到会群众，制造了血腥的校场口事件。随后，在重庆、北平等地，又陆续发生国民党特务策动的反共暴行。三月一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公然在会上鼓吹要

“妥筹补救”，亦即修改政协决议，他的爪牙也跟着叫嚷“不能将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中国既没有和平，更没有民主，反而是全面内战的危险一天一天迫近。这种形势也促使一度出现的右的倾向迅速得到纠正。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不过是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一股机会主义逆流，刚一出现，就被革命的主流冲得粉碎。

【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在清除“和平民主新阶段”路线的影响中，东北根据地的斗争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日本宣布乞降之日起，我党就把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据地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上。只有发展东北，才能真正巩固华北和华中，为此，党中央除命令华北的冀热辽等解放区我军迅速向东北进军之外，并以陕甘宁边区等地组织大批干部、包括原准备赴南线工作的干部，在八月底由延安赶赴东北前线，加强工作。十月初，又调山东解放区我军主力渡过渤海，进军东北。这样，大批军队和干部迅速解放了东北各地，汇合坚持十四年游击战争的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了一支拥有三十余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那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任何军队；蒋介石赶忙派出一批“接收大员”，星夜飞往东北，收编土匪武装，在解放区后方进行骚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美帝派军舰三十一艘，帮助国民党远从越南运送两个军到秦皇岛，侵入我冀热辽解放区，十一日登陆完毕后，在杜聿明统率下大举向东北解放区进攻。从此，东北成了一个重要的内战战场。

我军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工作，一开始就受到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当时，由秦皇岛北进的蒋军只有两个军，力量并不强。党中央指示应乘敌立足未稳，集

中力量，予以大量歼灭。但是，当时窃据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职务的林彪，畏敌如虎，把东北的大好形势看成一团漆黑，把我进入东北的部队诬蔑为不能打仗的军队，消极避战，拒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结果，敌军在十一月十六日占领早在八月底便已由我军解放的山海关，接着，就在一直没有遭到严重抵抗的情况下于二十五日侵占锦州，进入辽西地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毛主席特别指明：**“国民党在东北没有深厚的有组织的基础，它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指示要求：**“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当时，正是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前夕，毛主席特别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但是，林彪拒不执行这些重要的指示，坐令敌军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旬又侵占了辽西大片地区。就在那时，停战协定在重庆签订。但是蒋介石在美国主子的支持下，却硬说东北不包括在内，并且向东北增加兵力，准备加强进攻，实行“关内小打，关外大打”，毫无“和平民主”的诚意。在美蒋反动派不顾一切地侵占我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下，林彪伙同当时窃据东北局书记职务的彭真，追随刘少奇，在东北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散布和平幻想和失败主义情绪，鼓吹要“使东北与全国一致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由于林彪不敢在东北组织有力的战

役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蒋介石一面指令东北蒋军继续向沈阳周围地区进攻，一面在国统区中组织特务流氓制造所谓“东北问题”，疯狂地煽动反共暴行，叫嚣要“铁血收复东北”。这些反共叫嚣，成了蒋介石完全撕毁政协决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总计划的重要部分。三月中旬，苏军撤出沈阳。杜聿明占领了沈阳及其附近地区。从此，蒋介石在沈阳建立了他在东北反共和扩大内战的中心。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也还是能给敌军以有力的打击的。毛主席曾多次指示林彪，要集中力量打好一两个胜仗。但是林彪被气势汹汹、外强中干的敌人所吓倒，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四月初，敌军开始进攻四平街。林彪指挥部队打了一个多月拚消耗的守城战，终于在五月二十一日撤出四平。接着又轻易地放弃了公主岭和长春，向松花江以北逃跑，致使蒋军得以深入我东北解放区，占领北起松花江南岸，南至营口、安东的铁路沿线地带。林彪在撤退中甚至还提出要“放弃哈尔滨”，准备“打游击”的荒谬主张。只是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多次严厉批评，并一再强调必须坚守哈尔滨、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之后，才刹住了他的退却逃跑，稳定了东北的军事形势。自此以后，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才得到了贯彻，东北局势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

【减租、生产和练兵运动的开展】　这时，蒋介石发动全面反共内战的准备工作正加紧进行，美帝国主义对蒋帮的支持也越来越加紧。三月十九日，早经杜鲁门原则批准，并已在马歇尔和魏德迈的主持下“暗中组织”起来的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正式成立，更加起劲地装备、训练国民党军队，策划和指挥他们向解放区进攻。六月十四日，

美国国务院提出并由国会通过了《军事援华法案》；接着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外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继续象共同对日作战时期那样用军事物资武装蒋军。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仅在“租借法案”等项目下提供的军事物资，就达总值十三亿三千万美元。到这时，在美国主子的全力支持下，蒋介石策划的全面内战，已经到了爆发的前夜。

不过，我们党也从来没有对蒋帮用和平外衣掩盖内战准备的阴谋放松过警惕。在进行谈判斗争的同时，一直没有放松保卫解放区的准备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等指示，为发展解放区和加强人民军队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当时，经过半年肃清敌伪的工作，解放区已经大大扩大了。到一九四六年一月，解放区的面积已达二百三十九万一千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计有城市五百零六座（约占全国城市的三分之一），人口一亿四千九百万（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新解放区的封建势力还没有受到严重打击，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整个解放区的经济也是比较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从一九四五年底开始的冬春两季中，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在老解放区，发动群众查租查息，切实保护农民应得的利益，提高了群众保卫解放区的觉悟。在广大的新解放区，首先进行反奸、清算等政治斗争，打击敌伪势力，

建立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然后发动大规模的减租减息斗争，减轻对农民的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使广大新区群众迅速提高了觉悟。

到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随着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山西、河北、山东、华中等地解放区的农民已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党中央对党内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减租减息的政策逐步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从此，解放区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逐步开展起来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把广大的农民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获得了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造成了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在巩固与发展根据地的同时，党还积极进行了军事上的准备工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利用作战间隙，**“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并大力改进部队的政治工作，使之能够更好地**“为团结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保证练兵、供给和作战任务的完成而奋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军力的发展，毛主席又及时提出了**“应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任务。

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也在深入发展。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谈判代表团，于五月初进驻南京、上海。代表团在“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情况下，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并以上海、北平等地为中心，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

以上这些准备工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为战胜美蒋反动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被粉碎。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开展。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

【全面内战的爆发。《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发表】　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蒋介石终于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手令中原蒋军二十五个旅（师）共二十一万人，向被围困在鄂豫边界宣化店地区的我中原解放军发起进攻，揭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七月，蒋军又在东起江苏南通、西到安徽来安之间八百里的广阔战线上，向我苏皖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犯。国民党军对南北其他各解放区的进攻，也先后开始。一场空前规模的全面内战爆发了。

美帝国主义眼见战争已经开始，即于八月十日由马歇尔和新上任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告“调解失败”，以便放手让蒋介石大打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占着暂时的优势。他们拥有四百三十万人的总兵力（其中正规陆军约二百万人），占据了有着三万万人口的全国大部分地区，控制了大城市。他们接收了一百万日本侵华军的全部装备，尤其

是有着美帝国主义的竭力支持。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三年半中，美国口口声声叫嚷支持中国抗战，也只不过为蒋介石装备了二十个美械师（这些军队从未被用来对日作战）。但是，在一九四六年的一至六月间，美国就为蒋军装备了二十五个师。此外，美国还为国民党训练了各种军事人员十五万人，用飞机、军舰把国民党的十四个军共四十一个师，和八个交通警察总队共五十四万人，运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为了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美国还把大批飞机、舰船、火箭炮、大炮、坦克、汽油以及其他战争物资送给蒋介石。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更加紧援助国民党。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国务院批准为国民党政府建立八又三分之一队的空军。七月十六日，美国国会通过“赠送”给国民党二百七十一艘舰艇的议案。八月三十一日，美国再以八亿多美元的剩余物资送给国民党。从此以后，军用物资，供应不绝。所以，这是一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别了，司徒雷登》）

全面内战开始时，蒋介石出动了全部正规陆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二百万人中的百分之八十的兵力，即一百九十三个旅（师）、约一百六十万人。其部署是：三十一个旅共二十七万二千人进攻苏北解放区；二十七个旅共十九万一千人进攻山东解放区；二十五个旅共二十一万七千人进攻中原解放区；二十八个旅共二十四万九千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十八个旅共十六万二千人进攻晋察冀解放区；十六个旅共十六万一千人进攻东北解放区；二十个旅共九万七千人进攻晋绥解放区；十九个旅共十五万五千人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九个旅共七万五千人进攻广东各游

击区及海南岛解放区。蒋介石以为这样一来，一下子就可以把解放军打得一蹶不振，狂叫要在三个月到六个月内解决问题。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究竟能不能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并且战胜他们呢？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主席为党中央写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为战胜蒋介石，毛主席为全党制定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正确的方针。同时，中国人民坚决为反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攻而展开武装斗争，是否会促使美帝发起反苏战争，以致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八月，毛主席在延安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谈话，答复了一部分人的疑虑，也进一步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主席在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英明地指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从表面上看，美帝国主义是个庞然大物，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也占有压倒的优势，但是，因为他们代表反动的一面，是纸老虎，革命人民决不要被他们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人民力量虽然暂时还比较弱小，还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是，因为我们代表进步的一面，一定能够战胜美蒋反动派的“飞机加坦克”。

毛主席在谈话中还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美帝

国主义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固然是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作舆论准备的，但这种宣传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当美国还没有压服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时，就谈不到向社会主义苏联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毛主席在这个重要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并指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扩张而坚决斗争，正是保卫世界和平、制止和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

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深刻地揭露了反动阶级的本质，批判了右倾悲观主义思潮，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战胜美蒋反动派的信心。

【粉碎蒋军全面进攻的斗争。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出现】　为了打败蒋介石的进攻，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了战胜优势敌人的根本方针。七月二十日，毛主席为党中央写的指示中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九月十六日，毛主席为中央军委写的指示中又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十月一日，毛主席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三个月总结》中，根据战争实践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作战方针。

集中兵力，各个歼敌，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军事斗争中的具体运用。在战略上，我们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又重视敌人。在一个一个具体斗争上，必须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善于同敌人进行斗争。毛主席制定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就是在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思想的体现。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军，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根据这个方针，我军每战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这样，就能使战略上暂时处于劣势的革命军队，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战役、战斗中处于绝对优势，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随着这些战役胜利的积累，就会在战略上总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采取这种作战方针，是以歼灭敌军有生量力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它可以使敌人背上包袱，而更有利于我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从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下旬，华东解放军苏北部队发扬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和连续战斗的作风，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苏中的泰兴、如皋、海安一带，同国民党进犯军连续打了七仗。我军七战七捷，歼灭了敌人七个半旅、五个交通警察大队，共计五万一千三百人，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八月中旬，晋冀鲁豫解放军为配合中原、华东解放军作战，向开封至徐州一线的敌人出击，歼敌一万六千余人。然后

又于九月上旬，在鲁西南菏泽、定陶、曹县一带歼敌一万七千余人。其它地区的解放军也开始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此期间，被围困在宣化店地区的中原我军，英勇地突破了蒋军二十多万人的重重包围，一部分胜利返回陕甘宁边区和转移到苏皖边区，另一部分则在陕南和鄂西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总计，在全面内战开始后的三个月中，我军虽然放弃了淮阴、菏泽、承德、集宁等几十个中小城市，却取得了全歼敌军二十五个旅的巨大胜利。

然而，美蒋反动派并没有因损失二十五个旅而惊醒，反而因暂时占领了若干城市被冲昏了头脑。十月十一日，蒋军侵占了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张家口后，当天下午，蒋介石便下令召开“国民大会”，企图通过制定“宪法”给自己的法西斯政权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我党当即指出，这是违反政协协议的，并且宣布拒绝参加伪国大，不承认将由它制定的伪宪法。各民主党派也予以抵制。只有一小撮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分子以及某些所谓“社会贤达”⑧，撕下了伪装，公开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十一月十五日，伪国民大会的丑剧在南京上演，并制定了伪宪法。这件事，使全国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的反民主、反和平的真面目。毛主席在当时就曾预言：**“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个预言。

为了坚持内战，蒋介石进一步用出卖国家主权的办法来换取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十一月四日，美蒋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十二月二十日，又签订了《中美空中运输协定》。根据这些条约和协定，美国侵略

者取得了在中国的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铁路交通和内河航行权、海关权、商业权、军权、财权、外交权，直至任意屠杀、奸淫、侮辱中国人民而不受任何惩罚的特权。这是蒋介石对国家主权的空前大拍卖，是中外关系史上罕见的奴隶契约。

蒋介石集团还在准备内战的过程中，大大发展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他们通过“接受”的形式，把用人民血汗建立起来的敌伪的各种金融机构、工业、商业以及其他财产窃为己有。据一九四六年五月的估计，四大家族占有了全国产业资本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和全国银行资本的三分之二以上。他们又利用发行纸币、公债，增加税收，加紧经济掠夺等办法，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使官僚资本发展到了高峰，更使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蒋介石为了进行内战，还恢复征兵征实，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农村变成人间地狱。

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冒险、政治上的反动和经济上的掠夺，造成了国民党统治的严重危机，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汹涌澎湃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因国民党反动派无故逮捕和杀害摊贩，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市民骚动。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发展成广泛的“抗暴运动”。自十二月底到一九四七年一月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五十多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高呼“美国佬滚回去”等口号，抗议美军暴行。这一斗争，迅速获得全国工人、教员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支持，一个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迅速地高涨起来。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继续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毛主席在《三个月总结》中指出：**“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并预计我军如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就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在毛主席**“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的号召下，各地解放军继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华东解放军：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旬，在宿迁以北歼敌三个整旅，共二万四千人。一九四七年一月，又在鲁南歼敌五个旅，约五万人。这时，国民党集中三十一万兵力，由南北两路向我发起进攻，企图同我军主力在沂蒙山区决战。我先在临沂歼敌两个师，然后挥戈北向，于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在鲁中莱芜地区一举歼敌七个旅，共六万余人，活捉敌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收复城市十三座。

晋冀鲁豫解放军：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豫北歼敌一万一千余人。一九四七年一月，在鲁西南歼敌一万六千余人。接着，又在豫东及皖西北歼敌九千人。

晋绥解放军及晋冀鲁豫太岳部队：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发动了晋西南战役，歼敌二万二千余人。

晋察冀解放军：一九四七年一月，在保定以南歼敌九千余人。

东北解放军：一九四七年一至三月，北满部队三次南渡松花江，在长春以北地区，歼敌一万五千余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辽南部队在临江、通化四次保卫战中，歼敌一万九千余人。从此，敌人被迫结束了在东北的进攻。

总计，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

二月之间，作战八十余次，共歼敌四十一万五千人，超过进犯敌军总数的四分之一。经过半年多战斗的结果，敌人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由开始时的一百九十三个旅增加到二百十九个旅，而第一线的兵力却由一九四六年十月最高点时的一百十七个旅下降到一九四七年二月的八十五个旅，从根本上转变了军事形势，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全国人民正在进一步动员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而奋斗。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伟大号召，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粉碎蒋军重点进攻的斗争。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条战线的出现】　蒋介石在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狗急跳墙，疯狂地进行垂死的挣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国民党先后通知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代表，要求立即撤回延安。三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宣布国共谈判已完全破裂，表示要坚持内战到底。但是，由于大量兵力被歼，丧失了全面进攻的能力，只能改变为重点进攻，把兵力集中于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蒋介石特别寄希望于陕北战场，幻想首先解决西北问题，迫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退出陕甘宁边区，然后再调动兵力进攻华北。

三月十三日，蒋军开始进犯陕甘宁边区。这时，我

西北人民解放军只有二万五千人，而蒋军却拥有胡宗南指挥下的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加上宁夏、青海、榆林等地的敌军，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兵力十倍于我。在胡宗南的十五个旅进犯延安时，我军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在延安以南歼敌五千余人后，于十九日主动撤出延安。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刘少奇被敌人的暂时优势吓破了胆，主张党中央东渡黄河，放弃陕甘宁边区，实行逃跑主义。三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举行紧急会议。毛主席在会上驳斥了刘少奇的错误主张，指出蒋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它的危机已经异常深刻化。毛主席决定亲自率领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坚持在边区，利用这里地形险要、群众基础好、回旋地区大的有利条件，保卫陕甘宁解放区，推动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

在优势敌人面前，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亲自指挥部队，运用“蘑菇战术”，牵着胡宗南十几万人的鼻子跑。我军撤出延安后，以部分兵力将敌人五个旅诱至安塞，主力埋伏在青化砭，待机歼敌。二十五日，敌整编三十一旅进入我伏击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将敌军上至旅长，下至马夫，共二千九百多人全部歼灭。胡宗南发觉我主力在青化砭后，急忙将其主力从安塞掉头东进，向我扑来。我军以小部兵力与敌周旋，主力则隐蔽待机。结果，胡宗南化了十二天时间，走了四百余里，一无所获。四月十四日，我军又在瓦窑堡南的羊马河歼敌一个旅。以后，胡宗南以为我主力已转至绥德地区，即以其精锐部队第一六七旅据守战略补给站蟠龙，而以九个旅主力向绥德急进。我将计就计，以部分兵力将敌主力引至绥德，却集

中四倍于敌的兵力包围蟠龙，经过两天两夜的攻坚战，于五月四日打进蟠龙，歼灭守敌一个旅，共六千七百多人，并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正当胡宗南进退维谷之际，我军在五月三十日至七月上旬，主动出击，收复了大片地区。八月，我军围攻榆林，调动胡宗南的主力来援。十八至二十日，在陕北米脂县沙家店地区歼灭了敌整编三十六师及其所属两个旅，粉碎了敌军企图夹击消灭我军的阴谋。从此，陕北的军事形势完全改观，蒋军的重点进攻被彻底粉碎，出现了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敌军由进攻转为防御的根本变化。

在敌人重点进攻的另一个战场山东，我军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四月上旬，敌人集中三个兵团，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五千人，进犯鲁中地区。我军主力转向敌人侧后，伺机而动。下旬，我西线部队围攻泰安，首战大捷，歼灭敌七十二师的三个旅，共二万四千余人。各路部队乘胜出击，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即被打退。五月，敌再次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北犯我解放区，企图压我主力至胶东狭窄地区决战。我军主力则实行中央突破，在蒙阴东南之孟良崮地区，包围敌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于十六日全歼该师三万二千余人，敌师长张灵甫当场被击毙，敌军全线溃退。六月下旬，敌又以“密集平推”战术，向沂蒙山区进攻。我主力向敌人后方出击，占领了大片地区。七月中，敌军被迫分路撤退。至此，国民党在山东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了。

与此同时，我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各解放区，也向进犯的敌军发动了局部反攻。

我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人民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一年

的内线作战，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非正规军三十四万人，总计一百十二万人。国民党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降为三百七十三万人，正规军由二百万人降为一百五十万人，整个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只剩下四十个旅了。而且，敌人后方异常空虚，从新疆到台湾十三个省的漫长战线上，只有二十一个旅任守备。由于师出无名，屡战屡败，敌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整个国民党反动营垒充满了失败情绪。

在解放区战场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人民举行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五月四日，上海举行了反内战的示威。接着，上海八千工人和学生包围了国民党警察局。这场群众斗争迅速扩展到南京、北平、杭州、沈阳、青岛、开封等城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响彻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十分害怕，使出了全部法西斯手段，进行野蛮的镇压。五月十八日，蒋介石公布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大动杀机。五月二十日，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学生，在南京高呼“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向伪行政院示威。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警进行血腥屠杀，殴伤和逮捕示威学生。同一天，在天津等地也发生了殴伤和逮捕学生的事件。这就是“五·二〇血案”。但是，已经炽燃起来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的斗争，遍及了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

五月三十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重要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

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综观作为转折点的军事战线和新形成的第二条战线，展示了战争第一年的大好形势。同人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了。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开展】　正当人民解放战争在前线胜利发展的时刻，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根据“五四指示”，要求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自己解决土地问题。在土改中，还必须注意不侵犯中农的利益，使中农参加到运动中来，保证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站在我党一边。到一九四七年初，各解放区约有三分之二地方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四六年，各解放区农业生产普遍获得了丰收。为了保卫土地和丰收果实，各地农民踊跃参军。到一九四六年十月，解放区有三十万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三、四百万人参加了民兵和游击队。

在土地改革进行过程中，党内曾出现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去努力满足贫苦农民土地要求的右的倾向。同时，在斗争中暴露了有些农村基层组织严重不纯和作风不正的情况。某些地主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混进了党内，把

持了一些基层组织，歪曲党的政策，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进行。毛主席及时地领导全党克服了这种不良倾向。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春，当战争正在紧张进行时，毛主席一再提醒各级领导：**“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三个月总结》）针对土地改革中的不彻底现象，强调必须进行认真的检查，**“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六月，晋绥解放区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彻底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严重状况，批判了右的倾向，制定了认真进行土改和整党运动的正确方针。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保证了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勤务的顺利完成。这是各解放区克服右倾错误的一个例证。

一九四七年九月，党中央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全面讨论了土改和整党运动的问题。九月十三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人口平分土地，地主富农应得的土地不能超过农民群众，并废除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的高利贷债务。这个大纲，既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方针，又对“五四指示”中地主可以得到比农民较多的土地财产，富农的土地财产原则上不动的规定作了明确的改正，这是完全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全国土地会议还讨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正的问题，规定了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整编党的队伍的步骤和方法。《中国土地法大纲》还规定，保障农民及其代表在会议上批评、弹劾、撤换及选举政府

和农民团体的各级干部的权利。

《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后，经党中央的批准，在十月十日公布。这个文件的公开发表，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农民群众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热情。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克服右的倾向以后，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　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正规军达到一百万人以上，装备也由于大量的缴获而有了显著改善。这时，我军总兵力虽仍少于敌军，但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发展壮大了民兵，后方日益巩固，不须分兵守备，因而我军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却多于敌人。毛主席和党中央根据这一情况，决定从战争进入第二年后，即实行由防御到进攻的战略转变，以彻底粉碎蒋介石继续把战争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迅速扩大革命的规模和影响，从根本上撼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主席规定了人民解放战争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我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作战。在七月份一个月中，歼灭敌军五万六千余人。八月中旬，又越过陇海路，千里跃进，长驱南下。下旬，到达大别山地区，直迫长江沿岸，揭开了战略大反攻的序幕。八

月二十三日，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兵团，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深入豫陕边境。华东人民解放军也在八月跳到外线，经过鲁西南，越过陇海路，南进到豫皖苏大平原。三路大军在南线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互相支援，纵横驰骋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向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这个行动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战略部署。蒋军在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的九十个旅被我牵制住，因而不得不放弃把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野心，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我三路大军贯彻毛主席**“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和**“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的指示，充分发动群众，大规模歼灭敌人，建立了北起陇海路，南抵大江边，东自大别山以东巢潮至徐州一线，西至汉水以西沙市至安康一线，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它象一把利剑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到敌人的战略要地武汉、洛阳、郑州、开封、徐州、蚌埠等地区，从而改变了全国战场的形势。

在南征大军向外线进攻的同时，留在内线的各路部队也展开了新的攻势。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战役之后转入了反攻。华东解放军山东兵团，九月在胶东地区发起攻势，逐渐改变了山东的局势。晋察冀解放军，九月在平汉路北段发起了攻势作战。东北解放军，也于九月起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和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发动进攻。所有以上外线的和内线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在人民解放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时，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专政。七月四

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戡乱动员令”，宣布实行所谓“戡乱”，即加强反革命内战和对革命人民进行残酷的法西斯镇压。它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一切反对美蒋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并捞取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加强反革命战争。但是，结果却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这个“动员戡乱”的伪令又一次从反面教育了广大群众，使蒋介石集团在人民中间完全孤立了。

随着战略大反攻的开始和蒋介石集团在人民中的孤立，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主席亲自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庄严号召，明确地指出人民解放战争的目的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这个宣言宣布了党的八项基本政策，保证了党的任务的完成。从这时起，武装夺取政权、实现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已直接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

第四节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党中央十二月会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除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和晋绥两解放区的负责干部参加。毛主席在会上作

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这一报告总结了我党从抗日战争胜利以来的斗争经验，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行动纲领，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毛主席在报告中首先全面分析了形势，指出美蒋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战争已经注定要彻底失败，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就要见分晓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百折不回，现在已经胜利在望了。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大事，而且也是世界革命历史上的大事。毛主席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形势时指出：**“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象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美帝国主义以世界霸主自居，骄横不可一世，其实却是外强中干，虚有其表。美帝奴役世界的计划，不但必须打败，而且也是完全可以打败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已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毛主席针对当时流行的对于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深刻地指出：**“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会议在讨论和通过毛主席的报告的同时，还讨论和通过了毛主席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这个重要文件，用彻底革命的思想武装了全

党，批判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修正主义路线，提出了正确处理国际斗争与国内斗争的关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毛主席在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以来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二）先取小中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四）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五）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八）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敌人有中等程度守备的，相机夺取之，敌人守备强固的，等条件成熟时再夺取之。（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十）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这十大军事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军作战方针的科学概括，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战争的典范。它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是任何反动阶级的军队都不可能运用的。

毛主席在报告中还强调了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的重要性，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而整党运动则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毛主席充分肯定了全国土地会议的正确方

针和原则，同时指出了纠正土改和整党运动中的错误倾向的方针。

毛主席在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又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份；（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政治纲领，必须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不仅对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对以后新中国的建设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粉碎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的斗争】 正当我们党在纠正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右的错误倾向的时候，刘少奇却逐步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在蒋军侵占延安后，一九四七年四月，为着工作上的便利，党中央决

定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渡河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在经过晋绥解放区时，刘少奇便散布形“左”实右的言论，种下这个地区以后出现形“左”实右的错误的根子。九月，刘少奇在主持党的全国土地会议期间，乘着党反对土改、整党中的右倾的机会，提出了一整套侵犯中农、破坏民族工商业、乱打乱杀、打击基层干部等做法，形成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种情况如果不迅速加以制止，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可能遭到破坏。在十二月会议上，毛主席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批评。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主席根据会议的讨论，写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并在一九四八年的上半年又陆续起草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等一系列文件，从各方面清算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刘少奇这条错误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歪曲平分土地的原则。他鼓吹不分阶级一律“打乱平分”，并把这说成是“土地改革的最彻底办法”⑦。在这种错误影响之下，各解放区都出现了把中农错划到地主富农圈子里去的扩大打击面的现象。晋绥地区兴县蔡家崖行政村五百多户人家中，有五十多户错划到阶级敌人的阵营中去了。这样，尽管口头上也说要团结中农，实际上却是侵犯了相当一部分中农的利益。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现象，强调指出：**“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为此，党中央重新公布了毛主席在一九三三年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和同时期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党内文件，在各地

农村中重新评定阶级，并规定在农会委员会和乡、区政府中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这些措施，及时纠正了刘少奇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

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的另一个表现是破坏民族工商业。刘少奇提出对兼营工商业的地主的“商店要让农民搞他个乾乾净净；工厂，农民不需要就归公。”他把地主富农在减租减息时期中投资于工商业说成是“化形”，规定要“搞垮它”。这种错误政策，混淆了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界限，使解放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混乱。毛主席在《关于工商业政策》、《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消灭的对象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审慎的、原则上一律保护的政策。毛主席还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件中，纠正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左”的倾向，指出必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孤立其少数，对于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开明绅士，应该在反对美蒋、赞成民主（不反共）、拥护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对他们采取团结和教育改造的政策。

刘少奇的错误路线还表现在整党运动中。刘少奇叫嚷“党内的封建最多”，“斗干部就是斗地主”，“群众吊、打干部是正义的”。⑧他推行了一套“搬石头”，搞“扎根串连”的做法，打击了一大片干部。毛主席及时地纠正了这种错误，根据群众创造的经验，指出整党中要邀集党外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借以改变党组织的成份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

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也给群众运动带来了损失。刘少奇不区分不同情况，鼓吹“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造成了工作中的混乱。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写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等重要指示，教育全党要分别不同情况，有步骤地、有区别地展开各种斗争。毛主席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此外，刘少奇还在镇压反革命中提倡乱打乱杀、滥施肉刑的错误做法，在政权建设上提倡“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关门主义口号，在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提倡“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尾巴主义。对这些错误倾向，毛主席都进行了批判和纠正。

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所造成的错误很快就纠正过来了。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写了《关于情况的通报》，对全国工作作了部署。随后，毛主席和党中央离开了陕北。四月一日，途经晋绥解放区时，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土改整党等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五月，毛主席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从此，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止，这里成为中

共中央所在地。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对继续进行土改和整党运动作了周密的部署。

到一九四八年九月，全国已有一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整个解放区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巨大变化。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被彻底埋葬了，混进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村基层政权的坏人被清理了出来，千千万万的农民群众翻了身，形成了以贫雇农为主的领导骨干，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成千上万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土改后的农村面目焕然一新。

经过这一场反对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斗争，全党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认识得更深刻、更全面了。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这条总路线、总政策作了科学的概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还指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场斗争进一步教育了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指出：**"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

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同时，毛主席又强调指出，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关于情况的通报》）如果当时我们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而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毛主席还总结了反错误倾向斗争的经验，指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经常同时存在，但在一定时期中只有一种主要倾向。从“五四指示”发表以来，主要的危险倾向是右。以后，刘少奇乘机抛出了形“左”实右的路线，使“左”倾错误成为主要的危险倾向。只有找出各个时期的主要错误倾向，加以克服，革命才能前进。

【人民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对国民党军全线大规模进攻的开始】　在进行伟大的土改整党运动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进行了冬季整训。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紧密结合农村的阶级斗争，放手发动全体指战员，在全军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方法，从政治上整训部队，清除了少数混进军内的坏人，实行了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通过新式的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加强了全军政治上的团结。部队万众一心，大

家想办法，出力量，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一九四八年五月，在解放今属河北省的隆化县时，战士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事迹，就说明了我军素质的提高。新式整军运动，又推动了群众性的大练兵运动的开展。毛主席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总结了这个经验，肯定了成绩，指出：**“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在进行土改整党整军运动的过程中，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一系列加强纪律性的重要指示。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由毛主席起草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要求全军**“深入教育，严格执行。”**一九四八年一月，毛主席为党中央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地中央代表机关、野战军和军区必须定期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写政策性的报告，纠正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现象。五月，毛主席指示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干部，认真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并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和《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反复强调了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大权集中于中央的重要性。从此，**“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成了全党全军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准则，对于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经过新式整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空前提高，在全国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在“全面防御”体系被摧毁后，从一九四八年一月起实行所谓“分区防御”的“新战略”，尤其注意加强中原地区的防守力

量，妄图阻止我军向南发展。二月二十四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开始围攻宜川。国民党胡宗南部第二十九军来援，于二十九日进入我军伏击地带。三月一日，我军发起总攻，迅速全歼敌军两个师，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当场被击毙。三月三日，我军攻克宜川，又歼敌一个旅。这一战役共歼敌三万人，创造了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迫使敌军于四月二十一日放弃延安南逃。在中原战场上，我人民解放军三支大军先后解放了战略要地洛阳、开封，在睢杞战役中一举歼敌一个兵团，共五万余人。七月，又全歼襄樊守敌二万余人。于是，敌人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就被摧毁了。在东北战场上，我军经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的冬季作战，歼灭敌军十五万人，解放了敌人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四平街，使敌军困守在长春、沈阳等少数孤城和铁路战线上，为解放东北全境准备了条件。在山东战场上，我军经过三月至七月的作战，解放了津浦和胶济铁路线的战略要点，把敌军围困在济南、青岛等地。在华北战场上，我军迫使敌军退守张家口、太原、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在我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的强大攻势下，敌军的“分区防御”被彻底粉碎了。八月初，国民党南京军事会议又决定实行“重点防御”，以图苟延残喘，但事实上已经组织不起任何防御体系了。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极大地鼓舞着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以来，上海工人阶级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反复进行了反迫害斗争，到一九四八年初发展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各地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也此伏彼起，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武汉、昆明等地，到处发

生罢课和示威游行。一九四八年五月以后，又掀起了各界人民的反美扶日运动，同美帝国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既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后方又不断受到人民民主运动的冲击，政治经济危机步步加深，反动统治更加摇摇欲坠了。

【辽沈战役和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到一九四八年六月，我人民解放军的总数已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部队的政治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并以缴获的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工兵和炮兵，提高了攻坚能力，积累了阵地战、攻坚战的经验。后方也由于土改整党运动的胜利开展而更加巩固，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热情更加高涨。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的总数却下降至三百六十万人，后方十分空虚。军事形势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歼灭国民党军队主力的时机的到来。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打破军事作战的常规，当我总兵力尚处于少数时，就毅然决定发起和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与敌军展开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并选择辽沈地区作为战略决战的初战战场。

东北战场，自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刹住了林彪的退却逃跑，又经过当年冬和次年春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以后，解放区巩固起来了。这里经济上已经居于全国五大解放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原）的首位，军力上也已占第二位，同时敌军孤悬关外，只靠北宁路沿线一条狭长地带和关内联系，只要切断这个细长的瓶颈，包围歼灭这一支敌人，形势十分有利。因此，毛主席还在准备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时候，就以全国反攻的大局着眼，于一九四七年五月指示林彪，要他在今冬明春两季向热

河、冀东行动一个时期，以便建立强大的冀热辽根据地，准备在适当时间切断北宁路，封闭东北蒋军逃路、实行“关门打狗”，加以包围歼灭。十月，在关内战略反攻已经开始，中原我军作战极为紧张的时候，毛主席再次电告林彪，关内蒋军很难抽调支援东北，要他在适当的时候将主力转到北宁、平绥两线作战。但所有这些指示，林彪都拒不实行，借口锦州方向无仗可打，拒绝南下作战。

一九四八年二月，毛主席又致电林彪，预言了东北敌军南撤的可能性，督促他南下作战、准备阻止敌军南撤。但林彪依然拒不实行，并在四月至七月之间，一直主张以主力包围长春，实行围城打援。甚至就连这样一个保守的计划也不敢实行，长期在长春外围徘徊不进。和南线我军在敌军占优势的情况下毅然执行战略反攻计划，深入敌占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打开局面的战果对照起来，清楚地表明了林彪军事路线的右倾保守的实质。

这时，东北我军已发展，部队装备较好，数量上也迅速增长。到战略决战开始前，我军已有主力军七十万人、地方军三十万人，成了各大解放区中我军在数量上也占优势的唯一的地区。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只有正规军四十八万余人，分别困守长春、沈阳和北宁线上，并正准备决策南撤，以便集中主力保住华中华北，妄图争取时间卷土重来。这虽然并不可能挽救敌人败亡的命运，但如果任其实现，却不免要延长夺取全国胜利的时间。因此，把战略决战的首战放在辽沈地区，不仅在敌我军力对比上可以必操胜算，而且这一战的胜利，既可以粉碎东北敌军向关内实行战略收缩的企图，又可以使东北我军转入关内作战，加速歼灭关内敌军主力。因此，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战略决

策，是关系到整了战略决战是否能迅速取得全胜的关键一役。

按照毛主席的战役计划，辽沈之战的中心一环是集中我军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特别是迅速攻克锦州，封闭敌军逃回关内的退路，同时调动长春、沈阳之敌来援，造成全歼卫立煌部的有利形势。但林彪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从战役的准备到进行一直和这个计划唱反调。从七月被迫同意南下作战之后，林彪一直迟迟不动，时而无理地要求华北我军配合，时而借口粮食缺乏，拒不执行命令。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多次严厉批评了他。九月七日，毛主席再一次电令东北解放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首先使主力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特别是攻占锦州，并吸引长、沈之敌来援，便利我军在运动中消灭它。毛主席还特别针对林彪的右倾，要他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这样，林彪才不得不部署部队自长春地区南下。九月十二日，先头部队到达北宁线附近，会同原在南面的部队开始包围绥中、兴城、义县等地的敌军。

辽沈战役的序幕揭开后，林彪依然留在后方，继续对抗毛主席关于坚决打下锦州、全歼范汉杰集团的作战方针，致使我军出动了二十多天还在锦州外围徘徊。九月下旬，他准备放弃攻锦，先打山海关，经毛主席严令制止。十月初，蒋介石调兵由葫芦岛北援，林彪慌了手脚，又在这重要关头请求全军北返打长春。三日，毛主席两次严厉批评了林彪。四日，林彪才不得不执行攻锦的命令，并把指挥机关移到阜新。这时，锦西敌十一个师北援，被我阻击于塔山；沈阳敌军主力廖耀湘兵团进占彰武地区，摆出

援锦的姿态，我军抓紧中心一环，全力攻锦。十四日发起总攻，经过三十一小时的缴战，全歼守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以下十万余人，解放锦州，切断北宁线。十九日，困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以下九万余人，除一部分起义外，其余被迫投降，长春宣告解放。

这时，廖耀湘兵团和锦西之敌，企图南北夹击，重占锦州，打通北宁线，夺路南逃，同时，又征集船只，准备从营口逃向关内。为此，毛主席在部署辽西歼灭战的同时，七次急电林彪，要他以足够的兵力控制营口，封死敌军南逃的最后一条通路。十月二十六日，我军将廖耀湘兵团包围于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于二十八日全部歼灭该敌，俘敌兵团司令廖耀湘以下十余万人。接着，又乘胜猛追，于十一月二日解放沈阳，歼灭敌“东北剿总司令部”及所属周福成兵团；同日，解放了营口，结束了整个战役。由于林彪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控制营口的电令，致使敌五十二军军部、一个师部、三个团得以乘船从海上脱逃。

辽沈战役的胜利，是伟大战略决战的第一个大胜利。战役自始至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战胜林彪右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胜利。整个战役总计歼敌三十三个正规师、十三个非正规师，共四十七万二千人。从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完成了整个战略决战计划的第一步。

【伟大战略决战的全胜】　辽沈战役结束后战略决战在华北、华东地区继续展开。还在辽沈战役刚开始进行时，从九月十六日开始，华东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战场向济

南之敌发起进攻。二十四日，济南市全部解放，歼敌十余万人，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接着，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就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部署了歼灭长江以北华东敌军主力刘峙集团的大会战。

经过辽沈战役，敌我军力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敌军总兵力降为二百余万人，我军则增至三百万人；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的劣势终于转化为优势。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定，把原各大战略区的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类，以便组成强有力的野战军，适应夺取全国胜利、将主力调赴全国作战的需要。野战军部队按其所在地区，分别组成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等野战军。不久，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的三个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十一月六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发动了淮海战役。在济南战役后，华东地区的敌军收缩了据点，集中兵力于徐州及徐州东西陇海路一线，企图阻止我大军南下。七日，我华东野战军分三路南进，首先向徐州以东地区之敌黄伯韬兵团发起进攻。敌军企图西逃，被我包围于碾庄地区，二十二日全歼该敌，击毙兵团司令黄伯韬。这一战胜利地完成了中间突破，切断了敌人的海上退路，形成了包围徐州、兵临淮海之势。敌人为了救援黄伯韬兵团、急忙把黄维兵团从豫南调徐州。我中原解放军从十一月十八日开始，在蒙城地区逐段进行阻击。二十五日，将该敌围困在宿县西南之双堆集地区。十二月一日，国民党

“徐州剿总”除总司令刘峙已先逃往南京之外，副总司令杜聿明弃守徐州，带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向河南永城方向逃跑。我华东野战军跟踪追击，四日将敌包围于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孙元良兵团妄想突围，结果于六日夜间被我全歼。接着，又在十五日全歼了黄维兵团，俘敌兵团司令，结束了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

这时，战争全局的关键在于华北战场。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的六十多万敌军，龟缩在由张家口到北平、天津、塘沽一线。辽沈之敌复没后华北之敌，变成惊弓之鸟，准备由塘沽从海上南逃或西窜绥远。毛主席为此一面令华北两个兵团集中主力于平绥线上，把敌人包围在张家口和新保安一带，切断敌军西窜之路。同时，辽沈战役一结束，又电令林彪，指挥东北我军主力早日入关。要他以最快速度挥戈南下，包围唐山，天津、塘沽之敌，使之无从入海南逃，再于休整后发起攻击。毛主席还特别指示林彪，不要走山海关，要从热河冀东隐蔽行军，以便秘密地完成战略部署。

但是，林彪又一次对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先是以种种借口拖延时机，迟迟不动；继则指挥三个军经山海关南下，暴露军机；最后又顽固地要求先打南口，妄图使敌军主力从海路南逃。毛主席一再批评和制止了林彪的右倾错误。十二月十一日，毛主席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战役第一阶段应首先包围津、沽、唐，与向张家口、新保安急进的华北我军，一道完成对平津、张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实行**“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为了使敌军不致决策南逃，又命令南线我军在歼灭黄维兵团之

后，留下已被包围的杜聿明部，在两个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

按照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我军迅速完成了全面部署，展开攻势。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我军攻克新保安，歼敌一个军部和两个师。二十四日，解放张家口，全歼守敌七个师五万四千余人。华北敌军的两翼基本上消灭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华东和中原我军发起了对杜聿明部的总攻击，十日全歼敌军二十万人，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结束了伟大的淮海战役。这一战役，共歼敌五十五万余人。接着，一月十四日，平津前线我军对天津发动总攻，激战二十九小时，解放了这个重兵设防的大城市，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活捉敌指挥官陈长捷。至此，北平守敌二十余万人在我军严密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由于我们党以正确的政策努力争取，傅作义在大势所趋之下率领这支敌军接受和平改编。三十一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伟大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在这一战役中，除塘沽守敌五万余人由海上逃跑外，我军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人，使华北地区基本上获得了解放。伟大的战略决战全面地胜利完成了。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歼灭了蒋军一百五十万人以上，战争规模之大，胜利之彻底，是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的。在此期间，我军还先后解放了郑州、南阳、合肥等战略要地，长江以北的华东地区和中原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雄师南下，兵临长江，南京已经在我大军的威胁之下。而且，蒋军主力丧失殆尽，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只剩下一百一十万左右的作战部队。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成为定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思

想和军事路线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解放区人民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各个战场上除了大批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外，广大的民兵和群众也都动员起来，积极支援前线。在辽沈战役中，参加作战的地方武装有三十多万人，随军活动的民工有九万六千多人。在淮海战役中，有四十余万地方武装配合作战，二百多万民工执行各种战勤任务。在平津战役中，有十五万东北民工随军南下，三十万华北民兵和民工直接在前线服务。已解放了的城乡劳动人民，积极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加紧进行军工生产，保证了我军的供应。千百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和支援战争，终于使敌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法逃脱灭顶之灾。

第五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粉碎美蒋新的“和平攻势”的斗争】　美蒋反动派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后，企图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借以欺骗人民群众，争取喘息时间，维持反动统治。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在美帝的导演下，国民党反动派演出了一出“行宪国大”的丑剧，蒋介石当上了伪总统，桂系军阀李宗仁被选为伪副总统。美帝的这一以李代蒋趋势的动向，使中间党派的某些右翼分子产生了幻想。早已破产了的“中间路线”，又开始活动起来。民主同盟中的右派、农工民主党负责人章伯钧，妄想在南方拉拢一批

军阀，搞“三分天下”。民盟右派罗隆基则在南京出入于司徒雷登门下，希望得到美帝国主义的垂青。到了一九四八年底，蒋军在淮海、平津两大战场上正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前途。这时，蒋介石政权必然败亡的趋势，连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一些人也不再怀疑了。他们更迫不及待地直接策动和平攻势，妄图挽救其垂亡的命运。十二月二十五日，桂系军阀白崇禧操纵下的湖北省参议会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和谈”，以制止革命战争的发展。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一九四九年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尖锐地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毛主席针对那些打着民主自由招牌的右派人物的活动，向他们提出了严重警告：**“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毛主席以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对付正在出现的复杂斗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就在这时，国民党总头目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企图在保存伪法统、伪宪法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等五项条件下，同我党进行“和平谈

判”。一月五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题为《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五项条件，根本不是和平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是企图利用“和平谈判”来保持反革命实力。十四日，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条件的实质，就是坚决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是八条，还是五条，这是真和平和假和平的试金石。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让李宗仁代理伪总统，继续玩弄“和谈”阴谋。他自己躲到幕后，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企图争取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在江南整顿和新编几十个师，以便卷土重来。李宗仁上台的第二天，就发表声明，伪善地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从此，国民党各派围绕着和平问题使尽了各种花招，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我们党决不上敌人缓兵之计的当。在这段期间里，毛主席连续写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等评论，揭穿了战犯“求和”的真相。另一方面，我们党也不一概地拒绝谈判。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在中国共产

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一方针，既可以揭穿反动派的阴谋，提高群众的觉悟，更好地争取中间势力，又可以进一步促进国民党反动派的分化瓦解。**“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及其美国主人的‘和平’叫嚣，对于促进国民党崩溃一事，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北平的和平解放，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一先例，为解决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加速了全国胜利的到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发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为迎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主席所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和准备革命转变的伟大纲领，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文献。

毛主席在报告中及时总结了平津战役中的经验，指出解决国民党的残余力量，有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方式。但是，用军事手段粉碎敌人的一切反抗，依然是首要的前提。**“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毛主席规定了人民解放军一方面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正确方针。随着全国的解放，要把人民解放军变作一所巨大的干部学校，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

毛主席在报告中着重指出，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

村移到城市。我国革命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时期已经结束，现在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城市中的阶级关系和阶级路线，强调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当作当前的中心任务。报告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教育全党要把这种客观现实当作观察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如果离开这个基本出发点，就会造成右的或“左”的错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一个时期中将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就规定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根本方向，解决了无产阶级在下一阶段中的革命对象、性质、任务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毛主席规定了**“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

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这一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是指导我们进行外交斗争的重要武器。

毛主席的报告最后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夺取政权，已经是不要花费很大气力的事了，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巩固这个胜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路程将更长，工作将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必须警惕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毛主席恳切地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三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和党中央从西柏坡村移驻北平。从此，古老的北京城升起了光芒万丈的红太阳，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里领导着全党和全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四月一日开始，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经过半个月的工作，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丝毫没有和平的愿望，拖到四月二十日这个最后期限，终于露出了真相，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四月二十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毛主席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于二十一日清

晨起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长江前线上，万船齐发，一举强渡成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多月的长江防线。二十三日，红旗插上蒋介石二十二年反革命统治的中心——南京的伪总统府，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旧中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人民解放军乘胜追歼残敌，其势如摧枯拉朽。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南昌。五月二十七日，解放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六月，人民解放军进军福建。八月十七日，解放福州。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于五月十四日在湖北省的团风至武穴之间强渡长江，十六、十七两日，解放华中中心城市武汉三镇，接着前锋部队进入湖南平浏。八月初，湖南宣告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向华南和西南的进军也陆续开始。华北各兵团在四月二十四日攻克太原。第一野战军在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接着，一野和华北两个兵团向西北进军。八月二十六日，攻克兰州。九月五日，解放西宁。九月下旬，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全中国大陆的形势已经完全确定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代表、海外华侨代表等二十三个单位，在北平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伟大历史任务。会议到十九日结束，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常务委员会，开始进行筹备工作。以后，筹备工作完成，在正式开幕前，

决定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党对国家政权的建设工作，早已积累了长期的经验。革命根据地中开创的红色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的雏形。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在土改整党运动中创造了以贫农团和农会为基础，召开区、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政府委员会的经验，大大地加强了基层人民政权的建设。毛主席指出：这**“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这种基层人民代表会议的基础上，各解放区又召开了县、边区的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新的地方政府。一九四八年八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在中央九月会议上，又决定由这个政府将华北、华东和西北三个地区的财贸、金融、工交等工作统一领导起来。华北人民政府的形成和发展，为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四九年三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四月，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种群众团体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人民政权的群众基础。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又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结果。早在全面内战开始时，毛主席就指出：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建立一个比抗日战争时期有更深刻的基础的**“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我们党在同国民党的谈判

斗争中，一直注意对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团结争取的工作，帮助他们克服“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一九四七年十月，蒋介石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宣告了“第三条道路”的破产，促使一些人放弃了“中间道路”的幻想。在我们党的帮助下，一九四八年一月，一些民主党派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反蒋反美。五月，我党中央在纪念“五一”节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团结到了我们党的周围。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响应党的号召，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陆续来到解放区，经过一系列的协商，对于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了协议。新政协筹备会及常委会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并没有放弃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梦。他们参加政府工作，也给我们党带来了进一步与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道路作斗争的新任务。

为了从理论上彻底解决“建什么国”的问题，毛主席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之际，写下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历史文献。

在这部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总结了中国一百多年的革命历史经验，指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取得基本胜利的事实，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强调指出：**“总结我们的经**

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国际上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社会上阶级还存在的条件下，**“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人民民主专政把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对反动派则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他们决不施仁政。只有对敌人实行了专政，才能保证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只有对人民实行了民主，充分发动了群众，才能对敌人实行有力的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一个时期中并不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我们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正是为了**“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这种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思想，粉碎了刘少奇鼓吹“不要一个阶级的专政”⑨，妄图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蜕化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国家”的阴谋，保证了我们党的建国工作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前进。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国民党反动政

权的复灭，标志着美帝侵华政策的失败。这就迫使美国侵略者内部的一个集团，一个派别，不得不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去对付另一个集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此给总统杜鲁门的信。这些文件叙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美关系，特别是详细地叙述了从抗日战争后期起美帝国主义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干涉中国内政，直到一九四九年遭到彻底失败的经过。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里，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恶毒诬蔑和深刻仇恨。“白皮书”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美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衰落。同时，这个材料也就实际上成了美国侵略中国的一个自供状，成了对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极好的反面教材。毛主席抓住这个反面教材，在八、九两个月中，为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和重大意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它永远也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无论帝国主义如何凶残，人民是可以战胜它的。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此伏彼起，经过一百多年的流血牺牲，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是可以战胜的。毛主席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

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两条定律，概括了过去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又预示着革命胜利之后，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还要继续下去，革命人民必须组织力量，对国内外反动派的新的“捣乱”进行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彻底批判了艾奇逊之流的历史唯心主义，深刻地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经过一百零九年大小几百次的斗争，终于夺得了革命的胜利。只要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必然会创造出更加宏伟的奇迹来。

毛主席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妄图依靠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推翻人民政权的野心，同时，提醒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要从艾奇逊这个反面教员那里学到真理，抛弃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站到人民方面来。毛主席号召先进的人们帮助他们，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工作，“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毛主席在评论中提出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

路明灯。

毛主席的这些重要评论发表后，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学习运动。许多人通过批判“白皮书”，对帝国主义的本性、社会主义的本性以及新中国应走向何处去等重要问题，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这个学习运动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学习运动结合起来，成为建国工作的重要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经过十天的紧张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法，并在九月三十日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完成了建国的全部准备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成立。下午三时，首都三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这时，参加典礼的三十万革命群众中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在礼炮声中，毛主席亲手升起了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

“一唱雄鸡天下白”。占全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结束了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

剥削和压迫的旧命运。**“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从此，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本章小结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历史时期。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个革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算起，已经经历了二十八年的历史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继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又一伟大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胜利，是贯彻党的“七大”路线的结果，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全党团结的结果。在这一时期，我们党顶住了国际上白劳

德修正主义逆流，战胜了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战胜了刘少奇在土改整党运动中形“左”实右的路线等机会主义倾向。这是因为我们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坚强正确的领导，因为全党经过整风运动和“七大”，路线斗争觉悟和思想政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一事实，证明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证明了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路线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和战略战术，都已更加完整，更加成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到战略决战，最后彻底战胜和消灭了由美帝国主义装备和训练而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

中国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及时地提出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的重大发展。

我们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有一些未了部分尚待完成，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开始了。新的斗争就在前面，我们必须努力作战。

【注　释】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三三五页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七一页

③ 民主同盟，成立于一九四一年，当时名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④ 民主社会党，一九四六年八月由民主宪政党和国家社会党合组而成，主要成员都是一些北洋军阀时代的反动政客和封建余孽，如张君励、左舜生、李璜之流。

⑤ 中国青年党，原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为一小撮法西斯主义的无耻政客所组成，为首的有曾琦、余家菊、陈启天等人。他们以反共、反苏、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领取津贴为其反革命职业。

⑥ “某些社会贤达”，是指那些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而为蒋介石的伪“国民大会”粉饰门面的无耻之徒，如王云五、傅斯年、胡政之之流。

⑦ 刘少奇：《在晋察冀干部会上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

⑧ 刘少奇：《老区土改方针》（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

⑨ 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